

巴拿马—东文史料

第十四号

巴拿马与东公使史料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拿马代表
道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0570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巴云英与东公旗史料专辑

赠阅
请交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彦淖尔
盟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

一九九三年七月

封面題字，王慶棠

責任編輯，陸遠、冷江瀾

巴彥淖爾文史資料 第二十四輯 (內部資料)

編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巴彥淖爾盟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

印刷：巴彥淖爾報社印刷廠

書號：內新出證字(05)165號



1978年1月参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摄于南京

目 录

抗日战争时期的女司令巴云英

——乌拉特后旗（东公旗）札萨克诺颜额尔克
色庆占巴勒之福晋巴云英生平事迹忆述

……………吉林太撰写 胜道翻译整理（1）

前言……………（1）

一、家庭出身……………（2）

二、做札萨克诺颜的福晋……………（4）

三、协助额王，管理旗务……………（8）

（一）将旗衙门迁建于新忽热……………（9）

（二）组建旗游击队……………（10）

（三）建立台帐，征收岁租……………（13）

（四）在包头建立办事处……………（14）

（五）征收水草税和过路税……………（15）

（六）收回矿产权……………（19）

（七）参加绥境蒙政会……………（20）

四、朝圣五台，途中遇险……………（22）

五、额尔克色庆占巴勒逝世，巴云英暂时失权……………（25）

六、奔赴抗日战场……………（28）

（一）在前线的9个月……………（28）

（二）成立防守司令部……………（39）

（三）赴重庆谒见蒋介石……………（46）

（四）重整旗鼓，整训部队……………（57）

（五）购买粮食，接济旗民……………（69）

（六）惩治史钦芳……………（70）

（七）凯旋而归……………（71）

七、抗战胜利后的4年……………（78）

(一) 不失时机, 扩充部队.....	(79)
(二) 参加国民代表大会.....	(88)
(三) 在农区设置乡.....	(96)
(四) 重视教育.....	(96)
(五) 抓财政收入.....	(97)
(六) 保护李海龙出走.....	(98)
八、弃暗投明.....	(103)
(一) 联络共产党, 反对德王的引诱和拉拢.....	(103)
(二) 光荣起义.....	(110)
九、不幸逝世.....	(117)
额乌拉特后旗(东公旗)历史变迁概况综述吉林太撰写 胜道整理	(121)

抗日战争时期的女司令巴云英

——乌拉特后旗（东公旗）札萨克
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之福晋
巴云英生平事迹忆述

吉林太撰写 胜道翻译整理

前 言

巴云英（蒙名德勒格尔索）是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的福晋。她虽然是一个贫苦牧民出身的没有文化的蒙古族妇女。但是她自从做了札萨克诺颜的福晋之后，不仅能紧跟时态的变化，成为札萨克诺颜的一位幕后得力助手，而且在额王（即额尔克色庆占巴勒札萨克）去世后，登上了乌拉特东公旗的政治舞台，统揽了全旗的军政大权，为全旗的政治、经济稳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巴云英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敢于反对和抵抗任何侵略者的光荣传统。满怀爱国主义激情，跟随傅作义将军，艰苦抗战八年，夺取了最后的胜利。从而，她闻名于全国，被誉为蒙古族的女英雄，赢得了公众的嘉许。

在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国共合作，挑起全面内战的四年间，蒋介石妄图消灭共产党，巩固国民党日暮途穷的反动统治，而拉拢蒙旗封建上

层，扩大其反动势力的时候，巴云英为了故土的安宁，则利用了这个机会，竭力扩充本旗的保安部队，保卫了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的生产秩序。

在蒋家王朝崩溃前夕，巴云英认清形势，弃暗投明，率领全旗军政人员和几千名蒙汉族人民，积极参加了民国38年（1949）9月19日的绥远省和平起义。参加革命以后，她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努力改造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以及在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中，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原系乌拉特东公旗乌布尔李儿只格特苏木属民。巴云英随其父亲从土默特旗迁到乌拉特东公旗境内以后，与我祖父母先后在现包头市郊区赛音呼都格（即银匠窑子）和温都尔宝日呼硕一起居住过。因此，我从小不仅听说过巴云英情况的言传，而且还从民国34年（1945）秋至1950年7月，在她身边工作过5年。所以，我对巴云英女士的生平事迹是有所了解的。现依据本人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并且走访了了解当时情况的一部分老同志加以印证后，撰写了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女司令——乌拉特东公旗第十三代第十六位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之福晋巴云英”的生平事迹一文。因本人水平有限，加之事隔多年，失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知情者予以补充或批评指正为盼。

一、家庭出身

巴云英父亲叫巴赖，蒙古民族，系原归化土默特特别旗所辖右翼六甲第五苏木属民，原籍在今包头市郊区沙尔沁乡八拜村，祖辈几代靠养牧为生。

由于满清政府对土默特旗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蒙古人每人划拨100亩牧场为户口地，从雍正到光绪年间，土旗王公大

量放垦开荒。紧接着，扎兰章京苏木官吏也肆无忌惮地放垦牧场，以渔地利而肥己。及至道光年间，土默特草原已基本被垦。靠养牧为生的蒙古族牧民已经无法在这里生存。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独立队土匪也到处起来抢劫掠夺，为非作歹，使广大贫困牧民不得安宁。因此，巴赖老汉与其弟桑杰二人携家带口，背井离乡，迁往乌兰察布盟乌拉特东公旗境内，居住在今包头市郊区阿尔气山南麓的赛音呼都格沟口子和东银匠窑子村。他们虽然没搬多远，但是离别故土寄居他乡异旗，屡屡遭到一些排挤和虐待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兄弟俩在无奈之下，加入了乌拉特东公旗籍，成为扎鲁特苏木（即札萨克诺颜的阿勒巴图铁宾）属民。巴赖是土默特旗的云姓家族，巴云英之“巴”，是其父名首字之音。巴赖生有二男五女，即：长子齐秘德斯仁，次子呼焦勒，长女韩达，次女乃满查干，三女色仁巴勒，四女德勒格尔索（巴云英这个汉名，则是当了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的福晋之后起的），五女诺敏（人称活菩萨）。除了长子齐秘德斯仁在昆都仑庙当喇嘛学过经文以外，其余六个儿女从小就跟随父母放牧，未念过书。

巴云英于光绪25年（1899）农历6月18日降生在人间。据说，巴云英在小的时候，为了给家里的生计多少做些添补，就经常跟随其父持枪打猎，奔跑于昆都仑沟两侧的山林中，生活炼就了她一个非常机灵的性格。民国7年（1918）正月20日，由父母作主，将19岁的巴云英嫁给土默特旗的云秉柱为妻。巴云英婚后生有一男一女，为了维持生活，她同丈夫揽放了包头市牲畜贩子和肉铺的许多牛马羊等家畜。从而，她的社会交往也开始日益增多了。

民国8年（1919）春，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诺颜拉什那木济勒多尔济的福晋因病身亡，需要再续福晋。巴赖的三女婿恩克乌力吉是乌拉特东公旗乌布尔李儿只格特苏木章京，他瞅准这

个机会，以札萨克诺颜当螺夫不吉利为借口，向札萨克诺颜禀告，欲将自己16岁的五小姨子诺敏（巴赖之五女儿）许配给他做福晋。年已70的札萨克诺颜拉什那木济勒多尔济，人老而心不老，一心想娶一个黄花姑娘做太太。此时，柳叶细眉，杏子眼，樱桃小口，圆白脸，人称活菩萨的美貌姑娘诺敏，正合札萨克诺颜的心意，遂从心底里表示了同意。于是，札萨克诺颜拉什那木济勒多尔济以公事为名，领着恩克乌力吉前往包头。路过温都尔宝日呼硕，以银白的哈达、两匹骏马、12锭元宝做为聘礼，献给诺敏的长兄齐秘德斯仁，订下了这门亲事。是年8月，便迎娶诺敏为福晋。从此，巴赖一家由阿勒巴图（箭丁，意为牧奴）一下子变成了札萨克诺颜的岳家。已出嫁的巴云英也随其小妹迁徙到现乌拉特中旗双盛美乡四女子盘（巴云英在姊妹中排行老四，人称四女子，故称其放牧场地为四女子盘）放牧。此处距乌拉特东公旗衙门和诺颜仓较近，所以，巴云英与贵族上层的往来也较频繁，生活也日趋好转。巴云英虽然照旧放牧牛羊，操持家务，终日辛劳，但是她的容貌并不逊色于其五妹，仍然是个白净而丰丽的少妇人。据说，每当她前去探望五妹，在诺颜仓马桩前下马时，请鞍接马的侍卫们争先恐后地跑来，不经禀报就让进上房。热情地招待。

二、做札萨克诺颜的福晋

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诺颜拉什那木济勒多尔济的头一个福晋生有二子。长子叫额尔克色庆占巴勒（汉名叫额敏伯），次子叫奇穆特林沁多尔济（汉名叫奇天命）。当额尔克色庆占巴勒三岁时，他被认定是乌拉特东公旗阿格鲁庙活佛之转世。因此，以本庙的沙卜隆喇嘛（次于格根的转世活佛，即该庙主持喇嘛）请去，送去道尔吉呼都格庙，拜师学习经文礼教。次子奇穆特林沁多尔济8岁时，请来了一位姓田的老师，在诺颜仓为他教书习

文。老王爷拉什那木济勒多尔济娶过诺敏福晋不久，便突然病逝了。当时，其子一个是喇嘛，一个还幼小，无法掌管旗印，执掌旗务。经乌兰察布盟盟长，四子王旗勒旺诺尔布亲王同意，委托东协理脑海夫为暂时护理札萨克印的掌印协理，代理札萨克执掌旗务。

在民国10年（1921）的本旗春季启印楚格拉（集会）期间，旗官吏们依据世袭札萨克的封建制度，一致认为，应将拉什那木济勒多尔济之长子——阿格鲁庙沙卜隆喇嘛额尔克色庆占巴勒还俗后，承袭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诺颜之位。遂上报乌兰察布盟盟长勒旺诺尔布和中华民国政府蒙藏院，批准额尔克色庆占巴勒为贝子爵位（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民国政府颁布命令，凡效忠民国，实心赞助共和之蒙旗各札萨克王公者，均予加封晋爵。这项命令是1913年2月26日在归绥召开的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官员会议上，由会议主持人张敬兴将军公布的），承袭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诺颜之职。是年初夏，年方19的额尔克色庆占巴勒登上了札萨克诺颜之宝座，统治了乌拉特东公旗。

在此一年前，巴云英的婆母因病去世。其丈夫云来柱患有严重的肺病，加之不断吸食大烟，病情日趋严重，在迁居今乌拉特中旗石哈河乡补隆德日素后，抱病身亡。就这样，这一家子在一年内就死亡了二人。但是，多灾多难的巴云英，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她挺起了腰干，为了当时的生活和日后的出路，将生下仅仅几个月的女儿脑干其其格抱给本旗的孟克巴雅尔为养女，自己只带亲生子乌尔图那顺（汉名乌仲秀），投靠其兄齐秘德斯仁。

巴云英的三姐夫，乌布尔孛儿只格特苏木章京恩克乌力吉是非常了解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在道尔吉呼都格庙学习经文时，与巴云英有过私情和秘密往来的底细。这时，他又不失时机地与即将袭位的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密谋计意，好让他即位后，就马上娶巴

云英为福晋。

额尔克色庆占巴勒经过上级批准，正式登上了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诺颜宝座以后，就向旗官员们提出了娶巴云英为福晋的打算。但是，大多数官员表示不同意这门亲事，并与其据理相争，极力劝阻。以管旗章京森丕勒为首的大多数官员不同意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额尔克色庆占巴勒是一旗之主，是堂堂正正的札萨克诺颜。应该考虑娶一位黄花姑娘，传宗接代、恩泽旗民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娶一个丧夫之妇为太太。这不仅不利于札萨克诺颜自己，而且要妨害子孙后代。

第二，巴云英是已故老王爷的福晋诺敏太太的同胞姐妹，是她的四姐，也是小王爷的继姨母。身为札萨克诺颜，怎能娶姨母为妻？这既不合情理，又是一出失去体面的可耻行为，做出平头百姓都不会做出的事，将来如何管理全旗执掌旗务？如此这般地摆了许多理由，极力进行劝阻。但是，这些都无济于事，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且彼此间的往来愈加频繁，情感也日趋深厚。小王爷额尔克色庆占巴勒还满腹牢骚，甚至还说什么：“先辈有父子俩娶同一个妻子的事，而今我们父子娶姐妹俩为妻，有何罪过？”就这样，小王爷在娶巴云英为太太的问题上，不但没有退让，而且表现的非常坚决。

一日，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去脑海夫家，有事要商量。不料，管旗章京森丕勒也尾追到那里，在向额王提起无论如何也不能娶巴云英为福晋一事时，又遭到额尔克色庆占巴勒的反驳以后，索性对额王说：“札萨克诺颜您如果执意要娶巴云英为福晋，玷辱我等的声誉，那我就担任不起您这个管旗章京的职务，乌纱帽虽然是您的，但是乌发还是我的。”他边说边将自己头上的红顶帽取下，掷于额尔克色庆占巴勒怀里，愤然走出屋门。一气之下，直奔巴德格尔庙（即五当召）削发当了喇嘛，潜心念经修行。可是，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娶巴云英为福

晋的决心丝毫没有因此动摇，对森丕勒掷乌纱帽一事，也没有轻易放过。而是以他在札萨克诺颜面前无理取闹、故意作梗为由，科以20只羊，两匹马的处罚。实际上，这一做法在当时的反对派中起到了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的作用。从此以后，对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娶巴云英为福晋一事，只有支持和撮合的人，而没有公开阻挠或反对的人。梅林章京巴图、扎鲁特铁宾的哈温夏日班迪、乌布尔李儿只格特苏木章京恩克乌力吉等人日夜奔忙，牵线搭桥，积极做其他官员的思想工作。经过一个时期的周密策划，在基本做通了多数仕官思想的基础上，民国10年（1921）农历12月24日，在今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牧仁嘎查的哈拉干楚鲁（地名、意为门板石，是乌拉特东公旗诺颜仓所在地），为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和巴云英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大小官吏和亲戚朋友齐聚一堂，大摆宴席，喜庆三日。与此同时，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还为他 and 巴云英的美满姻缘前后奔走，效劳的有功之臣，加封晋爵，提拔重用。如：提拔梅林章京巴图为管旗章京，代替森丕勒之职；提扎兰章京恩克乌力吉为梅林章京，调任旗衙门管家；提扎鲁特苏木扎兰章京夏日班迪为管旗章京；封巴云英之长兄齐秘德斯仁为卓尔济喇嘛（主管寺庙教仪的喇嘛），并为其坐骑赐予一双红缨，以示显达。从此，23岁的巴云英便当上了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诺颜的福晋，脱离了穷苦牧民的贫困处境，一跃成为封建上层、王公贵族，登上了参与旗政共谋旗务的社会政治舞台。

但是，巴云英的五妹诺敏，却陷入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悲惨境域。一则，她过门不久就失去了丈夫——一旗之主，即札萨克诺颜拉什那木济勒多尔济，之后的日子不堪设想。二则，她看不惯四姐巴云英如此放荡不羁，荒谬绝伦，竟不近人情地与自己的外甥相婚配的丑事。因此，她整日灰心丧气，悲观失望，苦思冥想也无良策。遂下决心，18岁就离开了诺颜仓，分得牛、马、

驼各一群，羊两群，寻求自己苦命的生活道路。但是，现实是无情的，她怎能摆脱封建礼教的枷锁和陈腐传统观念的羁绊呢？她索性横下一条心，去本旗巴拉嘎苏庙削发当了尼姑。此后，她仍然是茶不思饭不想，懊丧忧愁终成疾病，不久，便年纪轻轻地离开了人间。

三、协助额王，管理旗务

巴云英虽然当上了札萨克诺颜的福晋，社会地位也随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她始终没有丢掉从小跟随父母以及前夫放牧牛羊，上山打猎，拾粪背柴，受尽煎熬而养成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从不挑剔；在生活上仍然是自己动手缝制衣服，操持家务。此外还帮助侍女放牛牧羊，拾牛粪起圈肥，挤奶练乳，样样活儿都要做。听说，她不但心灵手巧，绣得一手好花，刺绣技艺精湛，而且胆大心细，非常喜欢打猎，无论坐卧站立，举枪就射，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额尔克色庆占巴勒虽然21岁就登上了札萨克诺颜的宝座，但他从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封建阔少爷的生活，而且长期接受了封建礼教和宗教迷信的教育。所以，他对管理一旗之纷繁复杂的政务，统领全旗，实在是技穷智寡，能量微薄，力不从心。他是一个老实巴交而比较笨拙的青年。所以，在他执政后的四五年里，还是由老王爷逝世后掌管札萨克印的东协理脑海夫继续掌握主要权力，协助其工作的。经过在这样特殊环境中几年实践的锻炼以后，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及其福晋巴云英渐渐成熟起来，并掌握了管理全旗军政事务的一定的知识和本领。尤其是巴云英她比额尔克色庆占巴勒长两岁，而且有在社会上广为交往的经验和善于应变的能力。在这短短的几年内更加成熟，已经成为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台前接应幕后策划的家庭高参。为乌拉特东公旗的生存与发展，为广大旗民的生息繁衍，

协助额王做了许多工作。因为王公的福晋是不能参加仕官会议和旗务会议的。所以，巴云英在平时就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拿出来，同仕官们个别商定安排好以后，变成额王的意见，提交会议议定。“七·七”事变前，巴云英建议并促使额王和旗衙门作了以下几项主要工作。

（一）、将旗衙门迁建于新忽热

乌拉特东公旗衙门从营盘湾（今乌拉特前旗明安乡营盘湾煤矿所在地）迁出以后的30多年间，一直是随形势的变化而经常搬迁，无固定地址。而且，一直是在10来顶蒙古包内办公的。始终没动土木，兴建房屋和院落。札萨克贝子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娶巴云英的时候，旗衙门和诺颜仓还是住在三五顶蒙古包内。

在巴云英做了札萨克诺颜的福晋之后的几年内，军阀混战已逐渐减少，乌拉特东公旗境内的独立队土匪也为数不多了，政局开始趋于和缓 and 稳定。针对这种情况，巴云英经过再三考虑，提出将乌拉特东公旗衙门和诺颜仓由哈拉干楚鲁迁往现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所在地，建造房屋和院落的建议，并征求了值班仕官的意见以后，让额王在春季启印集会上提了出来。参加旗衙门启印集会的仕官们都表示同意和支持。当时报请乌兰察布盟盟长同意，派人到木纳山砍伐建筑用材，运回新忽热。又从农区请来泥瓦工匠，由梅林章京阿尤尔扎那（又名赵太宝）、衙门管家恩克乌力吉二人负责施工。他们抓紧时间，组织人力和物力，克服重重困难，修建了土木结构的房屋共30间。其中旗衙门20间，诺颜仓10间。次年5月，他们将旗衙门和诺颜仓由哈拉干楚鲁迁往新址，并与祭祀旗属敖包相结合，举行了盛况空前的那达慕大会，喜庆三日。还对积极参加施工的官兵、泥瓦工匠进行了表彰奖励。

从此，乌拉特东公旗衙门和诺颜仓结束了30多年的流动迁徙生活，改变了旗衙门与诺颜仓的财产长期混杂在一起的局面。

并配备了各自的管家、保管、伙夫和仆人等。直到民国28年（1939），该地一直是乌拉特东公旗旗府所在地和全旗政治、军事中心。

（二）、组建旗游击队

满清统治全国以后，虽然将蒙古诸部都编成带有军事性质的若干旗，旗下设苏木、铁宾等机构，专管基层军事、行政等事务。但是，清朝政府为了防备蒙古诸部群起反抗，就又采取了种种政策，控制和驾驭蒙古上层，使其效忠驯服于清朝统治者，并通过蒙古上层去奴役广大蒙古族人民。诸如采取利用黄教愚弄制服蒙古族人民，用联姻手段来拉拢蒙古上层，或以金钱收买，加官晋爵、进行经济掠夺、不供兵器等等手段，使蒙古各旗的武装力量渐渐衰弱颓废，丧失了抗争的能力。尤其是黄教传入蒙地以后，进庙烧香跪拜、当喇嘛诵经的人与日俱增。各蒙旗内除了少数王公贵族、封建宗教上层的贪官污吏、恶霸财主以外，一般平民百姓连个打狼的枪弹也没有了。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军阀割据混战，土匪四起抢劫，社会混乱不堪，广大民众不得安生。在这种情况下，很需要有一支地方武装力量，来维护社会治安，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的生产活动。

民国元年（1912），乌拉特东公旗管旗章京伊喜格委托去外蒙大库伦（今乌兰巴托市）的旅蒙商。用20峰大骆驼换回来20支单发别旦式步枪和2000发子弹，秘密保存在旗衙门的仓库内，以备急用。不料，民国2年（1913）夏，喀尔喀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沙俄的唆使下，向内蒙古各蒙旗发动武装进攻。当时，喀尔喀蒙古的朱特古勒图将军率领的部队行进到乌拉特东公旗衙门所在地桑根达赖（今乌拉特中旗双盛美乡东印壕村），搜查出库存的枪支弹药，就要带走。经过在旗衙门值班的官员和笔帖式等人再三恳求，该将军才勉强留下了这部分武器。可是，这些军队向西行至乌拉特中公旗衙门所在地杜古尔

河，见到了该旗札萨克诺颜巴宝多尔济，决定成立一种称作“索伦”的地方军队。朱特古勒图下令，将乌拉特东公旗衙门库存的枪支弹药全部运到乌拉特中公旗衙门。东公旗接到命令以后，立即派人把这些武器如数送到杜古尔河。就这样，为组建旗军搞了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已化为泡影。尔后，北洋军阀互相残杀，你争我夺更加激烈，独立队土匪也多如蚊蝇，到处乱窜，抢夺民财，为非作歹。然而，少得可怜的地方武装力量，而对众多的乱军和土匪的骚扰，又有何奈？就这样在混乱中艰难地渡过了四个年头以后，于民国6年（1917）春，经过商讨，绥远都统府决定收编散落在长城内外的卢占魁之独立队为绥远骑兵游击旅。是时，在卢占魁独立队担任营长职务多年的乌拉特东公旗苏海图苏木属民罗布僧达瓦，将同他一块儿参加独立队的蒙古族青壮年联络在一起，携带30多支长短枪，并持民国政府开具的“免死证”，一起来到乌拉特东公旗衙门，负荆请罪，等候处罚。后经本旗官员们研究，作出决定，免除对罗布僧达瓦等人的处罚，并在这部分人的基础上，再招收10多名青年，组建“乌拉特东公旗游击队”，任命罗布僧达瓦为队长，内设3个班，驻守旗衙门。同时报乌兰察布盟盟长和绥远都统府备了案，一支名正言顺的地方武装——乌拉特东公旗游击队就这样诞生了。

巴云英当了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诺颜的福晋以后，她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际需要，提出动员全旗官吏和豪门富户，将私存的枪支弹药全部交给旗政府统一使用，再招收20多人，将部队扩编为50多人的骑兵连，内设3个排的建议。额王将此建议在旗仕官会议上提出以后，得到了仕官们的拥护和支持，并做出决定：任命罗布僧达瓦为连长，若格瓦、脑门特古斯、班扎尔克其三人为排长。

民国21年（1932），孙殿英的41军从包头向西挺进时，因在途中腹背受敌，败兵四散。有的散兵甚至用一支手枪换

取两块烙饼，用一件皮袄换几升米，填饱肚子竞相逃命。巴云英与她丈夫商量后，派罗布僧达瓦和米齐德道尔吉等人，用马匹和米面粮食换来50多支步枪。后经仕官会议议定，再从地方上招收了50多名蒙汉族青年，将旗游击队扩编为一个拥有120多人的骑兵营，下设两个连，每连3个排。分别任命罗布僧达瓦为营长，若格瓦、贺德功二人为连长；贡德桑布、牛占山、萨仁夫、脑门特古斯、桑杰仁央、图门吉尔嘎勒（汉名赵青山）等六人为排长。

民国25年（1936）8月，巴云英与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及其子乌尔图那顺（乌仲秀）、贡嘎色楞（汉名贡世明）和绥远省境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实业处的科长史钦芳等10多人一起去五台山朝圣拜佛。途经山西省太原市，拜见了蒙旗指导长官公署长官阎锡山，汇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以后，与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互相勾结，妄图大举进攻绥远省。乌拉特东公旗虽然有少数地方武装部队，但是武器装备相当落后，枪支破损残旧，子弹奇缺。甬说抵抗日本侵略者，就连维护地方治安也很困难。为此，要求阎长官给解决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当他（她）们返旗时，阎锡山给拨了50支汉阳造步枪和10000发子弹，10支德国造20响手枪和1000发子弹。把武器运回来以后，巴云英和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商量决定，扩大部队编制，建立一个团。分别任命史钦芳为团长，贺德功为副团长，兼任第一连连长职务，若格瓦为二连连长，贺德胜为三连连长，乌力吉德勒格尔为排长，恩克达赖（汉名胡庆发）为特务排排长。将罗布僧达瓦调离部队，委任乌拉特东公旗衙门梅林章京。经过这一次扩充，巴云英和额尔克色庆占巴勒手下的游击队，已成为一支具有180多名骑兵的有一定战斗能力的地方武装力量。

这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官兵，跟随巴云英积极参加了抗日战

争，是巴云英抗日救国武装力量的根本基础。他们为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余少部分人，则在管旗章京阿尤尔扎那（赵太保）、梅林章京若格瓦等人的带领下，投靠了德穆楚克栋鲁普的伪蒙古军，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爪牙。

（三）、建立台帐，征收岁租

自清朝光绪32年（1906）至民国24年（1935）间，满清政府和绥远都统府强行放垦了乌拉特东公旗辖区三分之二的肥沃草场。致使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广大蒙古族牧民失去了赖以生息繁衍的大片儿牧场，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最后，他们被逼得无可奈何，就背井离乡，先后搬到了大青山西端的绍卜亥、查干达坝、阿尔斯郎沟、白彦沟、补尔嘎苏太、查干海日或木纳山东头的苏敏高勒（召沟）、哈卜其勒、沙德盖、玛尼图、贝何地、加浪沟、浑地高勒以及白彦花山、嵯石太山等深山穷沟里。由于这些地区干旱少雨、土地瘠薄，牧草稀疏，导致了牲畜头数大幅度下降，牧民生活难以维持的困难境地。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推行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政策，在放垦牧场时双方商量好必须交纳的一点儿微不足道的岁租，也被区县政府以种种借口拖延甚至拒不缴纳。不仅是平民百姓户口地的岁租无法收取，就是旗衙门和诺颜仓等官地的岁租也是障碍重重。难以征收。鉴于这种有约不守，有章不循，仗势欺人，抗租拒缴的情况，巴云英通过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提出了要效仿土默特旗重新丈量已放垦土地的办法，上报绥远都统府，请求批准重新清查丈量本旗历年放垦的土地，登记造册，便于征收租金。但是，绥远都统府根本不同意这种做法，只批准了将原报垦土地的帐目和规定重新抄回袭用。因此，乌拉特东公旗于民国17年（1928）春，派出人员，耗资2000块银元，在归绥城用石版印制了一式三册，共120多本原放垦土地的台帐，并于本年初夏，从全

旗官吏和兵丁中挑选出精明能干的90余人，由奔秘德斯仁、米齐德道尔吉、萨仁夫等人带领，分三组奔赴包头、固阳、安北等三县，对其范围内由乌拉特东公旗放垦的土地，以原台帐为依据，对租地人的姓名、租种时间和亩数以及缴纳岁租与否等情况，逐一进行认真细致的核查，全面清理了20多年来的债权和债务，建立了新的台帐，征收了岁租。本次征收岁租工作主要采取了以下两种方法：

一是直接收取现金（如：纸币、银元、金银等）或可用货物、牲畜、米面等实物相抵。

二是对那些遭受严重旱灾、虫灾、病灾或遭受土匪抢劫、无力偿还岁租的租种少量土地者，可视情况减免一半或全部岁租。而对那些租地多或租地虽少，又转手租给他人耕种者，要毫不留情，坚决按规定征收。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基本上完成了岁租的清查整顿和征收工作。到年底为止，共征收岁租金40000多块银元。同时，他们还将各家户口的岁租，分为三七开，三成做为公用金，归旗衙门所有，将剩余的七成连同新建的台帐交给户家，作为今后收缴岁租的依据。由于巴云英的倡导和具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乌拉特东公旗放垦的土地不仅有了详细的台帐，而且也为本旗官地和户口地岁租的征收工作扫清了障碍，使岁租征收工作一直能延续到绥远省和平解放为止。这些清丈放垦的台帐，也一直被保存在乌拉特东公旗驻包办事处，于1950年秋，巴云英亲自送交乌兰察布盟自治区人民政府。

（四）、在包头建立办事处

乌拉特东公旗疆土的三分之二被垦以后，其属民就与相邻各县的汉民一起杂居。因此，在很多问题上都经常需要与包头、固阳、安北等县取得联系，互相交往。然而，乌拉特东公旗的衙门则建立在交通闭塞、地处偏僻而边远的后山地区。因此，与国民党中央、绥远省政府和邻近旗县以及旗下属民相联系，是极不方

便的。针对这种情况，在民国17年（1928）的全旗启印楚格拉（集会）上。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根据巴云英的提议，提出了要在包头建立旗衙门办事处，并建议让衙门管家恩克乌力吉担任办事处处长，让乌力吉巴图（汉名二秃子），那森巴雅尔（汉名满喜子）为办事员的建议案以后，得到了参加集会的大小官员们的一致赞同。因此，当时就按照札萨克诺颜的意图，一一作了部署。并由诺颜仓出资3800块银元，买下了史钦芳在包头市（今东河区）园子巷19号院内的24间房屋，挂上“乌拉特后旗政府驻包头办事处”的牌子，委派以恩克乌力吉为首的10多人，常驻此院办公。从此以后，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和福晋巴云英以及卫津诺颜（即闲散王公）奇穆特林沁多尔济等人也常住此地。一直到民国26年（1937），他们将每年三分之二的时间消磨在包头这个繁华的地方。该办事处也就很自然地变成了旗衙门与诺颜仓搅和在一起的操纵全旗军政大权的根据地。然而，由于时光的流逝，居住在新忽热、石哈河等后山地区的官吏和老百姓对此很不满意。星移斗转，年复一年，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前山和后山两派。可是，乌拉特东公旗的统治者们只顾自己的安乐，却不顾老百姓的苦衷，一直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包头市（今包头市东河区）为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五）、征收水草税和过路税

满清和民国政府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各蒙旗放垦大面积牧场时，除规定了对那些耕种平坦草地和熟地的招垦者，每年应征收一定数额的挂地押荒银以外，还根据耕地的土质、位置、水源等条件，分别规定了每百亩耕地每年应收取的租银。这些规定对放垦牧场的各蒙旗而言，多少是有些好处的。但是，那些岩石裸露的山梁坡地和碱石砂滩、河流道路等，却被邻近区县无偿占用，分文不交。广大蒙古族牧民对垦务局的这种作法极为愤

概，因此，提出了抗议，一直上诉到满清政府，才获准蒙旗可以向那些邻近区县征收牲畜水草税和搞运输驼马车辆的过路税。

1911年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满清政权，然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却篡夺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成果。袁世凯篡位后，根本不执行共和制。他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恢复帝制，不顾各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公开宣布各蒙旗继续执行满清时期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丝毫不作变动。同时宣布：“各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内外蒙古汗、王、公、台吉世袭名位号，照旧承袭，其在本旗内享有之特权，不予变动。蒙古各地呼图克图、喇嘛等原有之封号，概仍其旧；蒙古王公世爵俸饷，从优支給”。

民国元年（1912年）11月24日至翌年2月22日，招集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的王公贵族，在归绥共住90多天召开的会议上，不仅没有改变封建统治制度，而且继续执行满清政府授予那些王公贵族和封建宗教上层的原有封爵，还在此基础上普遍加封一级。其中，将乌拉特后旗（东公旗）札萨克诺颜拉什那木济勒多尔济和乌拉特前旗（西公旗）札萨克诺颜克什克德勒格尔由镇国公晋升为贝子爵位；将乌拉特中公旗札萨克诺颜巴宝多尔济由辅国公晋升为镇国公。对无爵可进者，则封其子或孙一人（这是大总统袁世凯在民国2年2月15日批准公布的）。其后，在蒋介石掌握政权，傅作义任绥远省主席时期。绥远省各蒙旗内，仍然继续执行满清时期的各项政策与规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和巴云英福晋授权衙门仕官，于民国19年（1930）进一步整顿了水草税和过路税的征收工作，强化了征收税赋的管理机构。在今包头市辖区内的黄河大树湾渡口、昆都仑沟沙坝子、洪庆德乡大庙子、石拐子煤矿至包头运煤路上的鸡毛窑子和今乌拉特中旗双盛美乡哈尼河等5处分别设立了税卡子，每个税卡子经常驻有2

——3人，对过往的运输驼队和车辆征收过路税。征收过路税的具体标准和规定是：

单套牛马的铁轱辘和木轱辘车，每次征收5角钱（折人民币下同），双套牛马骡车每次收1元，3套牛马骡车每次收1元5角钱；搞驮运的驼队每峰每次收税2角5分；搞驮运的驴、马、骡每头（匹）每次收1角；在黄河渡口处每日搞摆渡的渡船每只每月收费30元；从宁夏和后套运木料和粮食的船只以及其他过往船只，每次来去各征收70——100元的过路税。收回来的这笔税款都用于旗衙门、诺颜仓和驻包办事处的开销。

从邻近市县辖区征收的水草费，是乌拉特东公旗财政收入的又一条主要渠道。自民国14年（1925）起，乌拉特东公旗就在每年秋季组织一定的人力、物力，分赴包头、固阳、安北等地，向该地农民征收牲畜水草费和从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地搞驮运而来的运输驼队之水草费。具体征收办法是：

对包头、固阳、安北等3县在乌拉特东公旗地盘上的农民耕畜以外的自养小畜（即山羊、绵羊）。每百只年征收2只羊（中等羊），不足50只的，以一只羊计价收款；骆驼每峰每年收费7角钱；牛、马、驴、骡每头（匹）每年征收5角钱。仅此一项，每年就能征收到近1000只羊和500多元现金。这笔收入全部用于旗里的军政开支。

由于乌拉特东公旗每年要征收这种税款，所以经常遭到区县政府和地主、土豪以及军政当权者的反对和抗争。特别是傅作义、董其武统治绥远省以后，反对蒙旗征收水草费和过路税的斗争更加激烈，甚至发生过旗县之间互相动武，伤害人命的惨案。那是民国21年（1932）秋的事情，当时安北县余太区有一名叫张汗山的军官，因对乌拉特东公旗征收水草费和过路税不满，就派人将正在征收水草费的乌拉特东公旗游击队的乌力吉呼图克排长请到现乌拉特前旗明安乡贾全湾村，说是要商讨有关征

收水草费的事宜。可是在协商中双方意见不一致，遂发生了争执，进而持枪相对，互不让步。此时，张汗山的部下见状不妙，就在屋外从窗户眼儿开枪打死了乌力吉呼图克。额王和巴云英接到报告以后，立即派人到贾全湾村，将乌力吉呼图克的尸体运回驻包办事处，置于大水缸内，用盐腌起来，留作证据，并火速上报绥远省政府。但是，省政府有关人员并没有把此事看在眼里，引起重视。经过一年多的周折以后，于第二年秋天，绥远省政府才派专门官吏，逮捕了那个姓吕的杀人犯，安葬了乌力吉呼图克的尸首，并从昆都仑后口子的东河畔划出一顷水地，作为抚恤田，供乌力吉呼图克家耕种。对乌拉特东公旗衙门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一辆汽车。并告戒他们，今后要继续按规定缴纳水草费，任何人不得违抗。

但是，由于民国26年（1937）7月7日暴发了芦沟桥事变，接着，绥远省大部被占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乌拉特地区的8年间，乌拉特东公旗征收水草费的工作也被迫间断了8年之久。民国34年（1945）8月，嚣张一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年春，光复后的乌拉特东公旗恢复了征收赋税的工作。但是，包头市的运输户们拒不缴纳从石拐子到包头的运煤过路税。因双方争执不下，包头市政府就上书绥远省主席董其武，抢先告了状。这时，国民党坚持执行的那个所谓“旧理不改，新理不添”的不变政策却又变得灵活了。他们甚至还说什么，由于你们旗征收过路税，而增加了包头市居民的燃煤费用。遂命令乌拉特东公旗，停止征收过路税，撤回设在鸡毛窑子的税卡子。乌拉特东公旗政府为了继续征收这一税款，曾多次上书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和绥远省境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绥境蒙政会），要求协助蒙旗作出公正的裁决。但是，一直到解放为止，也没有作出任何结论。

(六)、收回矿产权

清朝光绪32年(1906)至中华民国19年(1930)间,清廷和民国政府强行各蒙旗放垦了辽阔的牧场和肥沃的打草场以及秀丽的山川、河谷和草甸子,致使内地的大地主和大地商蜂拥而至,竞相招垦,他们不仅以永租形式招垦大量的土地,反手租佃出去,从中渔利,中饱私囊以外,还与区县官吏和军阀相互勾结,串通一气,肆意开矿,采掘各种地下矿产资源,经营大小厂矿时日已久。其中,乌拉特东公旗营盘湾煤矿(即现乌拉特前旗明安乡境内的营盘湾煤矿)、营盘湾口子瓷窑和今包头市石拐矿区的小井子沟煤矿等,都是由大地主、大商号人股的漠南公司在清宣统元年(1909)开始经营的。另外还有一名姓白的外来把头,为了挖掘现乌拉特前旗朝阳乡与沙德盖苏木境内的贝荷迪高勒、浩绕图、巴德玛音高勒、查干海日音高勒、三老虎沟和今固阳县境内的白彦沟、准布尔嘎苏太、布拉格音乌拉等地的石棉和云母,就想尽一切办法,拉拢和勾结本地的大地主、军阀和土豪劣绅,与他们合伙在贝荷迪高勒沟口子建立了一个石棉厂。以上厂矿都在乌拉特东公旗区境内。开办这些厂矿,已经严重地毁坏了林木,破坏了植被和茂密的牧场,给本旗广大牧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但是,本旗有些仕官们对此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任其蔓延发展。其实,他们早就接受了厂矿主的贿赂,得到了好处,并与他们结为拜把兄弟,互为邻里,不顾广大牧民的疾苦而已。

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和巴云英了解到此事以后,经过与个别官员商量,于民国20年(1931)春,在全旗启印集会上提出了关于收回本旗境内所有厂矿的议案。额尔克色庆占巴勒面对众官员说道:“我旗自满清以来放垦土地。只是准许招垦者耕种土地表皮,而并没有出卖地下的矿藏资源。所以,应该马上收回我旗境内的所有厂矿,由旗衙门掌管。”参加集会的大小官吏一致

表示赞成和拥护这一有利于全旗民众的主张。遂当即拟文，呈报绥远省政府和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要求归还固阳、安北、包头等三县范围内的上述厂矿，由乌拉特东公旗直接管理。为使这一问题尽早得到解决，他们一方面委派管旗章京阿尤尔扎那和师爷本博二人赴归绥，呈送公文，敦促早日办理。另一方面，为了打通最高层的关系。又委派扎兰章京、扎克尔其米齐德道尔吉和本旗驻包头办事处处长、扎克尔其恩克乌力吉二人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呈送诉状。他们二人在南京幸会巴云英的族系亲属，在蒙藏委员会工作多年的绥远省土默特旗的巴文俊。米齐德道尔吉和恩克乌力吉二人由于得到了巴文俊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才在较短的时间内打赢了这场官司。随后，他们二人携带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批文返回归绥，会同阿尤尔扎那和本博二人，与绥远省政府有关部门进一步磋商后，省政府才作出裁决，将上述厂矿收归乌拉特东公旗管理。事情办妥以后，他们立即返回旗里，将绥远省政府谕示的“凡在蒙旗领地及放垦土地上开办各种厂矿，必先征得有关旗的同意，并交纳适当的股金和赋税”的批文，面交包头、固阳、安北等县的县官，之后，从民国20年（1931）下半年开始，将上述厂矿全部收回旗里管理。收回这些厂矿，自行管理以后，每年能为旗衙门增加2000多块银元的收入。既制止了滥挖乱采、破坏林木和草场植被的现象，又为本旗增加了财政收入。

（七）、参加绥境蒙政会

民国20年（1931），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侵占了我国东三省以后，继续将魔爪伸向华北地区。野心勃勃地想吞并我中华大地。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一部分有野心的王公贵族和封建上层，为了达到其实现内蒙古高度自治，进而建立大蒙古国的目的，乘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侵和国内的动荡不安的机会，于民国22年（1933）7月，发出

了内蒙古高度自治的通电。翌年2月，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勉强同意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德穆楚克栋鲁普迫不及待于是年4月23日，在现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百灵庙，正式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任委员长，德穆楚克栋鲁普任掌握实权的秘书长。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很显然是蒙古族封建上层为了维护其封建王公制度和封建特权统治。它是不可能代表广大蒙古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而且，在选举产生该委员会委员时，只选那些盟长和管辖地盘大、有名望的王、公、札萨克。不但没让茂明安、乌拉特东公旗等贫穷弱小旗的札萨克诺颜参加该委员会，反而向他们摊派费用、征收捐税，从而引起了这些旗封建上层的愤懑。与此同时，察哈尔、绥远两省政府也百般刁难百灵庙蒙政会，以致于在征收赋税、管理权限等方面原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比如，双方对乌拉特中公旗和乌拉特东公旗在各个关隘要道设立税卡子，征收过境的大烟税和其他货物税的可观收入，垂涎三尺。尤其是双方为了争夺乌拉特中公旗黑沙图、德日森淖尔等税卡子的收税权，都曾调集几百兵马和工作人员，形成对峙局面，险些儿引发一起互相残杀的惨案。这件事，对本来就反对成立蒙政会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他不失时机地向国民党中央报告，并提出了取消蒙政会的建议，说百灵庙的蒙政会是一个祸根。如不及早连根拔掉，则后患无穷，绥远、察哈尔两省永远得不到安宁。民国25年（1936）春，国民党政府根据绥远省政府的建议，对蒙政会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政策。下令解散了百灵庙蒙政会，决定分设绥远省境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和察哈尔省境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

是年2月，在归绥成立绥远省境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时，选举18个旗的札萨克参加了该委员会。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贝子额尔克色庆占巴勒被选为该委员会委员，任实业处处长；

巴云英之长子乌尔图那顺被任命为该委员会参议；扎兰章京恩克巴雅尔、衙门笔帖式（文书）宝音吉尔嘎勒、图门巴图（汉名李长胜）等人为办事员。“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绥远省大部分地区，绥境蒙政会被迫迁往伊克昭盟札萨克旗，随后又迁往陕西省榆林县。由于该委员会的部分委员投靠了日本，还有少数委员因年迈而死亡，需要重新调整和补选委员了。民国27年（1938）秋，经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补选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的福晋巴云英、乌拉特西公旗札萨克诺颜石拉布多尔济之福晋奇俊峰（蒙名色布勒玛）等8人为绥境蒙政会委员。巴云英从此时起，到1949年9月19日的绥远省和平起义为止，一直担任该委员会的委员。

四、朝圣五台，途中遇险

巴云英做了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的福晋之后，不仅取得了他的信赖，成为他最可靠而得力的助手。她日夜盼望早生贵子，为额尔克色庆占巴勒传宗接代，从而继承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贝子之位。随着星移斗转，时光流逝，巴云英福晋已身怀有孕。这时，她一方面暗自祈祷腹中的胎儿将是个男婴，好尽早为额尔克色庆占巴勒扎根立后，另一方面，她格外注意自己的饮食起居，避免做剧烈的活动，细心加以保护。谁知，老天偏偏不随人意，到期却产下了一个女婴，起名叫秀仁其其格（现在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牧仁嘎查，当牧民）。此后好几年，她不曾怀孕，心里好生紧张，遂迫不及待地收养了亲戚群恰嘎之子，赐名叫达木林扎布（现在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牧仁嘎查，当牧民）。至此，巴云英虽然有了三个孩子，但是在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名下却只生了一个女子。民国20年（1931年，巴云英又有了喜。第二年，她没有辜负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多年的期望，生下了一个又白又净的胖儿了。巴云英和额尔克色庆占

巴勒欣喜若狂，立即请巴德格尔庙（五当召）活佛喇嘛赐名，叫贡嘎色楞（后起汉名叫贵世明），并且为了祈祷他长命百岁，继承父位，光宗耀祖；还在巴德格尔庙请僧众诵读了甘珠尔（藏文大藏经两个组成部分之一，即佛语部）和丹珠尔（藏文大藏经两个组成部分之一，即论部）等两部圣经。夫妻俩非常欢喜，视贡嘎色楞为掌上明珠，呕心沥血，精心养育。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和巴云英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世代相袭，就将贡嘎色楞上报国民党中央政府、绥远省政府和乌兰察布盟盟长、记名候用，俟年令长大，则让其正式继承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贝子之位。这样，他（她）们总算是达到了目的，了却了一桩心愿。

那么，朝圣五台，途中遇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恩克达赖（汉名胡庆发，是当时额王和巴云英福晋的护兵）叙述：

民国25年（1936）春，在乌拉特东公旗诺颜仓内发生了两件怪事。一是诺颜仓门前的一根雕有狮子头的石头拴马桩突然从半腰中折断了。另一个是，诺颜仓有一群花马（以花毛色马匹居多）有一天，该群的花儿马（种公马）突然被野狼伤害了。对这两件不寻常的怪事，从衙门官员到平民百姓都在纷纷议论，说三道四，胡乱猜疑，说什么的也有。然而，身居札萨克尊位的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及其巴云英福晋，在平时生点儿病都要请喇嘛诵经念咒，祈求神灵保佑，那么，如今在诺颜仓内发生了这么大的怪事，怎能不引起他们比别人更多的疑心呢？因此，他们派喇嘛夫和嘎拉僧格力格二人带领差使立即到巴德格尔庙葛根喇嘛和乌拉特西公旗德布斯格庙活佛喇嘛那里，请求他们祈福赎罪，予以保佑。然而，两位活佛喇嘛占卜的结果很不一致，一个说是释迦牟尼在向他们讨还弟子，另一个说是由于他们没去名寺朝圣拜佛，而且征收赋税又很沉重，引起了神灵的不满所致，如不马上采取补救措施，则对生命有危险。二位喇嘛占卜的结果虽不一样，但是都符合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和巴云英婚后的

实际情况。比如说，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原被认定是转世活佛而被请进庙宇当了活佛，尔后他又还俗继承了札萨克位，不正是符合释迦牟尼失去弟子之说吗？巴云英成为札萨克诺颜的福晋以后，尽心竭力协助额尔克色庆占巴勒整顿税务，征收各种捐税，享尽荣华富贵，神灵知道后，抱怨他们没办好事，而生气怪罪下来。这事对深受封建迷信束缚的额尔克色庆占巴勒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思想包袱。因此，巴云英针对两位喇嘛占卜的情况，与其小叔子卫津诺颜奇穆特林沁多尔济商量以后，决定送其养子达木林札布进庙当喇嘛，以虔诚之心归还释迦牟尼的弟子。同时决定，旗衙门和诺颜仓免收一年的赋税，以减轻广大人民群众的负担，开恩造福，行善积德。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和巴云英还以虔诚信仰佛门的诚意，决定筹措路费盘缠，携带长子乌尔图那顺和阿哥诺颜贡嘎色楞，赴山西省五台山佛门圣地，烧香点佛灯，上供叩头，祈求神灵保佑，福星高照，降恩赐福，为他们消灾解难。准备就绪以后，他们以汇报旗政为名，乘火车抵达太原，拜见了山西省主席兼蒙旗指导长官公署长官阎锡山，汇报了乌拉特东公旗情况和德穆楚克栋鲁普等一部分王公贵族暗地里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的情况。他们在太原市被款待10余天后，乘坐省里给派的汽车去五台朝圣。不料，汽车司机在头天晚上通宵耍钱（赌博），没合眼，当汽车行驶到阳明堡时，因司机打盹儿造成翻车事故，幸好，车被卡在山中的一棵大树上，才免于一场大难。但是，巴云英的一名护兵（姓名已忘）当场被砸死；巴云英的两根肋骨受了伤；乌尔图那顺被车上暖水壶的开水烫伤；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的胸部受了重伤。他们立即设法给阎锡山报告了肇事的情况。阎锡山接到电话以后，迅速派去医生和车辆，将其一行接回太原，接受治疗。经过近一个月的精心治疗，他们的伤势有所好转，阎锡山又派汽车送他们到五台朝圣拜佛，消灾除难。当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和巴云英一行返旗时，阎锡山送

给他们德国造20响手枪10支，中国自己造的步枪50支和其它一些金银财宝。这就是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为了消灾避难，平平安安去朝圣五台，不但未能如愿以偿，反而途中肇事，身负严重的内伤，返回驻包办事处的经过。

五、额尔克色庆占巴勒逝世，

巴云英暂时失权

民国25年（1936）9月中旬，巴云英带领随行人员，将身负重伤的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带回包头以后，请来许多有名声的中蒙西医，从多方精心医治。与此同时，又在巴德格尔、昆都仑等大召庙，请了众多喇嘛神人诵经念咒作法，驱邪除魔，采取各种办法，多方救治40多天，也无济于事。是年农历10月21日，历经30多个春秋的额尔克色庆占巴勒，正当壮年时代就抛下妻儿，不幸离开了人间。当时，他的福晋巴云英捶胸顿足已哭成个泪人。她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声嘶力竭地哭着说：“夫君啊！夫君！你我相识在同年，情投意合渐相爱，战胜困厄和阻力，结成恩爱好夫妻，我衷心为您树威信，多方助您来理政，找根立后育儿女，为何弃我您先走？”心酸的话儿说不尽，痛楚的眼泪流不完，她边哭边抹着眼泪向额王的遗体发誓道：“我一定要护理好您的政权，照顾好您的属民，养育好您的贵子，绝不辜负您的遗嘱。尊贵的诺颜您安息吧！”她说完誓言，挣扎起来，擦干了眼泪，与众官员和亲朋好友共同商量了如何举行丧礼进行安葬等事宜。

经过商量，决定在驻包办事处存放遗体二十一天，与安葬活佛喇嘛一样将其内脏用药水洗净以后，头戴札萨克诺颜的帽子，身着札萨克诺颜的锦袍，脚穿精制的长筒靴袜，装入纯木制做的蒙古式棺木，置于当院新搭的席棚内的松柏和各种鲜花丛中，贡

以7只整羊（即褪去毛的整羊），点起长明灯，请来20多名喇嘛，不分昼夜地念经祝颂，超度亡灵。农历11月10日，在驻包办事处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乌拉特东公旗的协理、管旗章京、梅林章京、扎兰章京、7个苏木的苏木章京、浑都（骑骠校）和绥远省政府、绥境蒙政会、包头及其他兄弟旗县的官员、生前友好和亲属等近500人参加了追悼会。12日晨，将灵柩装入玻璃轿子，由32人抬着缓步走出了包头西北门，过了石桥以后，用5辆汽车护送到在今乌拉特中旗部北乡呼图克图乌拉乌拉特东公旗王公墓地时，新忽热、石哈河等地区的300多名蒙汉族人民和大小官吏迎接灵车，准时按规定要求进行安葬。葬后第7日，巴云英、乌尔图那顺、贡嘎色楞及其他亲友到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坟前，烧纸祭祀。当时，额王的生前好友、绥远省政府咨议、绥境蒙政会实业处的史钦芳（字钧澄）科长送来一块石碑，立于坟前。了结了额尔克色庆占巴勒一生的后事。

巴云英回到包头办事处以后，依照部分官员的意见，报请绥远省政府、绥远省蒙旗指导长官公署、绥境蒙政会和乌兰察布盟盟长同意，将旗札萨克印交给额尔克色庆占巴勒之胞弟、东协理奇穆特林沁多尔济，让他做乌拉特东公旗护理札萨克，暂时执掌全旗军政大权。自己则专心致志地抚养阿哥诺颜贡嘎色楞，使其健康成长。这样，巴云英就基本上失去了权力。丧偶失权虽然给巴云英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她那从小吃苦耐劳、饱经风霜养成的坚强无畏的禀性，并没有使她一蹶不振消沉下去，更没有使她屈服于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而是使她横下一条心，抱着一个信念，精心抚养阿哥诺颜贡嘎色楞快点儿长大成人、承袭父位，继承大业。巴云英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于民国26年（1937）初，只带领贡嘎色楞、乌尔图那顺、秀仁其其格等三个子女和恩克达赖等几名可靠的随从，到达归绥，在旧城大厅街18号院内

租赁了几间房屋住下，只盼阿哥诺颜贡嘎色楞快快长大成人。而奇穆特林沁多尔济自从接替其胞兄的职务以后，非但没有征求过其寡妇嫂子的意见，磋商旗务、料理旗政。而且不按时拨给他们孤儿寡母足够的生活费用，还与自己的妻子查干其其格离了婚，整日吸食大烟，吃喝嫖赌，鄙视和污辱其他官员，将旗衙门的公务全部推给了贪得无厌的管旗章京阿尤尔扎那，引起了旗民和多数官员的不满。

巴云英知道这些情况以后，心情非常沉重，好象心头压了一块儿大石头，坐卧不宁，苦苦思考如何才能夺回旗札萨克权力的良策。但是，理应继承札萨克职务的阿哥诺颜贡嘎色楞，当时才只有7岁。按照蒙旗王公札萨克的袭位制度，继承者须年满13岁方可承袭札萨克职位。为此，巴云英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归绥大召的白喇嘛等人与绥远省政府要员的关系甚密。遂给他们赠送礼物，请他们出面为其说情，让贡嘎色楞早日继承札萨克。与此同时，她自己也谒见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详细汇报了额尔克色庆占巴勒逝世后乌拉特东公旗的情况，并提出了废除奇穆特林沁多尔济协理的护理札萨克职务，让贡嘎色楞袭位，继承札萨克诺颜的请求。当时，傅作义并没有直接答应她的请求，而只是说：“这件事，等我了解你们旗的具体情况，与有关人员商量以后，再作决定。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专心一意地精心培养你的儿子”。在这段时间内，受巴云英委托的那几个人也通过各种门路，使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和绥远省蒙旗指导长官公署的官员点头答应，同意让贡嘎色楞承袭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贝子职位。巴云英正喜形于色，打算返回旗里，护理贡嘎色楞，行使札萨克权力之时。绥东抗日战争已经暴发，绥远军政首领已无暇顾及这些地方上的小事情。巴云英预料到形势不妙，当即返回包头，与跟随她多年的贺德功团长秘密商定，做好准备工作，并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

六、奔赴抗日战场

(一)、在前线的9个月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虽然在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及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决定走抗日的道路。但是时隔不久，他又抛出了曲线救国的理论，采取了表面抗日，实际上反对并企图消灭共产党的卑鄙手段。不但不组织全面抗日，而是节节败退。因此，在“七·七”事变后的短短几个月内，日本帝国主义就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我国北方大部，进而于民国26年（1937）10月17日侵占了西北重镇包头市。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一部分蒙奸于10月27日在归绥将伪蒙古政府改建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特别是乌兰察布盟诸蒙旗王公贵族、军政官员中原来就追随德穆楚克栋鲁普，并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一部分亲日派，此时已完全投降了日本，成为可耻的蒙奸。在此之前，巴云英于9月上旬返回包头，以长嫂的身份与掌印协理奇穆特林沁多尔济商讨如何发动全旗民众，支援抗日战争和整顿兵马奔赴抗日前线等有关问题时，奇穆特林沁多尔济不但不予理睬，反而说什么：“蒋介石、傅作义有那末多的军队和武器，还被日本兵打得溃退下来了，我们用这点儿兵力抵抗日本，能起什么作用？不是等于拿鸡蛋碰石头吗？依我看，还不如乘早携带细软家产住进偏僻的深山老林，观察其他旗县的动态，见机行事，保全自己，才是唯一的上策。”就这样，奇穆特林沁多尔济不听劝告，反与巴云英、史钦芳等人争辩近一个月。可是，他在这一段时间内并没有闲坐着，而是几次招集管旗章京阿尤尔扎那、梅林章京通嘎拉格、罗布僧达瓦、扎兰章京恩克巴雅尔、副官米齐德道尔吉等人，在阿尤尔扎那包头的家中，秘密商议投靠日本、维护其统治地位等有关事宜。巴云英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知道再费口舌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就率领恩

克达赖特务排的20多名士兵，与几个孩子和史钦芳一同来到位于现包头市郊区阿嘎如泰苏木浑地高勒其兄齐秘德斯仁（当时任昆都仑召德木奇喇嘛。德木奇是喇嘛教职，是负责监督，管理工作的）家里。在此，她招见了旗游击队的贺德功副团长，就如何开展抗日战争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奇穆特林沁多尔济闻知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归绥的消息以后，就从包头的妓女院带领一名汉族妓女，与罗布僧达瓦等10多人来到昆都仑前口子，留下其他人，只带罗布僧达瓦，两次到浑地高勒的齐秘德斯仁家，企图胁迫巴云英一起投靠日本。他第一次来，主要是敦促巴云英带领所部兵马，到达新忽热的旗衙门所在地，与绥境蒙政会副委员长巴宝多尔济和乌拉特中公旗札萨克诺颜林沁僧格共同商量如何投靠日本的有关事宜。被巴云英顶回去以后，他还不死心，第二次来到其住所时，竟盛气凌人地叫嚣道：“巴云英你如果还要脸的话，就把我胞兄传宗接代的一条命根子（指巴云英之子贡嘎色楞）交给我以后。你就请自便吧”。巴云英毫不让步地大声反驳道：“你自己不抗日，心甘情愿当卖国贼，出卖民族利益不说，还想拉拢别人投靠日本，这才是最可耻的事。关于你兄传宗接代的事，我比你考虑得多。你侄子的健康状况，我作为他的亲生母亲，比你关心得多。我只所以坚持抗日，正是为了维护你死去的兄长的声誉，是为了不辜负你哥的重托和遗愿。我们如果投靠了日本，即使现在不被砍头，将来也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其结果，不是被国民党杀害、就要被日本侵略者所伤害。所以，我宁愿为正义战斗站着死，也不愿苟且贪生跪着活。”俩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吵得越来越激烈。外面的护兵听到以后，怕出事，就使了一个计策，高声喊道：“昆都仑庙前有很多骑兵在跑动”。同时作出持枪直奔山顶的声响。奇穆特林沁多尔济和罗布僧达瓦二人听说有情况，就惊慌失措，奔出屋门、翻身上马，临行前还说了一句：“你要知道，如果不把我的侄子交给我们，将

来出了问题，有个好歹，我就永远与你没个完”。他们走后，巴云英立即与史钦芳、贺德功、齐秘德斯仁等人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两天以后她们作出如下决定：

第一步，让贺德功带领其一连人马驻守阿嘎如沟和广生隆沟口；若格瓦带领一连人马驻守旗衙门所在地新忽热和浩宁查干楚鲁；贺德胜一连人马驻守昆都仑后口子、哈布其勒音高勒、绍卜亥和查干达坝等地；总指挥设在今乌拉特中旗部北乡西部北村，分片把守，互相接应，迎击进犯之敌。

第二步，如果无法驻守或不宜驻守上述各地时，则将全部兵力集中于崆石太山北麓，以此为根据地，截击或骚扰日本侵略军的进犯。研究部署完毕以后，巴云英和史钦芳带领恩克达赖特务排的20多名士兵，决定暂驻昆都仑沟东山和西山，以探听消息，观察形势，再作决断。

正在此时，巴云英听说包头县自卫队大队长王锅扣为了避开日军，带领50多名骑兵逃到萨气湾的消息，考虑再三，决意收编这部分兵马，以扩充自己的兵力，遂亲自动身前往萨气湾，会见他们。见面后，未等巴云英开口，王锅扣就抢先说道：“我带来这50多名骑兵，就是想加入你们旗的游击队，万望贵夫人开恩接纳我们。”巴云英问：“你们为什么要参加我们的部队？”王锅扣答道：“听说日本人不向蒙旗武装部队开枪，而且还给予支持和帮助。我的部下大多数是本地人，不愿意舍弃家园远走他乡，所以就想加入您的部队，留在故土，照顾妻儿老小”。巴云英听完了他们的话以后，郑重其事地说：“日本人只是支持和帮助他们的狗腿子，而决不会支持我们的，你们要想加入我们的游击队，是可以的，我是欢迎的，但是有一条，那就是绝不允许不抗日而呆在家里，只要我们能够拧成一股绳，配合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保卫我们的家乡，我就可以接收你们，因此，你们内部要好好商量商量我的意见，再作决

定。”王锅扣立即召集班长以上军官，征求意见。经过商量以后，大家一致赞成巴云英的意见，加入了乌拉特东公旗部队，被整编为该旗游击队第二团。任命王锅扣为团长，王占海、王占山二人为连长，分别驻守昆都仑沟沙坝子、呼和楚鲁、阿泰沟、岱仁高勒等地。

有一天，王占海、王占山兄弟俩（人称大二砂口袋）到昆都仑前口子的窑子湾村催草料时，得知3名日伪军在一民舍奸污3名汉族贫苦妇女的消息后，出其不意地俘虏了三名日伪军并缴获了长短4只枪和3匹战马。随后，将那3名日伪军押到村西头的壕沟里处决了，为民出了一口气。驻在包头的日军知道此事后，给巴云英送来书信，要求她在3日内抓获杀人凶手，上交日军司令部。巴云英当时就对送信人说：“我部没有这个杀人凶犯，该案不是我们的人员干的”。此后，她对此事再也没有理睬。在其兄齐秘德斯仁家住了两个多月后，于农历正月中旬，巴云英才率领70多名官兵，沿白彦沟向东行至阿鲁博古图、阿尔斯郎沟等地，准备袭击包头至固阳县来往的日伪军。

时隔不久，王占山、石玉山之部攻打固阳县的日伪军，并一举攻破了县城。守城日伪军溃不成军，四散逃走。巴云英游击队的哨兵发现32名日伪军（其中有5名日军）向包头仓皇逃跑的情况下，立即作了歼敌准备：让王占山、王占海等8人扮做农民，身藏手枪，在卧榆树树内路旁杀猪，以诱惑敌人，其余人员全部埋伏在周围山顶，子弹上膛，等待那股日伪军的到来。那些日伪军走到村子里，看见几个农民正在杀猪，就觉得饥肠辘辘，饥饿和困乏之感一齐袭上心头，便吩咐马上做饭炖肉，准备饱餐一顿再上路。他们派出两人放哨，其他人都把枪架在院内，进屋休息。由于打仗行军过度劳累，一趟下就打起呼噜进入了梦乡。王占山、王占海乘机派两人佯装给两名哨兵送水，乘势夺下了他们的枪支。其余6人会同部分村民，收缴了那30人的枪支，进

屋把他们全部用绳子捆了起来。此次战斗，竟毫不费力地俘虏了32名日伪军，缴获了近40支步枪和手枪，还有2000余发子弹和50多颗手榴弹。入夜以后，将32名俘虏全部押往村外山沟里，予以枪杀。随后，他们连夜转移到今固阳县巴德格尔苏木的查干达坝沟和德岭沟。枪决完那32人以后，由于当时没有详细检查尸体，致使一名受轻伤的伪军挣扎着跑到包头，向其日本主子报告了事情的全过程。第三天上午，日军派飞机在空中盘旋，进行侦察，又从陆路派人分别给巴云英和管旗章京阿尤尔扎那送来书信，再三命令他们缉拿杀害32人的凶手，亲自送到包头，否则，连同阿尔斯郎沟、绍卜亥和查干达坝的群众一起进行围剿。已与日军有了关系的管旗章京阿尤尔扎那，当时就将此事如实报告了日军头目，并派图门吉尔嘎勒和牛占山的两个排，死守绍卜亥沟口，连巴云英也不让近前一步。而居住在查干达坝、阿尔期郎沟的梅林章京通嘎拉格、扎兰章京恩克巴雅尔、呼硕达木勒（即管事）贡布扎布等仕官，也被日军的威胁吓破了胆，再三恳求巴云英，将杀害32名日伪军的那些人交出去，免得众人受株连。在这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为了不使蒙汉族人民受牵连，吃苦头，巴云英与史钦芳、王锅扣等人秘密计议，商量对策，准备让王占山、王占海、李长胜等人带领部分军人演出一场发生兵变，绑架巴云英、史钦芳和王锅扣3人的假戏，以声东击西的方法，迷惑敌人，作战略转移。

那一天晚饭后，巴云英和史钦芳、王锅扣三人与往常一样趟在炕上抽大烟（鸦片），恩克达赖与小阿哥诺颜在当院玩耍。正当那几名仕官又进去请求巴云英抓紧处理上述问题时，李长胜带领两名士兵，闯入巴云英的屋里，用20响手枪猛射屋顶，弄得屋里顿时硝烟弥漫、尘土飞扬。李长胜扯开喉咙大声嚷道：“敌人很快就要向我们进攻了，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采取紧急措施？”同时命令士兵下了巴云英、史钦芳、王锅扣3人随身携带

的手枪，让士兵看住，自己跑出去找绳子去了。巴云英乘此机会对那几位仕官们说：“你们不必害怕，看来是我们的部下哗变了，顶多杀我等8人的头罢了，与你们无关。这时，李长胜手拿麻绳跑进来说：“你们快点把衣服穿好。”等他（她）们穿好衣服后，便一个个捆绑起来，对巴云英说：“现在要把你和乌尔图那顺、贡嘎色楞、史钦芳、王锅扣几人押送归绥城。交德穆楚克栋鲁普处理。”巴云英毫不畏惧地说：“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同时流着眼泪对梅林章京通嘎拉格说：“我将女儿秀仁其其格、次子达木林扎布二人托付给你了，你把我存在浑地高勒的乌力吉巴图（二秃子）家里的财产拿来，作为他俩的生活费用。好好照顾他们。枪杀日伪军的那件事，由我一个人负责。”尔后，又斩钉截铁地对李长胜等人说：“要杀要送，随你们便，你们给个快，行吧。”李长胜等人前前后后用枪逼着他们走出房子，扶上马背，直奔东方而去。他们走出查干达坝沟口，到达浑楚伦乃德布斯格（石人塔）村以后，解开他们的绑绳，结束了一场绑架头领的假戏，个个捧腹大笑，评说假戏演得很成功。之后，他们连夜顺着核尔窑子沟上去，翻过雪贵达坝（石灰坝）再调转马头，偏西行，黎明时到达茂明安旗的梅林乌拉，休息了一天。当夜幕降临以后，他们起身从固阳北绕过，又朝西北方向行至呼图克图山的王如水地，整整走了一夜。他们在这里休息了两天，并派人到姚保娃家中，给贺德功团长送去密信，约他到刘喜沟见面。

巴云英从率部抗击日伪军至民国27年（1938）4月，已有6个多月的时间了。在此期间，她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家乡，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战斗，夺取敌人的武器装备自己。吃不饱、穿不暖，以蓝天为被大地为床，露宿在荒滩野岭之中，相机出击，奋战不息。

然而，奇穆特林沁多尔济则伙同阿尤尔扎那、米齐德道尔

吉、通嘎拉格等人，受旗内外某些别有用心者的挑拨利诱，决定带领手下仅有的两个连的兵力投降日本军。有一天，奇穆特林沁多尔济在现乌拉特中旗部北乡道老呼都格村与从包头带来的那个汉族妓女趟下抽大烟时，梅林章京罗布僧达瓦与其弟豪济格尔二人率领20多名士兵到达该村，冷不丁地下了奇穆特林沁多尔济卫兵的枪，闯进屋里要杀那个妓女。这时，乌拉特东公旗投降而来的日方的一个姓白的科长看上了那个妓女的姿色，就上前说道：“不要杀害这个女人，把她交给我好了”。罗布僧达瓦因而也就不好下手，只好交给了他。随后，就派几名士兵，将白科长和那个妓女一同送往固阳时，途中被贺德功团长抓获。贺德功要枪毙那个日方的白科长时，那个妓女忙跪下捣蒜似地扣头央求道：“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是奇穆特林沁多尔济请来的人，你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杀害他呀，请饶他一命吧。”贺德功团长考虑到要让奇穆特林沁多尔济策反的问题，才放走了白科长他们二人。可是奇穆特林沁多尔济却叫人大失所望。他将满清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发给乌拉特东公旗的两枚札萨克印章都拿到旗政府所在地新忽热以后，以被盗为名，将满清政府于康熙25年（1686）正月赐给乌拉特东公旗的铸有满蒙两种文字的“乌拉特后旗札萨克印”交给唐德吉尔嘎勒，让他放在昭盖庙的甘珠尔、丹珠尔两大经文中间藏起来。该印章是用纯银铸成的虎形银柄印，重量为8斤1两3钱，而他自己身边只留下国民党中央政府发的铜制旗札萨克印。

民国27年（1938）夏，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任命奇穆特林沁多尔济为乌拉特后旗（东公旗）伪札萨克，额尔敦陶格套胡（乌拉特西公旗人）为札萨克助理；米齐德道尔吉为东协理，唐德吉尔嘎勒为西协理，罗布僧达瓦为管旗章京，封原管旗章京阿尤尔扎那为达尔罕安本。将原来的7个苏木（实则6个苏木，但本旗一直称扎鲁特铁宾为扎鲁特苏木，故为7个苏木）合并为

两个苏木，改称第一苏木、第二苏木。把石哈河乡改建为蒙古乡，任命大地主武三饶为乡长。在军事方面，废除了原旗军的建制，遣返了原兵丁中的老弱病残，留下了青壮年，组建了一个团，隶属于乌兰察布盟警备第六师。奇穆特林沁多尔济任团长，下设两个连，任命乌力吉呼图克、若格瓦二人为连长，每连3个排，共有150多名骑兵。兵力部署方面，命令若格瓦一连兵马驻守位于现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哈布其勒的乌拉特后旗伪政府、小学校和陶岭呼勒庙的日本特务机关；乌力吉呼图克的一连人马驻守位于现乌拉特前旗沙德盖苏木哈布其勒沟的协理米齐德道尔吉的家和固阳县巴德格尔苏木绍卜亥沟的达尔罕安本阿尤尔扎那家。在经济方面，乌兰察布盟实业处以满足广大牧民的生活必需品的要求和收购土特产为名，为日本人筹集货源，提供战争物资，扩大日货市场；要求各蒙旗以日商的投资为股金，建立合作社。在这种情况下，乌拉特后旗也在其驻包办事处建立了伪合作社，任命日本特务道尔吉桑布（绰号阿拉善哈日）为合作社主任，剥削榨取全旗蒙汉人民的血汗。

民国27年（1938）冬，奇穆特林沁多尔济当了乌拉特后旗伪札萨克不久，就娶了乌拉特中公旗驻包办事处处长德勒格尔桑17岁的女儿孟根花为太太。整日在包头寻欢作乐，无所事事，深深陷入了吃喝玩乐，贪图享受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在此之前，巴云英曾给他捎去过书信，还专门派人到包头，要求他认清形势，早日脱离日本帝国主义和那些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汉奸，为保卫国土，捍卫民族尊严，叔嫂团结一致，互相协助，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奇穆特林沁多尔济只是在口头上说过：“只要有会，就前去你处。”但是在行动上，却一直拖延下去，未能作出果断的选择。民国32年（1943）冬。奇穆特林沁多尔济一命呜呼，离开了人间。奇穆特林沁多尔济去世后，乌拉特东公旗的军政大权都落入了日本顾问纳卡泽瓦（中泽

明)和札萨克助理额尔敦陶格套胡, 协理唐德吉尔嘎勒等人手里。日本投降以后, 巴云英回到包头, 每次给我们谈起上述事情时, 都流露出一种非常痛心的样子。

民国26年(1937)10月中旬至翌年4月中旬, 抗日的国民党杂牌军遍布于磴石太山南北, 与贺德功的两连兵马杂居。然而, 日伪军和日本特务机关却已深入到了乌拉特中公旗的杭盖诺其等地, 该旗除了西部的阿鲁科尔沁、玛拉图尔两个苏木以外, 其余4个苏木都已沦陷。

巴云英按照预定计划, 深夜从呼图克图山的王如水地村来到现乌拉特中旗部北乡的刘喜沟, 会见了贺德功团长, 并召集扎兰章京若格瓦、衙门管家阿拉腾太岁、呼硕达木勒贡德桑布、扎鲁特苏木的哈温哈勒晋夫、黑亚苏木章京宝日夫和旗游击队连长以上军官参加的秘密会议。在会上, 巴云英首先向大家通报了当时的形势和过去半年来的抗日战争情况, 鼓励大家, 再接再厉, 团结一致, 互相协助, 拧成一股绳, 坚持战斗, 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接着, 她谴责了掌印协理奇穆特林沁多尔济、管旗章京阿尤尔扎那、梅林章京通嘎拉格、扎兰章京米齐德道尔吉等人与敌人相互勾结, 同流合污, 企图要挟抗日官兵, 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卑鄙行为。号召全旗军政官员团结起来, 互相支持, 为了保卫国土和家园, 带领广大人民群众, 采取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 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斗争。随后, 她征求了部分人的意见, 宣布了军队的整编计划和战略战术:

将全旗兵马整编为两个团, 任命史钦芳为第一团团长, 贺德胜为副团长; 任命贺德功为第二团团长, 王锅扣为副团长。

根据当时敌强我弱, 敌众我寡的情况和战局发展的形势, 应采取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 以开展游击战为主, 与敌人巧周旋, 相机而进退。一方面要想办法骚扰并借机消灭敌人; 另一方面, 要多做宣传教育和鼓动工作, 想方设法策反在日本方面的伪军,

以孤立日军，扩大自己的力量。在兵力的部署上，史钦芳的一个团和贺德功团的一个连驻守嶧石太山的阿格鲁沟和刘喜沟等两个沟口；贺德功的团驻守哈业尔呼都格，负责保卫固阳县的游击县政府。

日伪军方面也在时时刻刻密切注视巴云英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并且寻找机会妄想一举歼灭之。4月20左右，他们派出伪蒙古军第六师的巩（姓巩的团长）团和于振瀛两个团的500多名骑兵，分两路围攻哈业尔呼都格和刘喜沟，企图一网打尽巴云英的有生力量。驻守在哈业尔呼都格的贺德功团由于警惕性不高，戒备不严，而吃了大亏。团长贺德功等21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副团长王锅扣带领其余100多人，击毙敌军40多人，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出去撤回了嶧石太山。驻守在刘喜沟和乌兰板申的史钦芳团的官兵和巴云英，白天镇守刘喜沟，夜间宿营乌兰板申，人不离枪，马不卸鞍，枕戈待旦。当伪军夜袭刘喜沟时，首先与守在村外山头上的一个排接上了火。巴云英闻讯，立即和史钦芳率领160多名官兵，火速埋伏在刘喜沟口两侧的山头上作好战斗准备。此时，守在村外山头上的一排人马，按照预定方案，佯装战败，顺刘喜沟撤退。伪军以为巴云英部队的气数已尽，无法抵挡，便乘胜追击，妄图一举歼灭之，当他们穷追猛打，进入包围圈时，隐蔽在沟两侧山头上的部队，一齐开火，子弹像雨点似地射向沟底。嚣张一时的敌人顿时慌作一团。而巴云英的部队则凭借熟悉地形、居高临下的优势。打得伪军人仰马翻，抱头鼠窜，四散逃命。在这次战斗中共消灭了60多名伪军，缴获了50多匹战马和60多支步、手枪以及相当数量的子弹。巴云英的部队里只损伤了3人，打了第一次大胜仗，鼓舞了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巴云英游击队的名声陡然大增。从此以后，日伪军对巴云英的游击队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蛮横行事了。战斗结束以后，巴云英立即看望了王锅扣团的官兵，

重新整顿了部队，分别任命史钦芳，王锅扣为团长，贺德胜、张树华为副团长。因为在这两次战斗中消耗了很多弹药，如不立即补充，就很难继续作战，消灭敌人。为此，他们与国民党马占山的部队取得了联系，请求援助时，他们帮助解决了50000发子弹，并且相互配合，攻打了日伪军于振瀛的两个团。前后共消灭了敌军200多人，收复了失地哈业尔呼都格，一直将敌军追击到固阳县北的教堂。

是时，已是农历4月底，芒种也快结束了，部队急需更换夏装，补充弹药和粮食，为此事，巴云英急得坐立不安，万分焦急。当她得知国民党中央直属骑兵第七师师长兼绥西警备司令门炳岳的部队向东挺进，准备攻打盘踞在固阳县的日军的.消息后，立即委派张树华副团长和恩克达赖排长二人，前往小余太川，会见门炳岳部的朱巨林副司令，汇报情况，请求给予援助。朱巨林接见他们二人，听取情况汇报以后说：“巴云英的游击队在前线克服重重困难，与敌人周旋，牵制和消灭日伪军的情况，我是早有所闻的，只是有半年多时间没同她见面了，对于你们这种满怀爱国主义豪情，为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我深感钦佩。”他考虑了一下，又接着说：“我的部队现在只能给你们解决一部分子弹，其他问题在这里是无法解决的。目前，你们要与驻扎在崆石太南山的傅部安华亭旅取得联系，互相支援，互相配合，共同对敌，对你们战胜敌人，保存自己是很有利的。至于其他军需供应等问题，须马上去五原，与门炳岳将军直接联系，方可得到全面而彻底的解决。”

巴云英根据上述情况，马上召开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部署。经过充分的酝酿讨论，作出如下决定：尽快与安华亭旅取得联系，将自己两个团的兵力置于安华亭的统一指挥下，继续以崆石太山为根据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巴云英本人则带领少部分人马，亲自前往河套，拜

见门炳岳司令。

（二）成立防守司令部

巴云英与国民党骑兵第七师取得联系以后，决定联络安华亭旅，相互支援，共同对敌。为了尽快解决武器装备以及粮饷、服装等问题，她亲自带领恩克达赖特务排的20多名士兵和团长史钦芳、长子乌尔图那顺、阿哥诺颜贡嘎色楞等近80人，于民国27年（1938）农历6月初，从碛石太山刘喜沟启程，途经乌拉特西公旗苏独龙呼都格、高炮台村，从二驴子湾渡过乌加河，于本月12日抵达五原县城。

国民党中央直属骑兵第七师师长、绥西警备司令门炳岳等军政官员同几个月前来到河套的乌拉特西公旗札萨克诺颜石拉布多尔济之遗孀奇俊峰及其阿哥诺颜阿拉坦敖其尔到城门外，热烈欢迎巴云英及其一行。从五原县城东门至巴云英下榻的院（即五原县城居民顾二之院）门口，约有几千名官兵和居民排成长队，敲锣打鼓，高举旗帜和标语牌，夹道欢迎。巴云英在门炳岳等人的陪同下，缓步行进在高举“热烈欢迎从前线归来的女英雄巴云英！”“各民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胜利永远属于我们！”等标语牌的热烈鼓掌欢迎的人群中时，再也抑制不住满腔喜悦之情，被晒得略显黝黑的脸蛋儿上滚动着晶莹的泪珠，领着阿哥诺颜贡嘎色楞，不停地向欢迎的人群鼓掌致谢。傍晚，在五原县会元芳餐馆举行了军政要员参加的盛大宴会，为巴云英洗尘。主持宴会的门炳岳等长官，充分肯定了巴云英率领近两个团的兵力，在过去9个多月的日子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所取得的辉煌战绩。并祝愿她今后取得更大的胜利，为国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而频频举杯祝贺。巴云英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真诚的表示，今后要继续努力奋斗，坚持不懈地斗争下去，多消灭日本侵略军，报答各位长官和父老乡亲的关怀与支持。接着，她以蒙古人的礼节，向在座的长官和各界代表一一敬

献了三杯酒，表示衷心的感谢。

翌日，巴云英向门炳岳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详细汇报了乌拉特东公旗沦陷后，以掌印协理奇穆特林沁多尔济为首的，扎兰章京米钦夫、师爷唐德吉尔嘎勒、管旗章京阿尤尔扎那等一部分亲日派，跟随德穆楚克栋鲁普等，如何投靠日本，变成了蒙奸的全过程。同时也详细汇报了她自己在过去的9个月里，历尽艰险，如何率领两个团的兵力，抗击日伪军的实际情况。为了继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收复失地，解救遭受深重灾难的乌拉特东公旗各民族同胞，她诚恳地请求门炳岳司令，给她供应武器弹药和粮饷衣物等军需。门炳岳当时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蒋介石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当时傅作义在山西境内整训部队）电呈巴云英的抗日功绩。蒋介石、傅作义等立即复电，赞扬巴云英在乌、伊两盟王公贵族中首先站了出来，依靠自己的力量，不畏艰险，顽强战斗，坚持抗日8个多月的英雄事迹，对她所取得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嘉勉。对她要求继续抗日，决定从各方面给予援助。第二天，门炳岳代表蒋介石和傅作义慰问、嘉勉了巴云英及其一行。赐予4500多元现大洋的奖金，并向她转达了不久就要全面给她解决武器装备和衣物粮饷的消息。紧接着，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和绥远省蒙旗指导长官公署长官阎锡山。绥远省境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扎布等也纷纷来电，表示慰问和嘉许。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身披蓝天，头枕大地，明月当灯、山药蔓菁充饥，在荒山野岭中抗战8个多月的巴云英及其一行。激励了他们的斗志。振奋了精神，增强了必胜的信念。使他们恨不得马上返回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血战到底，收复乌拉特失地，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蒙汉族同胞。

6月中旬，接到国民党中央军政部颁发的命令，任命巴云英之子、阿哥诺颜贡嘎色楞为乌拉特后旗（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

诺颜和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少将司令。在其未长大成人之前，由其生母巴云英护理札萨克，代理防守司令；每月拨给1200元的军费开支以外，其他武器弹药，服装药品等，均由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负责供给。巴云英在绥西警备总司令门炳岳、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绥境蒙政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扎布、伊克昭盟警备总司令部司令陈长捷和乌拉特西公旗防守司令奇俊峰以及顾兆忠（此人是陈长捷最信赖的国民党特务，在巴云英组建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时介绍并推荐给她的参谋长。1942年，他以辞职为名，离开了乌拉特东公旗防守司令部，返回伊克昭盟警备总司令部，担任了参谋职务，参与了陈长捷镇压伊克昭盟人民的抗垦斗争。因此，于1943年3月26日，在札萨克旗再生召，与国民党特务王友兰一起被该旗保安队官兵所击毙）等人多方面的帮助下，于6月底，在五原县顾二的院内，正式成立了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成立司令部的仪式结束以后，巴云英举行了蒙古式的盛大宴会，款待各位长官和来宾。她以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和她的名义，按照蒙古人的礼节，首先向光临宴会的门炳岳等30多位长官和来宾，恭恭敬敬地一个一个地敬了三杯酒，对他们所给予的关怀与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接着，她也为30多名随行人员敬了三杯酒，对他们与自己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不怕流血牺牲，历尽千辛万苦，英勇抗击日伪军，为保卫家园而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忠贞不渝的气概，表示真诚的感谢。

巴云英报请国民党第八战区长官部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和绥西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门炳岳批准，分别委任史钦芳为上校副司令，顾兆忠为上校参谋长，蒋玉山为中校副官长，常有明为军需处中校主任，恩克达赖为特务连连长等职。又将前线的两个团扩编为三个团，分别任命王锅扣、贺德胜、张树华为团长，樊四为副团长（暂缺两名副团长）。考虑到为前线供应军需的方便，在今乌

拉特前旗长胜乡高炮台村设立了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军供站，任命高玉升为站长。随后，巴云英委托副司令史钦芳带领部分士兵将第八战区长官部提供的军火和粮食等军用物资运到磴石太山的刘喜沟，召开了连以上军官会议，传达并宣布了司令部的决定和委任状，把军用物资分发到各个连队。接着，以团为单位，在刘喜沟、乌兰板申和磴石太山南麓的那尔图等村集中整训，进行操练，并调整和配备了部队的武器和符号。经过半个多月的简单操练和整训，整顿了军风军纪，提高了部队在艰苦复杂环境下的应变能力和作战能力。随后，又部署了作战任务，继续配合傅部刘万春的骑兵游击师，以磴石太山、白音查干山为根据地，开展灵活多变的游击战争，袭击并消灭盘踞在固阳以西，小余太、明安滩的日军和以白凤翔（外号白三阎王）为首的日伪联军以及乌拉特三公旗的伪蒙古军和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蒙汉奸。直到第二年10月底，巴云英的三个团，人不离枪，马不卸鞍，与敌人混战了一年多，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帝国主义向西进犯的狂妄计划，将敌人力量分散在固阳和大余太之间，对傅作义在民国28年（1939）冬攻打包头，曾起到了有力的支持和配合作用。而盘踞在这些地方，横行霸道，狂妄一时的敌军。在这个时候都建立起三棱四角各式各样的城堡，钻进里面，从进攻转为防守，不敢轻举妄动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难料灾祸。巴云英在内忧外患，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站立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她曾得到史钦芳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并有了非同寻常的关系。因此，巴云英从心底里相信了史钦芳，依赖了史钦芳。遂于民国27年（1938）6月，报请傅长官和门司令批准，委任史钦芳为自己的副司令。为了消灭日本侵略者，收复乌拉特大好河山，巴云英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史钦芳身上，委派他到磴石太山的刘喜沟，把前线的三个团交给他，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但是，事与愿违，谁能料想到，史钦芳到达磴石太山以后，在国民党特务和别有用心者的煽动、唆使下，滋生了野心，妄图独树一帜，坐第一把交椅，步步升官发财。在翌年10月底，他擅自带领前线三个团的500多兵马，投靠了傅部骑兵游击总司令刘万春的麾下，被授予少将军衔，任第五支队长。巴云英听到这一消息，肺都快被气炸了。她马上拜见傅作义将军，汇报了所发生的情况。要求立即收回全部人马和武器装备，对史钦芳不能姑息迁就，要按军法论处，严惩不贷。傅作义不慌不忙地回答巴云英的问题，并为她消气，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你现在不要急，要顾全大局，要考虑对抗日有利的一面，要想招回史钦芳，不能操之过急，如果鲁莽行事，就可能导致狗急跳墙，跑到敌人那一面去的结果。因此，你要不辞劳苦，先亲自跑一趟，到那里劝一劝他。如果不起作用，我们随后再作工作”。

巴云英只好按照傅作义的指示，带领阿哥诺颜贡嘎色楞、特务连长恩克达赖、副官贡布扎布等近20人，到敌我交界的磴石太山刘喜沟。见了史钦芳以后，她曾以上司的身份批评教育过，也从原先关系甚密的角度对他哭过，劝慰过，亦曾说过如不悔改就要向上报告，让上面儿派人来捉拿等等威胁恫吓的话语。任凭你怎么说，怎么磨，史钦芳就是不予理睬，反而，还满不在乎地说什么：“你是一个妇道人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在朝廷里记了名，民众中有了声誉的阔太太了，还不心满意足，搞什么抗日，受那份儿洋罪，正不如呆在后方，让一个连的部队保护着，精心培养你的阿哥诺颜，调养好身子，平平安安地过日子，这比什么都强。我呢，永远也不回你们旗的部队啦，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边说话边抽大烟，还目不转睛地盯着趟在他身旁的一位年轻妇女，并不时地伸手摸着她的手背，捏着她的脸蛋儿。巴云英为了招回史钦芳，从五原来到磴石太山刘喜沟，忍辱负重，与其磨蹭了10多天，也没起到一点儿作用。在她返回五原的头一

天，被敌特知道，连夜领来1000多名敌军，围攻刘喜沟，妄图一网打尽。巴云英和史钦芳共同与敌人交战，进行反击。战至午夜，巴云英背起阿哥诺颜贡嘎色楞，用绿绸腰带与自身绑好，跨上战马，手提20响的手枪，悄悄率领以恩克达赫为首的20来名士兵，冲出包围圈。黎明时分，来到达坝乃高勒的西梁，隐约看见后面追上来10几个敌军，巴云英等迅速隐蔽起来，待他们靠近后，一个不留地全部消灭掉，并缴获了10匹马，11支步枪和手枪。接着，他们马不停蹄继续向河套进发。行至石纳干山，遇见了被武驼羔缴了全连武器，只带一名护兵身背长短3支枪回家的李俊峰。

因为李俊峰原先就认识巴云英，而且深知她是一个为人正直，光明磊落，有胆有识，处事果断，深谋远虑的人。所以，一见面就哭哭啼啼地说：“我虽然是一个有田地孩子的富裕人家，但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疯狂地进行烧杀抢掠的时候，我做为一个中国人，怎能呆在家里，袖手旁观，任其嚣张呢？所以，我才主动地参加了武驼羔的抗日游击队。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会把几个坏家伙儿干的事栽在我的名上，缴了我全连的武器，把我撵了出来，我本打算回家料理一下，就去找您，参加您的部队；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这儿碰见您，真是三生有幸，太叫人高兴啦！我想参加您的部队，巴司令肯收留吗？巴云英毫不犹豫地说了声“行”就欣喜地领着他们连夜赶到了设在乌拉特前旗长胜乡高炮台村的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军供站，才放心歇息了两天。巴云英回到了防守司令部以后，立即召开了在五原的全体官兵会议，通报了史钦芳拉走部队，搞分裂的情况。并郑重地宣布了撤销他的职务，把他驱逐出乌拉特后旗，永远不再使用，最后一定要以军法严加惩办的决定。与此同时，她把李俊峰介绍给大家，赞扬他为保卫神圣的祖国，消灭日本侵略者而舍生忘死地前来参加抗日救国战争的爱国主义精神。任命他为本旗防守司令

部上尉参谋。会后，她又拜见了傅作义副长官，详细汇报了此次去楂石太山刘喜沟为招回史钦芳所做的一切努力和被敌人包围后如何冲杀出来的经过，同时也汇报了路遇李俊峰，接收并任命他为上尉参谋的情况。接着，她再一次请求傅长官马上给绥远省骑兵游击总司令部下达命令，责成他们迅速收缴和归还史钦芳带走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但是，以傅作义为首的军政官员，虽然在口头上表示同意归还这部分武器，而在实际上并不抓紧时间从速解决。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首先，傅作义统治绥远以来，就一直阻挠各蒙旗势力的强壮和兴盛。

其次，傅作义于1937年秋，奉阎锡山之命，率部去保卫太原。在与日军作战中，损兵折将，伤亡惨重，部队战斗力迅速下降，从此，他与阎锡山的关系导致了破裂。后经蒋介石允许，他收拢余部，来到河套，招兵买马，扩充军备。恰在此时，史钦芳带领巴云英三个团的500多骑兵，全副武装投入到他的麾下，对他的扩军备战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正好象打瞌睡给了个枕头，饥肠辘辘时给送来一块儿肥肉，他当然是不愿意轻易放弃的。

再则，傅作义被调往太原以后，阎锡山让赵承授到归绥，准备接替傅作义的绥远省主席职务，但时隔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占领了归绥、包头等地，赵承授因为在绥远省站不住脚，就悄悄跑回了山西。是时，国民党中央骑兵第七师师长门炳岳已担任了绥西警备司令，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他又为了争当绥远省主席而积极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范围，大力扶持绥境蒙旗王公上层，及时向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汇报积极主动参加抗日救国战争的巴云英、奇俊峰等抗日爱国志士的抗战功绩，并进行嘉奖勉励，帮助其晋职进级，援助武器和食品。因此，傅作义对他只能是忌妒之心，而不能有任何不满的言论和

行动。所以，对史钦芳拉走部队，与巴云英搞分裂之事，傅作义就没有及时予以解决，而且一直拖着不予办理，致使巴云英的防守司令部变成了一个除了特务连以外，再没有任何战斗力的空架子司令部了。

（三）赴重庆谒见蒋介石

国民党中央直属骑兵第七师师长门炳岳在抗日战争中舍生忘死，英勇奋斗，积极参战，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从而闻名全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赞扬和拥护。但是，门炳岳的抗日救国正义斗争，实际上有碍甚至破坏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名曰抗日实则反共的阴谋诡计。而且，也因为门炳岳和傅作义的关系处得不甚和睦，国民党中央于民国28年（1939）春，提升门炳岳为国民党中央骑兵总监，从前线调回重庆，调离了直接统率骑七师的领导岗位。情况既然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门炳岳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对策，他一方面想借用绥西王公，上层中抗日有功的蒙古族女英雄巴云英和奇俊峰等人之口，向国民党中央和某些高级官员反映并报告他本人在绥西的抗日功绩，以得到国民党中央以及某些高级官员的理解、承认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也确实为了帮助解决这两位蒙古族女英雄面临的实际困难和存在的具体问题。他回到重庆以后，就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建议，让巴云英、奇俊峰等人到后方稍事休息的同时，汇报抗日前线的情况和各自的旗政，参观游览一些名胜古迹、机关团体，使她俩进一步了解国内形势，开扩眼界，提高思想觉悟，继续顽强地投身于抗日救国战争，为全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作出榜样，以推动全面抗日。他的这一建议，正好可以成为蒋介石及其一伙反共势力的表面抗日，实际反共阴谋的遮羞布，也正合他们玩弄两面派手法，蒙哄欺骗广大人民群众的伎俩。所以，蒋介石当时就表示同意，并于当年11月下旬，电告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让他安排巴云英、

奇俊峰二人携带阿哥诺颜前往重庆汇报工作，到南方参观游览，调养休息数月。

傅作义按照电文的要求，立即着手作了妥善的安排。他派部下把住在五原县金先生圪旦的巴云英和住在梅林庙的奇俊峰二人叫到五原，转告了国民党中央的来电精神。并吩咐道，你们二位的路费盘缠已决定由绥境蒙政会支付，到榆林后，护送你们南行的车辆和人员，均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负责解决，这些问题已经谈妥，请你们回去以后，做好准备工作，尽快启程。接着，又秘密地告诉二位女司令：“我们拟于下月攻打盘踞在包头市的日军，届时，你们两旗的部队也要在统一调遣和指挥下，参加战斗。乌拉特后旗的部队要部署在黄河南岸，乌拉特前旗的部队要部署在古仁高勒（姚亮湾）以西太阳庙以南，听从指挥，协同作战。”最后，他又向巴云英吩咐道：“史钦芳带走的三个团，仍叫驻守原地，等你回来以后，我们再想办法解决。”

生长在塞外牧区，从小没有出过远门的巴云英，在战火弥漫的抗日前线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厮杀了9个多月以后，突然获悉赴内地参观游览，入都晋见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难于言表。巴云英回到驻地以后，立即着手进行赴渝汇报请训的准备工作。她首先将防守司令部的全部工作交给特务连连长恩克达赖负责管理，又把高炮台村的军供站和与前线联络的人员全部撤回五原，指示他们要作好准备，在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的统一指挥下，积极参加战斗。接着，她组织了一个以阿哥诺颜贡嘎色楞、长子乌尔图那顺（乌仲秀）、上校参谋长顾兆忠、中尉副官贡布扎布（现住乌拉特中旗巴音哈太苏木哈太嘎查，牧民）、彭承基（现住包头市东河区金龙王庙街）、曹德铭等人组成的人都汇报参观团。随后，又按照傅作义的部署，吩咐手下的70来名官兵渡过黄河，到南岸与门炳岳将军曾经指挥过的骑兵第六军协同作战，消灭敌人。巴云英作好了一切准备，于12月中旬，正要与

奇俊峰一同启程时，傅作义的部队攻打包头市日伪军的战斗也打响了。巴云英考虑到，傅部攻打包头，日军为了报复，可能要骚扰或偷袭他的后方——河套。她为了防备万一，征得傅作义的同意，将本部军政人员的随军家属疏散到农村，作了妥善的安排，才干公历12月24日从五原出发，由近20名士兵护送，渡过黄河，入伊盟南行。于本月30日，到达设在伊克昭盟札萨克旗王府的绥境蒙政会所在地。正巧，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部奇俊峰司令也与她同日到达札萨克旗王府。

巴云英带领贡嘎色楞和顾兆忠二人，与奇俊峰一起参见了伊克昭盟盟长兼绥境蒙政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扎布。互致问候以后，巴云英向沙克都尔扎布委员长详细汇报了乌拉特东公旗的情况。在谈到收回史钦芳带走的枪支弹药时，巴云英请求沙克都尔扎布委员长出面，鼎力协助，据理力争，尽早解决问题。随后，他们又商谈了此次赴重庆的具体路线、时间以及路费盘缠等问题。沙克都尔扎布高度评价了巴云英的抗日功绩，并表示对其存在的问题，要竭尽全力，帮助解决。巴云英、奇俊峰二人在这里过了新年，又共同参加了土默特特别旗总管荣祥、郡王旗王爷图布欣吉尔嘎勒札萨克旗札萨克诺颜鄂齐尔呼雅克图等3人荣升绥境蒙政会常务委员的就职典礼。尔后，巴云英领取了绥境蒙政会资助的500块现大洋的路费，于元月4日从札萨克旗王爷府再生召出发，直奔榆林。

巴云英骑马直行于元月7日抵达榆林，下榻绥远省蒙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招待所。第二天，送走了护送她到榆林的20名士兵，吩咐他们沿途要遵守军纪，不得胡作非为，早日回到防守司令部。傍晚，奇俊峰一行也到达榆林，与巴云英同住一个招待所。此后，她俩共同参见了绥远省蒙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副长官朱受光、国民党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邓宝珊等官员。一方面与他们商谈如何赴渝谒见蒋介石等许多问题，另一方面等候送他们

到西安的车辆，就在榆林住了60多天。在这段日子里，驻榆林的陕西、山西、绥远等省的军政官员、群众组织代表、商界头目纷纷举办宴会和晚会，热烈欢迎从前线归来的抗日女英雄巴云英、奇俊峰，赞扬她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发扬视死如归、英勇作战的精神，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斗争所取得的战果。黎圣伦等许多记者也相继采访了她们，并在各个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二位女司令的感人事迹。巴云英和奇俊峰在榆林候车期间，一方面积极参加了各种社交活动，广泛接触了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拜访并征求了汇集在榆林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和掌管绥远省蒙旗事务的军政机关负责人对绥远各蒙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交通运输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她们二人再三电请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蒙藏委员会，要求早日解决送他们到重庆的交通工具。巴云英和奇俊峰在榆林期间，也商谈东西两公旗入都汇报团要结伴同行，并在南行的途中及至到达重庆以后的各种场合下都要采取一致的步骤和礼节等问题。

国民党中央终于发来电报，责成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派出两辆汽车，护送巴云英、奇俊峰等人到西安。邓宝珊司令见电后，立即派出两辆汽车和20多名士兵，于3月18日启程，护送巴云英、奇俊峰等一行，驶向古都西安。关于这一段的历程，巴云英的侍从、中尉副官贡布扎布回忆说：“我们在3月18日上午9时许，乘坐二战区派给我们的汽车，疾驶近一天，于下午6时左右，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北青化镇附近的八里铺村，与乌拉特西公旗女司令奇俊峰一起住进了八路军的军供招待所。傍晚，该招待所设宴招待了我们，宴会是在十分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晚上9点钟，我们又应邀参加了热烈欢迎巴云英、奇俊峰的文艺晚会。欣赏了八路军文艺工作队演出的别开生面的精采节目。其中一个节目中这样唱道：

“奇司令、巴司令
智勇双全的女英雄
率领部队上前线
击溃残暴的日本军，
巴司令、奇司令
英勇善战的女英豪
打得日本侵略军
丢盔擄甲往回跑，
以少胜多显神威
做出贡献真不少
真心诚意来感谢
成吉思汗的好后代……”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动人场面，也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贡布扎布还说：“文艺晚会一直持续到夜间12点钟，八路军军供站的官员也始终陪着我们观看演出，文艺晚会结束后，他们还不辞辛劳地把我们送回住处。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又来欢送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话别”。又据贡布扎布和当时同往重庆的巴云英之长子乌尔图那顺（现在巴彦淖尔盟医药公司）二人回忆，巴云英和奇俊峰从五原启程前，曾商量过途经延安时，要晋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可是，当我们一行抵达榆林以后，兼任乌拉特西公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的黄楚三也急急忙忙地从杭锦旗赶到了榆林。此人一到榆林，就伙同巴司令的参谋长顾兆忠，勾结榆林地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秘密活动。最后，除了黄楚三以外，还有几个国民党大特务决定要跟随巴云英、奇俊峰前往重

庆。针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为了避免途中发生意外，保证巴云英和奇俊峰母子的安全，也考虑到抵达重庆以后，在谒见蒋介石以及让蒋介石和国民党其他头面人物解决问题时，不致于受到影响和麻烦，遂临时取消了去延安晋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首长的决定。因此，在八里铺的八路军军供站招待所只住了一夜。

3月19日早8点出发，9时途经延安时，也未曾停车，继续向南行驶，日头落山时，到达陕西省耀县。才住下歇息。3月20日中午，我们到达了闻名于世的中国古都——西安。”

巴云英等人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在西安的胡宗南为巴云英奇俊峰及其一行洗尘，邀请西安市的军政官员和各界代表人士参加，设宴款待了他们。在这个盛大的宴会上，奇俊峰欣然代表乌拉特东公旗、西公旗的汇报团，致词表示感谢。奇俊峰慷慨激昂的演讲，博得了满堂阵阵掌声，激励了人们的爱国热情，给宴会增添了热烈的气氛。

巴云英一行按照胡宗南和西安市市长的安排，与护送他们去西安的二战区官兵一起，游览观赏了古都西安的名胜古迹。随后，为这些官兵举行了答谢宴会，对他们在一路上所给予的关心和照顾，表示感谢，祝他们一路顺风，平平安安地早日返回榆林。巴云英等人稍事休息后，与奇俊峰一起，乘火车偕行去了成都，在那里观赏游览了三天，乘坐门炳岳派来接他们的专车，到达战时的陪都——重庆市。他们刚刚驶入重庆市郊，门炳岳就亲自前往迎接，并安排巴云英、贡嘎色楞及其随行人员下榻蒙藏委员会招待所。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蒙藏委员会纷纷派代表前往巴云英下榻的招待所探望他们，安排了他们参观游览的活动，并且商量了谒见国民党中央领导和有关方面长官以及汇报工作等等具体事宜。在晚上，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热烈欢迎并盛情款待了从祖国北部边陲前来的巴云英、奇俊峰等。

国民党中央高级官员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吴忠信、门炳岳以及重庆市市长马超俊等人出席宴会并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巴云英、奇俊峰二人的抗日功绩。赞扬她俩是具有高度爱国主义思想的杰出女性，是参加抗日战争建立功勋的蒙古族女英雄，是在全国蒙古王公贵族中最早站出来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战争的女杰。宴会上，奇俊峰代表乌拉特西公旗和东公旗的汇报团致词，表示衷心的感谢。翌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大公报”蒙藏委员会主办的“边疆日报”都发表了以“行政院、军政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西蒙两女王”为题的重要新闻，引起了山城重庆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从而，她们的名声闻名于国内外。

巴云英到达重庆以后，在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蒙藏委员会等中央有关部门汇报情况时，主要谈了以下几点：

一是简要地汇报了她本人发动乌拉特东公旗广大军民，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德穆楚克栋鲁普等蒙奸，使我国北方各族人民，特别是敌我交界处的乌拉特东公旗、西公旗的大余太、小余太、渣石太山附近的蒙汉人民深深陷入了战争的灾难之中，受尽了日伪军的摧残，屡遭抢劫烧杀，生活日渐贫困，饥寒交迫，度日如年，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悲惨情景。

二是详细汇报了乌拉特东公旗西协理、临时护理札萨克印的奇穆特林沁多尔济伙同管旗章京阿尤尔扎那，利用手中之权，擅作主张，追随德穆楚克栋鲁普和乌兰察布盟亲日派，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组建了乌拉特东公旗伪政府，自己充任了乌拉特东公旗伪札萨克和乌兰察布盟伪蒙古军警备第六师乌拉特东公旗的团长职务，强迫并绑架无辜的农牧民子弟，加入伪蒙古军，充当日本侵略军的炮灰等真实情况。请求国民党中央和各有关部门，全面扶

持边疆地区的弱小民族，早日解救他们使其摆脱水深火热的困难境遇。

与此同时，据巴云英长子乌尔图那顺和中尉副官贡布扎布二人回忆，巴云英在拜见国民党中央高级官员时，分别赠送了锦旗。又据民国29年（1940）2月12日记者黎圣伦在陕西榆林采访时撰写的“西蒙两女杰”一文中写道：1月13日晨，乌拉特东公旗巴云英在榆林，向绥远省蒙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副指导长官朱绶光献旗。此外，业已制就准备向国民党中央高级官员呈献的多面锦旗。其旗上字句如下：

国府林主席——领导全民
蒋委员长——民族救星
蒋夫人——女中豪杰
行政院孔副院长
 ——翊赞功高
军政部何部长——明耻鼓战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蒙旗领导

注（*林主席是林森主席）

巴云英、奇俊峰二人到达重庆以后，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要求解决的问题，基本上相似，但其多与少，轻与重，则各有特色，在此，只将巴云英提出的几点期望和建议简述如下：

一是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虽有500多兵马，但是这支部队的武器装备是各式各样残缺破损的枪支，且三分之一的士兵没有枪，有的则是有枪没子弹，缺乏粮食，没有军装，军饷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希望国民党中央、军政部和军事委员会及时拨给足量的军火、粮食、服装和军费开支。

二是敌我交界处的广大人民群众遭受战争洗劫，生活穷困潦

倒，难以维持生计，希望政府给予适当的救济。

三是乌拉特东公旗西协理、临时护理札萨克印的奇穆特林沁多尔济把国民政府发的印章与满清时期的旧印章一起拿去，投靠了日本。而现在的札萨克诺颜贡嘎色楞，则手中没有札萨克印信，无法行使札萨克权力。因此，希望中央废止旧印，补发新的札萨克印章。

巴云英在重庆等待解决上述问题期间，与奇俊峰一起参观了重庆市的名胜和机关、工厂、学校。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还应邀作了介绍抗日前线情况的报告，有时是宋美龄亲自陪同去的。

巴云英和奇俊峰二人向中央有关部门以及高级官员呈递的请求书和建议案，经过门炳岳多方面的活动和努力，终于被送到蒋介石身边，到了他最后说话签字的时候了。因此，蒋介石决定亲自召见巴云英和奇俊峰，听取她俩的情况汇报，解决她们提出的问题。6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国民党军政部给巴云英打来电话，说当天下午蒋委员长要在复兴关的官邸接见巴云英、奇俊峰等。并对被召见的人员作了严格的限制，只准巴云英和她的王子贡嘎色楞以及参谋长顾兆忠三人在巴文俊和门炳岳二人引导下，晋见蒋介石夫妇。下午，门炳岳和巴文俊二人按预定时间前来接巴云英、奇俊峰引见蒋介石。

当他们来到蒋介石的官邸，要进入这个有三道岗哨的四合院时，每一个人都经过两次搜身以后，才由蒋介石的贴身警卫领进会客厅。刚坐下不久，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何应钦、吴忠信二人陪同下，来到会客厅，接见了巴云英和奇俊峰等人。在会见时，身着粗布军装的巴云英、奇俊峰二人向蒋介石和宋美龄行了军礼，而身穿蒙古袍的贡嘎色楞和阿拉坦敖其尔则按照蒙古族礼节，行了跪拜礼。接着，贡嘎色楞在雕有全龙图案的两只精制的银碗内盛满了洁白的鲜牛奶，分别用5尺长的银白色哈达托起

来，跪着献给了蒋介石和宋美龄二人。巴云英接着又向他们二人呈献了两面精制而漂亮的锦旗。一切礼节完毕，大家坐定以后，巴云英和奇俊峰才开始汇报乌拉特地区的蒙汉族人民倍受日本帝国主义和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及其追随者的蹂躏和压榨，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境况。同时也简单地汇报了各自的旗政和参加抗战的情况。请求尽快解决存在的问题，以便立即返回前线，痛击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这一次接见，蒋介石夫妇俩表现出了异常慈悲与和善，打破了以往会客的惯例，一直交谈了三个多小时，再三赞扬巴云英和奇俊峰的抗日功绩，称赞她们俩是蒙古民族女中豪杰，是抗日巾国英雄。对她俩提出的希望和请求，答应马上解决，并当场作出如下决定：

责成行政院，为乌拉特后旗补发一枚旗札萨克印章；由何应钦负责，让军政部直接拨给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汉阳造步枪100支，子弹10000发，冬夏军装200套；为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由中央直接拨给12000元银币，作为应急费用；粮食和日常开销，在战争年代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负责供给；关于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救济问题，待蒙藏委员会调查研究，作出详细计划以后，逐步予以解决。蒋介石夫妇俩还赏赐给巴云英、奇俊峰及其两个阿哥诺颜事先做好的、非常合身的冬夏呢子军装各一套；美式左轮手枪各一支。接见结束以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官邸设宴，与巴云英、奇俊峰等共同进餐。翌日，重庆各报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蒋委员长和夫人接见了西蒙女王巴云英、奇俊峰，并在官邸共进晚餐”的消息。

巴云英在重庆期间，会见了国民党中央蒙藏委员会委员，在该委员会工作多年的绥远省土默特旗的巴文俊，并由他介绍，加入了国民党组织。不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就为巴云英、奇俊峰二人安排了职务。民国29年（1940）10月28日在“大公报”上登载了这一消息：“察绥蒙旗党务特派员办事处，顷奉令

改组伪绥远蒙旗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由白海风为主任特派员，章文轩、奇文英、康王及东公旗女王巴云英、西公旗女王奇俊峰、王天籁等为特派员，赵城璧为书记长，此后将有新发展。”

巴云英按照蒋介石的指示，通过蒙藏委员会领取了补发的乌拉特后旗札萨克印和应急经费12000块现大洋。因为路程遥远，且运输不方便等原因。双方商量决定。应由军政部直接领取的100支步枪、两挺机枪、10000粒子弹和军装等军用物资，改为从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提货，并且当时就办妥了一切转供手续。

巴云英不辞劳苦，从祖国北部边陲跋山涉水，抵达重庆。谒见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汇报边政，聆听谕示，期望解决的问题都已解决，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因为她迅速返回河套，率领部队消灭敌人，拯救众乡亲，收复家园心切，故于9月22日从重庆启程，匆匆登上了回乡的路程。因此，在“大公报”9月23日头版头条刊载了一则消息。

巴云英启事：

云英率子贡嘎色楞，入都展觐，致敬请训，并报告边政。辱蒙各级长官，公私团体暨社会贤达，或颁奖词、或贻珍品，其态备至，铭感不既，迨以在都公毕，即将遄返防御，率部杀敌，濒行匆匆，未及告辞，谨布谢忱。

敬请，鉴谅是幸。

因交通不便，巴云英一行从重庆启程后，辗转跋涉，历尽艰辛，于11月11日晚才到达兰州。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大公报”刊载消息一则：

“东公旗女王巴云英抵兰”

中央社兰州十二日电 乌盟东公旗女王巴云英，十一日晚由陕抵兰，俟晋谒朱司令长官致敬后，日内即返绥西。

巴云英抵达兰州，晋见了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报告了

她本次前往重庆，谒见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情况和参观游览的情景。接着，谈起了她本人此次奉中央军政部的命令，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领取军火和军装等问题。并请求朱司令长官派出汽车和部队，将这批军用物资护送到河套。

朱绍良司令长官按照中央军政部的指示，从东部军火库如数供给巴云英汉阳造步枪100支、机关枪两挺、子弹10000粒、冬夏军装各100套以外，又增供了俄式马鞍50副、皮大衣100件、子弹10000粒。另外，还赠送给巴云英、贡嘎色楞母子俩加拿大式手枪各一支，以示鼓励。并决定派两辆汽车和一个排的兵力，将其一行护送到银川，再让马鸿逵派汽车和部队，护送到河套。巴云英在兰州停留了一个多星期，将上述军用物资如数领取并打点好以后，于11月20日从兰州出发。巴云英途经兴隆山时，下车祭祀了成陵（即建立在兰州市东南20公里处兴隆山上的成吉思汗之陵寝），在陵前烧香点佛灯，敬献了哈达和供品，叩拜致祭行礼。祈求保佑后代安然无恙，兴隆昌盛。他们于11月24日到达银川，下榻银川市饭店。马鸿逵亲自迎接并设宴款待了他们。席间，巴云英结识了马鸿逵四姨太刘慕霞，并在三天的短暂交往中，与她结成了结拜姊妹。11月27日，马鸿逵派两辆汽车和部分士兵，护送他们北归。于28日傍晚，顺利地回到了思念已久的河套陕坝。住进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招待所，结束了长达11个月的旅途生活。

（四）重整旗鼓，整训部队

巴云英、奇俊峰二人前往重庆，汇报边政，沿途游览了很多名胜古迹，开阔了眼界，增长了学识。经多方求助，最后达到了目的，满足了要求。同时，也博得了全国人民的高度评价，为蒙古民族，特别是为乌拉特蒙古人争得了崇高的荣誉。

在他们奔赴重庆的11个月期间，绥远省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傅作义率部攻打包头，歼灭了日伪军的大批有生力量，打

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完成了牵制华北地区日军的作用。后见日本援军不断增加，遂令部下停止战斗，向河套转移，作战略撤退。而日本侵略军则尾追其后，乘势占领了河套地区的部分城镇。两月之后，傅作义重新调集，部署兵力，调整战术，进行了全面反攻。这一次，日军遭到惨痛失败，伤亡甚多。幸存下来的部分日军之南路退到今乌拉特前旗西山咀以东，中路退缩到今乌拉特前旗大余太以东，北路则龟缩在今乌拉特中旗杭盖戈壁苏木杭盖诺其，川井苏木的川井壕赖，乌兰苏木的朱勒格太、萨门岱庙、新忽热苏木的哈布其勒等地。敌我之间的激战局面暂时趋于缓和状态。傅作义的反击战取得了辉煌战果，名扬国内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誉和支持。

沦陷区内的乌拉特后旗新忽热伪政府，于民国27年（1938）冬，被国民党杂牌军枪劫后，付之一炬，变成了一片废墟。民国29年（1940）秋，在现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哈布其勒建造了房屋以后，乌拉特后旗伪政府，小学校和日本特务机关暂时迁驻于此。另外，傅作义组织全面大反攻，歼灭了日军主力，收复了五原以后，以恩克达赖为首的特务连全体官兵和司令部的一部分人员，从伊盟杭锦旗的沙漠中返回陕坝，迎候巴云英的凯旋归来。

巴云英满怀消灭敌寇、收复家园的雄心壮志，刚回到陕坝，还没来得及休息，就急着拜见了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详细汇报了本次去南方参观游览的情况和国民党中央给解决的几件事儿。并向傅作义请战，要求立即扩充兵马，奔赴前线，消灭日伪军，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各族同胞。对此，傅作义将军和八战区其他长官都表示赞赏和全力支持。并对巴云英今后的任务和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作了具体指示。指出：“今后要减少大部队作战，抓住敌人的薄弱点，组织小股部队打游击战。同时要重视和做好策反伪军的工作，以加强自己的力量。因此，

你们旗现在应尽快组建一个团，分成几个游击小分队，深入沦陷区。并在开展游击战的同时，做好对旗民的宣传鼓动工作，加紧策反与招降，牵制并消灭敌军。你自己应留在陕坝，总揽全局，统一领导。”

巴云英根据傅作义长官的指示精神，立即着手筹划，周密部署，积极而稳妥地开展各项工作。首先，她把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从陕坝迁往现巴彦淖尔盟杭锦后旗南渠乡张留柱圪旦村，为了便于联系工作，又在陕坝镇的西沙梁买下一处房屋院落，成立了乌拉特后旗政府暨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驻陕坝办事处。委任其兄齐秘德斯仁为办事处处长。并配备了几名工作人员。把阿哥诺颜贡嘎色楞送进傅作义成立的奋斗学校读书，她本人则住在张留柱圪旦，除了领导军政全盘工作以外，还不失时机地抓了以下几项主要工作：

1、整训部队，准备作战

巴云英此时有史钦芳分裂出去后剩下的和在战斗中缴获的枪支共百十余条，再加上从重庆领回来的100支，总共有200多支步枪。她根据自己武器弹药的情况和傅作义的指示精神，组建了一个团，任命李俊峰为代理团长，张凤山（又名张来锁）为代理副团长，顾文斌、杜桂林二人为连长。巴云英吸取以往的教训，没有把武器全部发放出去，只给李俊峰团50支步枪（其中30支是特务连换下来的旧步枪，20支是刚领回来的新步枪）和一挺机关枪，子弹5000发。缺额部分让其自行设法解决。李俊峰他们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那就是，他们让不愿意去傅作义部队当兵而逃出来的壮丁出钱，从国民党杂牌军那里购买枪支弹药。及至民国30年（1941）农历2月底，该团两个连六个排已经有了120多人马，近100支枪。是年3月，巴云英将李俊峰团与特务连的官兵都集中在张留柱圪旦村，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整训，在提高战斗力的同时，进行了政治、思想

和形势教育，加强了纪律，强化了制度管理。整训完毕，即派往前线，以明安滩、小余太、渣石太山为根据地，化整为零，组成精悍的小分队，抓住机会，袭击敌人。

2、扶贡嘎色楞继承札萨克

包头沦陷以后，奇穆特林沁多尔济和他们的同伙追随日本帝国主义和德穆楚克栋鲁普等部分盟旗的蒙奸，成立了乌拉特后旗伪政府，自己充任了傀儡札萨克。当时，巴云英虽然多次批评指责过他，指出和宣布了他们的伪政府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并号召全旗蒙汉人民起来，坚决抵制和反对傀儡政府。但是，自己手中没有札萨克印信，这些话只能是以会议上的讲话和以个人名义签发的便条而传布，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更不能象盖有札萨克印章的公文那样有威力，有效果。

因此，巴云英从重庆归来以后，就在民国30年（1941）农历正月20日，以苍天保一岁，大地保一岁，母亲保一岁的增龄方法，将10岁的贡嘎色楞之年龄增至13岁，达到了继承札萨克诺颜的合法年龄，简单地举行了继承札萨克仪式，让幼子贡嘎色楞登上了札萨克诺颜的宝座，在米仓县张留柱圪旦村正式成立了乌拉特后旗政府。鉴于贡嘎色楞年纪尚幼，国民党中央已同意在其未成年之前，由其母巴云英任护理札萨克。因此，当时还专门印制了国民党中央批准的“关于贡嘎色楞承袭乌拉特后旗札萨克，其母巴云英任护理札萨克的告示”和“关于废除奇穆特林沁多尔济的伪政府和他劫走的乌拉特后旗旧札萨克印的公告”，加盖札萨克印章后，予以正式公布。

3、坚持策反与讨伐并举的战略原则，取得了显著成绩

巴云英为了及时全面了解旗内的情况，于是年3月，委派特务连连长恩克达赖和副官贡布扎布二人，身着蒙古装，前往今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赛音浑地的哈勒晋夫（巴云英堂弟）家，送去一封信，让他从旗内挑选几名能在陕坝与本旗之间传递信息，

联络关系的可靠而又机灵的蒙古人，去陕坝协助自己开展工作。哈勒晋夫接到信以后，就与恩克达赖、贡布扎布、贡德桑布（又名贡素）和罗布僧达瓦等人商量，一致认为可以推荐阿贵图庙的伊希敖斯尔（汉名傅守忠）和邦郎赖（汉名白宝生）等两名喇嘛去陕坝最为合适。随后，他们征求本人意见，均表示愿意协助巴云英，搞联络工作。遂让他俩身着喇嘛服，与恩克达赖和贡布扎布一同前往陕坝。从此以后，他们二人在本旗就是阿贵图庙的喇嘛，到达河套，就成了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的副官（伊希敖斯尔为上尉副官、邦郎赖为少尉副官），一直干到日本投降为止。

他们二人遵照巴云英的指示，回到旗里与哈勒晋夫商量以后经过努力，首先做通了本旗伪蒙古军连长、梅林章京若格瓦的工作，使他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从此以后，若格瓦就以伪蒙古军连长和梅林章京等职务为掩护，暗地里帮助巴云英开展抗日斗争，及时给她报告敌人的动向，以及往河套秘密运送军用物资，经费和大烟等物的情报。随后，他们又有针对性地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促使本旗伪合作社主任道尔吉桑布、监事喇嘛夫、售货员宝日夫、大吉仁太、伪蒙古军排长图布欣、协理米齐德道尔吉（又名润月子）、伪蒙古乡乡长武三挠等人认清了形势，改变了立场，开始为巴云英效力。民国30年（1941）冬，伪蒙古军孙卜尔巴图（人们简称孙卜尔）排长也在邦郎赖等人的启发帮助下，毅然带领白·敖其尔、东如布、色仁巴勒吉尔、色日吉楞、宝日朝鲁等青年，携带10多支步枪，到达河套、投奔巴云英的抗日阵线。巴云英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并任命孙卜尔巴图为少校连长，白敖其尔为副连长。编为李俊峰团的第三连，在李俊峰的统一指挥下，以现乌拉特中旗巴音哈太苏木阿尔乞山、新忽热、阿日呼都格、包格太、巴音温都尔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

民国32年（1943）冬，乌拉特东公旗伪札萨克奇穆特林沁多尔济和协理米齐德道尔吉相继病故，刚任伪政府西协理的

唐德吉尔嘎勒则掌握了乌拉特东公旗伪军政大权。他掌权不久，就娶乌、伊两盟烟草统治会会长恩克乌力吉（巴云英三姐夫）的次女为妾。从而，由巴云英的冤家对头一下子变成了她的外甥女婿。伊希敖斯尔、若格瓦、武三挠等人抓住机会，不失时机地对唐德吉尔嘎勒做思想工作。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他认识到抗日与亲日的利弊关系。认清日本帝国主义早晚要垮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为旗民、为故乡多办点实事和好事，及早站到巴云英的抗日阵线一边来，是每一个乌拉特东公旗蒙古人应选择的道路等等许多道理。由于形势的发展和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唐德吉尔嘎勒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与巴云英和好，合作。

可以说，自民国33年（1944）以后，位于现乌拉特中旗新忽热和石哈河地区几个乡的地盘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区内，但实际上还是被掌握在巴云英的手里。民国30年（1941）至民国31年（1942）底。今固阳县公义明、红泥井、老羊壕以西至现乌拉特中旗石哈河地区的四个乡，乌拉特前旗大余太、小余太、明安、朝阳乡等农区，一方面连续两年遭受严重旱灾，颗粒无收，人民没吃没穿，饥寒交迫，另一方面，又连续几年受战争洗劫，更使广大人民群众无法生存，贫苦农民领着妻儿老小，背井离乡，逃荒要饭，流落他乡。地主富农害怕抢劫，也相继流入固阳、萨拉齐、包头等城镇。致使这一地带变成了一片荒凉而渺无人迹的地方。因为敌我双方都无法占据这一地区，所以，于振瀛为首的伪骑兵师，白风翔为首的伪同盟军骑兵也都退到固阳以东。只有以伪警察部队为首的一股武装力量还死守关隘、战略要冲。敌我双方较大的武装冲突也大大减少了。

巴云英的部队在史钦芳分裂出去以后，经过张留柱圪旦的整训，渐渐恢复了元气。至民国30年（1941）底，有了较强

的战斗力。从这一年底至民国34年（1945）秋，曾先后多次袭击了驻守在位于今乌拉特前旗大余太以东，固阳县以西的明安滩，小余太川，今乌拉特中旗石哈河地区，新忽热、陶赖庙、阿日呼都格庙的日伪军和盘踞在这些关隘的特务机关。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消灭了日伪军和地方上的土匪。为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乌拉特失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下面就此，列举几例：

（1）李俊峰第一团的孙卜尔、顾文斌两个连，在民国31年（1942）1月的一天深夜，围攻了驻扎在现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保卫伪政府的伪蒙古军22团的一个连，敌军顿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落荒而逃。结果，打死敌军7人，打伤10多人，缴获步枪12支，战马10多匹，还缴获了一部分子弹和手榴弹。随后，放火烧了伪政府房屋，撤回磴石太山根据地。

民国32年（1943）12月，李俊峰团第一连连长杜桂林率领40多名士兵，夜间偷袭了驻扎在固阳县公义明村的伪武装警察部队。打死3人，缴获5支步、手枪和一部分子弹，手榴弹。

（2）民国33年（1944）秋，巴云英从陕坝到达现乌拉特中旗德岭山乡水泉村和乌拉特前旗长胜乡高炮台村等地，看望了李俊峰团的官兵，并指示李俊峰率部攻打盘踞在明安滩、陶赖庙、哈布其勒（乌拉特东公旗伪政府所在地）阿日呼都格庙等地的敌特机关和武装警察部队。李俊峰遵照巴司令的命令，率领本团3个连的150多名官兵，在9月底的一个深夜，兵分两路，同时袭击哈布其勒与陶赖庙的日本特务机关。袭击哈布其勒一战，击毙伪蒙古军3人，活捉13人，缴获了很多枪支弹药。临行前，又纵火烧毁了他们的房屋。可是，陶赖庙的日本特务，不知怎么起了疑心，两天前就跑到了巴音温都尔，在牧民宝音巴达尔胡家附近搭起两座蒙古包，住了下来。宝音巴达尔胡将此情

报悄悄告诉了要攻打陶赖庙的孙卜尔连长。孙卜尔根据宝音巴达尔胡送来的情报，决定兵分两路，同时袭击陶赖庙和巴音温都尔两地。他们在巴音温都尔，打死了三个日本特务中的两个，活捉了日本特务三田道太郎，击毙了希日布扎木苏和关其克等两名特务，还活捉了宾巴、那顺敖其尔二人。缴获手枪步枪共6支，一部电台和密码。为了交任务，他们割下那两个被打死的日本特务的一只耳朵，满载胜利果实而归。回去以后，他们将割下的耳朵和几个特务以及电台，密电码等一起交给傅作义，得到了傅作义和国民党中央的嘉勉。负了伤而躺下装死的那个日本特务，在割他的耳朵时，忍着剧痛，未敢动弹半点儿。待孙卜尔、陈得智等人走远以后，他挣扎起来，从野外抓了一匹马骑上，就直接跑到了阿日呼都格庙的日本特务机关。几天之后，孙卜尔、白敖其尔惊悉这一情况，立即带领30多名士兵，直捣阿日呼都格庙的日本特务据点，但是，那个被割去一只耳朵的日本特务已乘汽车去百灵庙就医去了，只抓获并处决了他的几个爪牙——一身披喇嘛服的当地特务。

关于这一件事，日本投降以后，乌拉特中公旗札萨克诺颜林沁僧格于民国36年（1947）春，给巴云英的公函中指出：你旗防守司令部一团的孙卜尔曾在民国33年（1944）冬，枉杀阿日呼都格庙的桑布、巴扎尔等3名喇嘛，并抢走了他们的钱物、骑乘，现应依法查办，并如数追回被抢之财产，归还其亲属。另外，你旗米齐德道尔吉与国民党部队一起，抢劫并焚烧了我旗衙门和我的府邸及本巴套海庙、德其德气勒庙的事件，也应一并予以查办。

巴云英在复函中让我（本文撰写者）这样写道：

“在抗日战争期间，孙卜尔、白敖其尔等人消灭日本特务及其爪牙、奸细和伪军，是受傅作义长官和我的命令干的，在长期的战争中，无辜百姓被卷入其中枉遭伤害或士兵违犯纪律的事也

可能会发生。但是，现在首先应该将那些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使乌拉特地区惨遭蹂躏，使许许多多无辜的老百姓在遭屠杀，又把为数不少的蒙古族青壮年强迫拉去充当日军炮灰，以金钱和牲畜、绒毛等畜产品支援日本帝国主义的蒙奸严加惩办以后，再查处孙卜尔的问题，也为时不晚，可否？请札萨克诺颜您将我的意见禀告盟长大人，明鉴为盼。

另外，关于抢劫和焚烧你旗衙门、王府以及本巴套海庙、德其德气勒庙的问题，是因为米齐德道尔吉与乌拉特后旗伪札萨克诺颜奇穆特林沁多尔济勾结伪乌兰察布盟军政头目，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当上了乌拉特后旗伪协理以后，傅作义的一部分杂牌军才放火烧了米齐德道尔吉的家园，并抓走他本人。在消灭盘踞在你旗境内的日伪军和日本特务机关时，强迫他做向导时，米齐德道尔吉已经死了，即便他活着，现在的政府也没有道理负责过问此事的，请将这个问题也一同禀告副盟长巴宝多尔济，为幸。”

（3）智擒樊四、为民除害

樊四原系巴云英部下的一名副团长，以后跟随史钦芳分裂出去，投靠了刘万春，在他部下任副团长。民国31年（1942）春，他从途中抢走了傅作义送给归绥、包头等地的谍报活动经费。事情败露以后，傅作义立即派人捉拿樊四，不料，樊四闻讯，抢先一步带领40多名骑兵逃出去，当了惯匪。因此，傅作义又给刘万春下命令，叫他在较短的时间内消灭樊四一伙，但是，刘万春派部队追赶了半年多，也没有消灭掉。

民国32年（1943）秋，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上尉排长杜桂林从前线经过乌拉特前旗四柜渡口渡过乌加河回河套时，驻守该渡口的傅部宪兵队队长田恒业问他：“你刚从前线回来，小余太、石哈河地区樊四的土匪现在怎么样啦？你知道不？”杜桂林回答说：“那些土匪现在一天比一天多啦。”田恒业队长非

常惊奇地说：“傅作义副司令长官为了捉拿和消灭这一帮匪徒，不是给刘万春下命令已有半年多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灭掉呢？”这时，杜桂林毫不在意地说了一句大话：“消灭这帮土匪哪能用半年多的时间呢，只有两个星期就足够啦。”言者无意，闻者有心，田恒业队长马上将此事如实报告了傅作义。傅作义当时就给巴云英打电话说：“有一件要紧事，我要面见你们的杜桂林排长，请你马上带他来见我。巴云英放下电话，惴惴不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待杜桂林到达陕坝以后，就领着他去见傅作义。

傅作义见到巴云英等人，就直接问杜桂林：“你说过只需半个月就能消灭樊四那帮土匪，你到底有什么好办法？”杜桂林回答说：“谈不上是什么好办法，只是我们俩从小就在一块儿，而且长大以后，又是一起到乌拉特后旗部队当兵的好朋友。我想，我可以从老朋友的份儿上去接近他，设法抓住他。”傅作义听罢杜桂林的话，就果断地说：“那好，这个任务就由巴云英负责，交给杜桂林去完成吧！你一定要在两周内活捉樊四，回来给我交任务，如果活捉不了他，你也就别回来了，与樊四一块儿当土匪呢，还是去当汉奸呢，由你自己决定吧！”接着，他给杜桂林拨了10000发子弹和部分手榴弹。回到东公旗司令部以后，巴云英委派代理团长李俊峰和排长郭海如二人，协助杜桂林去完成这一任务。他们领了任务，合计了一下，决定先找史钦芳和樊四妻子，让他们二人各写一封信，规劝樊四改邪归正，回乌拉特后旗部队，消灭日本侵略者，立功赎罪，为人民办好事。他们三人带上史钦芳和樊四老婆的信，带领20多名士兵，到达磴石太山南麓，派专人把信送给樊四。樊四看完了信，顺便和送信人商量好与杜桂林、李俊峰、郭海如等人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随后，他们在指定地点见了面，互致问候以后，就躺下抽大烟。杜桂林等人乘机掏出手枪，下了樊四及其四个护兵的枪支，把他们捆起来，押

到陕坝，交给了傅作义。

傅作义决定立即枪毙樊四。在把樊四押到刑场，执行死刑之前，他要求与杜桂林说几句话。当杜桂林靠近他时，樊四用血红的两眼怒视着杜桂林，唾骂道：“好一个奸诈狡猾的杜鬼林，你鬼得好，就算你今天杀了我，我那40多人也不会轻易放过的，一定要向你讨还血债，我看你也比我多活不了几天啦”。杜桂林嗤之以鼻，轻蔑地说：“你那40多人，我也会叫他们一个不留地跟你去见阎王的。”处决了樊四以后，傅作义又对杜桂林说：“你刚才不是说一个不留地消灭樊四的40多人吗？现在我给你派4名助手，帮助你消灭樊四的40多人，你要能一个不留地把他们全部消灭，我就封你个团长职务；如果办不到，你就提上脑袋来见我吧！”

杜桂林没说二话，就把任务接受下来。与李俊峰、张来锁一起带领40多名士兵，向磴石太山进发。到达磴石太山以后，他们先派人打听这帮土匪的行踪。根据探听到的情况，他们采取了围追堵截的战术，除了在战场上击毙的以外，其余的全部活捉了。但是在俘虏中有杜桂林的一个亲戚，他乘别人没注意，就将此人悄悄塞进了自己的部队里，把其他俘虏都一个个勒死了。事后，傅作义派去四个助手中的一个发现了该土匪，便把他从队伍里拉出去，用刺刀捅死了。

回到后套，傅作义知道此事后，没有封杜桂林为团长，只提了一个少校连长；任命代理团长李俊峰为上校团长，代理副团长张来锁为中校副团长。并赞扬巴云英是消除地方上的匪患，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击手，而予以嘉勉。

（4）招抚包头市伪警察

民国33年（1944）10月间，李俊峰率领所部三个连的兵马，到石哈河地区、大余太、小余太明安滩等地，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在此期间，他们在固阳县公义明以西，现乌拉

特前旗明安乡菅家窑子以东的山前，与日伪警察部队打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仗。在交战的前一天，已决定投靠巴云英的包头市警察部队大队长杨占荣派人给李俊峰送来一份紧急情报。情报的内容是：

“包头市与固阳县的警察部队决定在10月20日深夜，遥相呼应，偷袭你部。具体方案如下：从麻池调遣两汽车警察沿昆都仑沟上去，与我部配合起来，在大奴气以西的菅家窑子一带袭击你部；另一路是固阳县的马警察在公义明以西、大奴气以东地段偷袭你部。请火速采取措施。”

李俊峰根据杨占荣送来的情报，立即采取对策，制定迎战方案：一是命令杜桂林连长和陈得智排长二人，率领20多名骑兵，迅速赶到昆都仑沟中部的哈木图沟口大阴湾悬崖旁，截击晚上从麻池开来的两汽车伪警察部队；二是命令高孟喜带领两个班的士兵，分做两股，分别部署在大奴气、菅盘湾一带，等杨占荣率部从昆都仑沟后口子开来时，虚张声势，假装还击。战不多时，就相继撤退；三是他本人率领孙卜尔、顾文斌两个连的兵马，到达公义明，截击固阳县的马警察。作战任务下达以后，他们迅速赶到各自的指定地点，作好战斗准备。

20日晚10点钟左右，满载警察的两辆汽车拖着长长的烟尘，从昆都仑沟口疾驶而来，当汽车驶到哈木图沟口大阴湾时，杜桂林率领士兵，居高临下，从崖顶向两辆汽车投出数枚手榴弹，并指挥士兵猛烈射击。两辆汽车顿时瘫痪下来，敌人慌作一团，跳下汽车抱头鼠窜。这一仗，打死伪警察7人，打伤10多人，炸毁两辆汽车，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有效地遏止了伪警察部队进犯我根据地的行动。之后，杜桂林就率领部队撤离了大阴湾，上了昆都仑沟西山。杨占荣带领80多名骑兵，到达大奴气和阿贵图庙沟口，佯攻高孟喜的两个班。高孟喜率领的两个班也虚张声势，进行还击。战不多久，高孟喜装作败退。杨占荣率部追击

10几里以后，声言怕中计上当，即令部队停止追击，撤回驻地。李俊峰与张凤山、孙卜尔、顾文斌等人率领部队到达公义明，占据有利地形，截击从固阳开来的70多名马警察。这一仗共打死打伤37人，缴获20多匹战马，37支步枪和分子弹、手榴弹。

民国34年（1945）7月，包头伪警察部队大队长杨占荣率领其150多名官兵，正式投靠了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巴云英当即任命杨占荣为中校团长。继续指挥原部队。

（五）购买粮食，接济旗民

惨遭日本铁蹄蹂躏和战争洗劫的乌拉特后旗人民，从民国30年开始，又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旱灾，田地里颗粒无收，大部分农牧民断了口粮，挣扎在死亡线上。原先就一心想接济遭受战争洗劫的劳苦老百姓而再三请求国民党中央给予援助的巴云英，这时拿出国民党中央和绥远省政府拨给的一点儿救济款，从河套购买了200石（容器、一石为十斗，一斗粮食约重30市斤）小麦和糜子，运到乌拉特前旗长胜乡高炮台村。因为害怕被土匪和国民党杂牌军抢走，就秘密通知格格瓦、哈勒晋夫、罗布僧达瓦、武三挠、杨三毛仁等，让他们用骆驼悄悄运回石哈河地区，说是跟武三挠、杨三毛仁购买的面分给群众。分完这一批粮食以后，巴云英又考虑到这点儿粮食也维持不了多久，如不再继续抓粮食，后山地区的老百姓还要挨饿，甚至有的还会被饿死。因此，她又给上述几个人去信，让他们从旗内购买大畜和小畜，赶到河套，用牲畜换取粮食。民国31年（1942）冬，他们把买下的500只羊、80匹马，20头牛赶到了河套，巴云英亲自带领恩克达赖连长和高玉升副官，到达现乌拉特中旗同义隆等地，换取了430石小麦和糜子，让他们运回旗里，才算解决了乌拉特东公旗后山人民在大灾之年能维持生计的口粮问题。因此，广大人民群众伸出大拇指，夸奖巴云英是人在河套，而心系后旗人

民的好司令。

（六）惩治史钦芳

民国28年（1939）10月，史钦芳虽然从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拉走3个团的兵力，投奔绥远省骑兵纵队，任第五支队长。但是，他的部队纪律松弛，各行其事，胡作非为。不仅在前方抢夺民财，为匪作乱，而且其部下的樊四副团长还从半路抢走了傅作义送给共的谍报活动经费，变成了惯匪，等等原因，引起了傅作义的极大不满。所以，傅作义在民国31年（1942）免去了史钦芳的第五支队长职务，任命为骑兵纵队参谋，同他的20多名侍从一起招回纵队部，调离了指挥第五支队的领导岗位。巴云英乘此机会，又一次要求傅作义归还史钦芳带走的全部武器。傅作义没有直接回答巴云英的问题，而是责成史钦芳亲自去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面见巴云英，向她承认错误，听从她的处置。

史钦芳带领其20名侍从，威风凛凛地到了张留柱圪旦村，要见巴云英。可是，巴云英不但不马上接见，反而将史钦芳和他的侍从隔离起来，叫他静等了3天。到了第4天，才决定接见史钦芳。并严格规定，不准史钦芳随身携带武器和护兵，只准他独自一人前来晋见，而且接见前还对他的全身进行了搜查。史钦芳虽然变成了巴云英的仇人，但是，巴云英见到他以后，仍然跟以前一样，豁然大度，有说有笑，无所不谈。当提到让他归还带走的全部武器时，史钦芳摊开两手，沮丧地说：“现在我没有权力了，我已经错了，请你原谅我吧。”这时，巴云英毫不客气地说：“那你就向大家承认错误去吧。”巴云英一面跟他说话，一面与参谋长杜子英抽大烟。在这一段时间内，特务连的士兵们已经按巴司令的指示收缴了史钦芳侍从的武器和20多匹马，并以手势告知了巴云英。当她知道这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时，便故意提高嗓门儿叫来副官贡布扎布，吩

咐道：“快点儿集合恩克达赖的特务连和司令部的全体官兵，聆听史司令训话。”不多时，队伍已经集合完毕。巴云英、杜子英两人领着史钦芳来到队列前，未等史钦芳站定，巴云英就上前揪住他的衣领，里外搥了几个耳光，打得手痛才停了下来，顺手撕去他胸前的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副司令的黄边上校符号，用手指着他的鼻子，厉声说道：“对这个败类，我们不能姑息养奸，一定要以军法严加惩办，现在，就把他拉出去枪毙了。”此时，参谋长杜子英、秘书韩浪汝、副官蒋玉山等人出来为史钦芳求情，请求巴云英饶恕他这一次。巴司令见此情景，私忖片刻以后，郑重地宣布道：“今天看你们的面儿上，可以免他一死，但是，我们乌拉特后旗军政部门永远不再使用这个丧家犬，现在就把他轰出去！”话音未落，巴云英就把站在队列前低头认罪 of 史钦芳从背后一脚踹倒在地，转身走进屋里去了。因为怕死而浑身淌着汗水，象一只落水狗似的直打哆嗦的史钦芳，半天才醒悟过来，领着他那几个手无寸铁的侍从，丧魂落魄地溜走了。

（七）凯旋而归

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惨痛的失败之后，于民国34年（1945）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伟大的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八年，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和民族的尊严，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个个扬眉吐气，兴高采烈，感到无比的高兴。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坚韧不拔地奋战了8个春秋的巴云英，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多年流离失所的流亡生活就要结束了，重返家园，与全旗蒙汉人民一道维护地方治安，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过安居乐业的日子。这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就要实现了。因此，她此时此刻的激动心情是与众不同的，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在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并命令他从陕坝起师东进，做好接受日军投降工作。傅

作义立即发动其军政主力，部署了全线向东挺进的任务。同时，他还指示巴云英、奇俊峰马上返回本旗，抓紧时间做好本旗伪军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接收工作。对如何处置蒙汉奸这个问题，要等待国民党中央做出具体决定再说。

巴云英根据傅作义的指示精神，带领防守司令部和特务连的全体官兵以及其他官员共80多人，于8月12日，从现在的巴彦淖尔盟杭锦后旗南渠乡张留柱圪旦启程，到达五原县的金先生圪旦村，稍事休息，便派人提前返回旗里，安排并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命令李俊峰从前线带领一个连，火速赶回包头，接管乌拉特后旗伪政府办事处和伪合作社，立即封存全部财产，妥善保管，不得有误。

二是命令本旗伪蒙古军第一连连长若格瓦、贡德桑布，第二连连长乌力吉呼图克（汉名赵福海）、图门吉尔嘎勒（汉名赵青山）等人。详细清点武器弹药，登记造册，驻守原地，提高警惕，严防敌特的破坏活动，维护地方治安，听候札萨克诺颜和防守司令部的安排。

正在此时，执掌乌拉特后旗伪军政大权的协理、伪蒙古军的团长唐德吉尔嘎勒和协理宝音吉尔嘎勒、管旗章京阿拉腾太岁，连长暨梅林章京若格瓦等人也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马上聚到一起，商量对策。经过认真磋商，终于派出了一个以管旗章京阿拉腾太岁、连长若格瓦、贡德桑布、苏海图苏木章京罗布僧达瓦、文书阿拉腾敖其尔、侍从丹巴培勒吉等人组成的请命团。由伊希敖斯尔邦郎赖二人领着，于8月16日抵达五原县金先生圪旦，拜见了巴司令和札萨克诺颜贡嘎色楞。阿拉腾太岁和若格瓦恭恭敬敬地向巴云英司令和贡嘎色楞札萨克请安问好以后，请他们早日驾临旗府，恩泽全旗民众，接着敬献了美酒与哈达，表示迎驾。随后，他俩向巴司令汇报了旗里的形势和几天前因不明底

细而上当受骗，被伪蒙古军第七师22团团团长特木尔骗走部分枪支弹药的情况，并再一次请求巴云英司令和贡嘎色楞札萨克早日起驾回旗。在其后的两天内，巴司令跟他们商定了回旗的时间、停留住宿的地点和人数以及饮食问题。巴云英还给阿拉腾太岁等人赠送了五支武汉制步枪和分子子弹。叮嘱他们尽快回去，抓紧时间做好迎驾的准备工作。同时还委派特务连连长恩克达赖、副官伊希敖斯尔等20多人与他们一起提前回去，帮助工作。阿拉腾太岁一行到达金先生圪旦，向巴司令和札萨克诺颜贡嘎色楞作了请示，接受了任务以后，于本月18日和恩克达赖、邦郎赖等人一起登上了回旗的路程。

8月24日这一天，风和日丽，乌拉特草原鸟语花香，分外妖娆。巴云英带领120多名官兵，抵达现乌拉特中旗楚鲁图乡白音查干村时，唐德吉尔嘎勒、宝音吉尔嘎勒、哈勒晋夫、罗布僧达瓦、喇嘛夫等仕官与300多名官兵和旗民高举旗帜，敲锣打鼓，出村迎接。当欢迎的人群走近时，年近50、留着乌黑的剪发头，穿着军装、腰挎手枪，精神抖擞的英雄妇女巴云英走下轿车（马拉轿）望着盼望已久的故乡和久别重逢的家乡父老，欣喜的泪水象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扑籁籁地往下掉。她顾不得擦眼泪，领着阿哥诺颜贡嘎色楞通过夹道欢迎的人群时，频频敬礼，鼓掌致意，向大家表示真诚的问候和感谢。25日中午到达现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的敖包乃恩格尔（地名）有4间土房、10多座蒙古包的乌拉特后旗政府所在地。巴云英首先进入世代供奉札萨克诺颜神祇和祭祀满清时期旧札萨克印信的供室，与贡嘎色楞一起，点燃香火，敬献了哈达和供品，叩拜祈祷完毕，才回到了住房。

欢迎巴云英司令和贡嘎色楞札萨克诺颜的宴会开始时，唐德吉尔嘎勒从供室里取出满清时期发给乌拉特后旗的虎柄札萨克印，用5尺长银白的哈达托着，毕恭毕敬地走到坐在正中的巴云

英和贡嘎色楞面前，高高举过头顶说：“仁慈的司令女士、尊敬的札萨克诺颜，现将我旗沿用几百年的先世之旧印呈献于您。”他边说边把印章呈递给札萨克诺颜贡嘎色楞。这时，坐在贡嘎色楞身旁的巴云英，不知是想起唐德吉尔嘎勒在7年前盗走这一旧印之事，而心中燃烧怒火？还是因为他（指唐德吉尔嘎勒）从仇人变成了自己的外甥女婿，至今未给任何处分，而继续留在协理的重要位置上任用，担心群众将来说三道四，背地议论？待贡嘎色楞接过纯银旧印，刚刚置于面前的供桌上时，巴云英就怒不可遏地训斥道：“唐德吉尔嘎勒，你当初盗走此印藏在昭盖庙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我会象今天这样返回来吧？你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和德穆楚克栋鲁普，妄图永远统治乌拉特东公旗的美梦已化为泡影，今天把此印还交给我的时候，你不感到痛心吗？从今以后，你如果再这样胡闹，我是绝对不会饶恕你的。”巴云英说到此停下来，把印信交给站在唐德吉尔嘎勒身旁的阿拉腾太岁，叫他拿回祭祀室，让值班喇嘛诵读圣经，消除晦气，按照旧俗，供奉祭祀。接着，他们与防守司令部的官兵，侍从和旗政府公职人员一起参加了15只羊乌查（即整羊背子）的盛大宴席，一直宴庆到深夜。

翌日，巴云英同司令部以及旗政府的官员们一起商讨并安排了本旗当前的军政工作。与此同时，参谋长杜子英、国民党乌拉特后旗党部书记长兼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中校参谋长陈振华（土默特旗蒙人）、中校副官长吕兆祥、协理唐德吉尔嘎勒、宝音吉尔嘎勒等仕官根据前几年流亡政府未能给贡嘎色楞举行承袭乌拉特后旗札萨克诺颜的庆典之实际情况，提出要为已故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之子贡嘎色楞举行继承乌拉特后旗第13代第17位札萨克的盛大庆典的建议。经过商讨，大家统一了意见，定于9月3日在现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陶赖呼勒庙补办为期3天的盛会。唐德吉尔嘎勒、宝音吉尔嘎勒、阿拉腾太岁、若

格瓦、嘎拉僧格力格（衙门管家）等人负责全部筹备工作，并按时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喜庆盛会。本旗军政官员，蒙汉族人民和临近的乌拉特中公旗、西公旗以及茂明安旗的牧民共计600多人参加了庆祝活动和蒙古民族传统的那达慕大会。会上安排了64名摔跤手和120多匹马参赛的远距离赛马以及射击比赛等项目。

9月3日上午，喜庆盛典如期举行。管旗章京阿拉腾太岁主持了大会。身穿蒙古袍、头戴札萨克诺颜紫红顶戴帽子的贡嘎色楞与其母巴云英并排坐在银白色的硕大的帐幕正中，接受仕官、亲戚朋友和居民敬献的哈达、骏马、银两和绫罗绸缎等礼物。随后，巴云英用蒙语，贡嘎色楞用汉语，真诚地感谢大家的祝愿，并且表示今后要与全旗民众一道发展生产，建设家园，为使大家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而努力奋斗。接着，他们还向大家宣布了以下几条：

1、额王之子贡嘎色楞现因年幼而不能亲政。经国民党中央和绥远省政府批准，俟其长大成人之前，其生母巴云英任乌拉特后旗护理札萨克和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司令，统制全旗。

2、乌拉特后旗伪军政官吏中的大部分虽然在近几年才站到了抗日阵线一边。但是他们原先是在表面上应付日本帝国主义和德穆楚克栋鲁普，在暗地里却支持我们，积极参加了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伟大斗争的，所以，在东西协理和掌印五官吏中，只免去了管旗章京阿尤尔扎那（日本入侵前任职）和梅林章京通嘎拉格的职务；任命阿拉腾太岁为管旗章京，罗布僧达瓦为梅林章京以外，其他军政官员一律不作变动，仍任原职。希望大家互相协助，精诚团结，认真负责地履行各自的职责。

要废除伪政府把全旗划为两个苏木的建制，恢复原7个苏木的机构。任命阿尤希扎布为巴图苏木章京、图门吉尔嘎勒为苏海图苏木章京、龙德格扎木苏为黑亚苏木章京、巴图乌力吉为乌布

尔孛儿只格特苏木章京、诺尔布为阿鲁孛儿只格特苏木章京、吉格米特多尔济（哈勒晋夫）为扎鲁特苏木哈温。

3、为了减轻全旗广大阿勒巴图（承担赋役的人，即属民）的负担，在较短的时期内使他们的生活有明显的好转，今后5年内，如无特殊开支，则不征收任何赋税。并且要废除日本和德穆楚克栋鲁普统治时期的伪政府加重剥削旗民，增加税银，以牧畜头数为标准，随蹄征税的旧制度。制定以户为单位，并视其承受能力大小，酌情征税的新税制。

4、为了确保本旗辖区的治安和广大旗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必须扩充和加强全旗的武装力量。对投诚或缴械投降之部，要在短期内进行整训和改造，尽快提高他们的军事素质和思想素质，加强组织纪律性，在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驻守原地，听从命令，维护治安。

5、要加强团结，反对分裂。我旗现在有亲日与抗日，蒙古族与汉族，前山（指巴德格尔、木纳山等地蒙人）与后山（指现乌拉特中旗新忽热、巴音哈太一带蒙人）之言谈。大家要知道，这些话对我们的团结是非常不利的，从此以后，绝不允许说这样的话，更不允许拉帮结派，另立山头，要把仇恨对准敌人，要揭发并镇压那些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刽子手和敌特分子，要肃清其在地方上的余毒和影响，全旗各族人民要团结起来，努力发展生产，为了共同的幸福，要通力合作，并肩前进！

巴云英母子俩的讲话结束以后，开始了精采的摔跤、赛马和射击比赛。中午，巴云英与100多名官兵和旗府仕官、侍从共进喜宴。下午，她将那达慕大会的全部工作委托给唐德吉尔嘎勒和宝音吉尔嘎勒等人，自己只带领一部分官兵奔赴包头。据巴云英特务连连长恩克达赖回忆，在这一次盛会上，巴云英母子二人接受的馈赠礼品，共计有哈达400多块，靠背棧绒垫30多块、20两至30两重的元宝8锭，金戒指两枚，银元80多

块，蒙古袍绸缎料6件，骏马8匹。巴云英在临行前将这8匹骏马交给诺颜仓的马倌儿丹金，让他赶到马群里放牧。

巴云英从陶赖呼勒庙的盛会退出来以后，回到敖包乃恩格尔的旗府所在地住了一宿。次日启程前往包头。途中，专程去位于现乌拉特中旗部北乡呼图克图山的她丈夫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及其祖辈坟前，烧纸祭祀。尔后，将随行的大部分士兵留在石哈河，阿贵图庙（营盘湾）一带，自己只带领一个排的士兵，共50多人到达包头市园子巷19号院的乌拉特后旗办事处。巴云英原先住过的那间房子，在抗日战争期间，其小叔媳孟根花（汉名德桂声，也叫银花，是额尔克色庆占巴勒之胞弟奇穆特林沁多尔济的妻子）曾经住过，她听说巴云英要回来，就主动搬出去，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好让她一回来就住进去。巴云英回到驻包办事处，一踏进自己的住房，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并排挂在正面墙上的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和奇穆特林沁多尔济兄弟俩的半身像。巴云英顿时觉得好象是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对她自己只身一人，率领官兵，日夜奋战在硝烟弥漫的抗日前线，出生入死的情景感到非常痛心，又似乎听见他在说：“终于盼得你和爱子安然无恙地回来了”的时候，她的鼻子一发酸，眼泪夺眶而出，象断了线的珍珠，扑籁籁地掉了下来，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终于放声哭了起来。巴云英撕心裂肺的哭声，使前来晋见请安的原管旗章京阿尤尔扎那、扎兰章京恩克巴雅尔、伪合作社主任道尔吉桑布、伪蒙古军第一连连长大卡仁太、管家乌力吉巴图等人也忍不住一起流下了眼泪。因为孟根花从未见过内嫂巴云英，虽然自己此时已变成了一个寡妇，但也得举行叩拜嫂子的礼节。所以等巴云英稍微镇静过来以后，孟根花就按照蒙古族的习俗，施以跪拜礼，参见了嫂子。巴云英则给她赠送了一锭20两重的元宝和一只金戒指，作为见面礼。接着，两人互相握了手，又痛哭了一场。

当巴云英返回乌拉特后旗驻包办事处时，伪晓麻在这里的财

产已寥寥无几，只剩下了20多间空房子。要说有那么一点儿资产，还数道尔吉桑布经营的伪合作社呢。他把藏起来的两锭20两重的元宝和60两大烟、20多匹各种棉布、两箱砖茶、200斤白砂糖、20袋面粉、两包小包生烟、两条纸烟、12件滩羊皮筒子、50石小米以及毛巾、袜子、肥皂、洋蜡等物全部移交给巴云英。当时，根据工作需要，巴云英调我（笔者本人）到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驻包办事处任上士文书外，其余人员都打发回家。

政治投机分子阿尤尔扎那听说巴云英要回包头的消息以后，专门在包头等候了20多天。此时，他将自己的儿子、乌拉特东公旗伪蒙古军第二连连长乌力吉呼图克叫来，晋见了巴云英。并将其部下的60多名士兵及其花名册一同交给巴云英，听候安排。这是巴云英在日本投降以后接收的最后一批投诚者，从而，她的受降任务也告结束。

七、抗战胜利后的四年

民国34年（1945）8月中旬，傅作义集中军政主力，从河套向东挺进，于8月15日抵达包头。17日占领了归绥以后，为了接收绥远省境内各县的投降人员，他以绥远省主席和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向绥远省境内的各县派遣了部队。这实际上就形成了对绥东解放区的武装进攻。因此，遭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有力的反击。傅作义觉察到自己力量的不足之后，便退守归绥、包头两地。巴云英认为傅作义退守归绥、包头，很可能要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围攻。因此，她为了避开冲突，保存实力，避免龙虎相斗，螳螂遭殃，就于10月20率部退到河套，到达包头以西400华里远的现乌拉特前旗长胜乡梁团长圪旦，住在地主梁九州院内，在该村挂起了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的牌子，渡过了一个冬季。

围攻归绥、包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略撤退以后，傅作义把部队拉出去，跟随蒋介石，参加了全面进攻解放区的战斗。与集宁、张家口等地的人民解放军交手作战，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

巴云英于民国35年（1946）9月返回包头办事处以后，一直到民国38年（1949）秋，将旗政府的日常工作委托给协理唐德吉尔嘎勒，她自己和贡嘎色楞常住包头，总揽全旗军政大权。在这8年间，她跟随蒋介石、傅作义和董其武等人，在政治、军事、教育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将其中的几项主要工作简述如下：

（一）不失时机，扩充部队

在抗日战争以前，统治绥远省的军政要员，虽然允许绥远省境内的各蒙旗可以建立为数不多的维护地方治安的游击队。但是，各盟旗还没有建立什么这个师，那个司令部等武装部队。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内政腐败，外侮频仍，国难日益严重。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沦陷于日本铁蹄之下。接着，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攻占华北，并利用德穆楚克栋鲁普，侵占了绥远大部。这时，傅作义为了利用投靠他而去的王公和未沦陷的伊克昭盟部分地区以及河套等地蒙旗王公贵族、封建上层，才为地方上任命了一些师以上军官，以图协助其开展抗日斗争。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巴云英继续利用这一机会，不断壮大乌拉特后旗武装力量。

1、民国35年（1946）春，傅作义下达指示，要求地方武装力量的名称要有别于国军，指挥要统一，数额编制要有限。巴云英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将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更名为乌拉特后旗保安司令部。通过更换公章和符号，对全旗武装力量进行了一次整编。坚持既不受傅作义、董其武的限制和束缚，又合情合法的原则，在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下，组建了保安部队和警

察部队两种武装力量。在保安司令部内，设有参谋处、副官处、军法处、军需处等机构，并分别任命了各部队、各处的负责人。

通过整编后的乌拉特后旗保安司令部的主要官员和组织形式如下：

中将司令：贡嘎色楞（1946年春，国民党中央在任命蒙旗保安司令部时，对参加过抗日战争的部分蒙旗的保安司令，授予中将军衔，而对那些投诚过来的时间较短或者亲近并跟随日本和德穆楚克栋鲁普，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才缴械投降的部分蒙旗的保安司令，则授予少将军衔。）

上校参谋长：杜子英

中校参谋：陈振华（国民党乌拉特后旗党部书记长）

参谋处

中校主任：张树华

中校参谋：翟选

中校秘书：元仲卿（又名元悌）

副官处

中校副官长：吕兆祥

少校主任：张文星

少校副官：高玉升

上尉副官：贡布扎布、彭承基、曹德铭、伊希敖斯尔

中尉副官：侯凌山（又名侯来旺）

少尉副官：邦郎赖

军法处

中校主任：乌尔图那顺

军需处

中校主任：常有明

少尉军需：王大成

除此以外，还有卫士班、传令班、炊事班、车夫班等几个班，每个班配备10—12人。

保安部队官兵总共有610多人，其服装和符号与国民党的陆军部队完全一样。整编入保安部队的有：原李俊峰第一团的两个连；从包头伪警察部队投诚过来的杨占荣之第二团的150多人马；乌拉特后旗伪蒙古军第二连连长乌力吉呼图克率领投诚过来的一个连和原特务连的全体官兵。

保安部队军官名单如下：

第一大队

上校大队长：李俊峰

中校副大队长：张来锁

少校中队长：顾文斌、高孟喜、杜桂林

第二大队

上校大队长：乌力吉呼图克

中校副大队长：杨占荣、布日格多尔济

少校中队长：图门吉尔嘎勒、牛占山、陈占魁（蒙名华喇嘛）

特务中队

少校中队长：恩克达赖（汉名胡庆发）

所谓警察部队，就是由隶属于旗政府领导（实际上还是属于巴云英指挥）的一个团一级的警卫大队和一个连一级的巡查中队组成的。其编制与保安部队一样，也是以“三、三”制编成的，总共有310多名骑兵。编入警察部队的有：乌拉特后旗伪蒙古军若格瓦、贡德桑布率领投诚过来的第一连和原防守司令部第一团第一连（即孙卜尔连）。其军官名单如下：

警卫大队

大队长：若格瓦

副大队长：贡德桑布

中队长：色日古楞、图布兴吉吉尔嘎勒、沙木腾

巡查中队

中队长：孙卜尔

副中队长：白敖其尔

警察部队身着黑制服或蒙古袍，佩带乌拉特后旗政府符号，是官是兵都以胸前的标记或印在符号边上的红、黄、兰、黑、白等5种颜色来区别。

2、民国36年（1947）冬，将特务中队扩编为特务大队。分别任命张来锁为大队长，傅士珍为副大队长，邸国用、高孟喜、潘富财为少校中队长。从而，又增加两个中队（连级）的兵力。

民国38年（1949）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有力支持下，英勇作战，痛歼国民党的有生力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分崩离析，蒋家王朝摇摇欲坠，已成无可挽回的败局。巴云英乘此机会再一次扩编了乌拉特后旗的武装力量，增设了一个机枪大队，将巡查中队扩编为巡查大队。与此同时，将每个分队由两个班增加到三个班。

巴云英司令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组建两个大队呢？这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她的武器弹药突然增加的缘故。

民国37年（1948）冬，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绥远省东部和南部地区。托克托县的县长带领70多名自卫队队员，流窜到今固阳县的白彦沟一带，抢劫群众财产，奸污妇女，为非作歹。当时，驻防阿尔斯郎沟的乌拉特后旗巡查中队的葛海宽、张秉义两个分队长听到这一消息以后，立即带领20多名士兵，深夜去白彦沟的大六号村，包围了他们，又活捉了5名哨兵，待到黎明时，对他们说：“赶快回去告诉他们的县长，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要老老实实缴械投降，我们就一个也不杀；如果不投降，那就一个也别想活着出去，把你们全部消灭在这里。”说

完，将他们放回村里。葛海宽、张秉义命令士兵，分别占领周围的几个山头。虚张声势，逼使敌人缴械投降。就这样，他们没费吹灰之力，就缴获了70多支枪。是时，恰逢巴云英到兰州领取武器去了。巡查中队长孙卜尔乘巴云英不在之机，利用这批武器，招收了一部分人马，自封大队长，赵海清为副大队长（蒙名达赖），任命属下的三个分队长为中队长。

除此以外其他枪支弹药来源是：巴云英在民国37年（1948）春，去南京参加伪国民代表大会时，请求蒋介石和国防部长白崇禧等人，领回来的350支枪（其中有20挺机关枪、300支步枪，30支手枪和50000发“七、九”子弹以及1500发其它子弹）。所以说，巴云英新增加的枪支弹药，对增建两个大队，是绰绰有余的。

另外，巴云英的兵源也是很充裕的。因为巴云英的部队，大部分是“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战时出征打仗，平时回家耕牧”，是不离乡土的护旗军。因此，害怕国民党抓兵，而跑到巴云英的部队领取符号，就地当兵的穷苦农牧民子弟比比皆是。这就是巴云英扩充军备的得天独厚的兵马来源。根本用不着煞费苦心地出钱出人招兵买马。当时，即将垮台的国民党政府和绥远省军政头目，非但不提什么蒙旗武装力量不能超过两个团的编制的限制，而且还委任巴云英为绥远省“戡乱”委员。这也为巴云英扩大武装力量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因此，她根据参谋长常有明、中校秘书郭维忠、少校副官张振杰等人的建议，报请董其武批准，任命梁九州为乌拉特后旗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批准孙卜尔的巡查中队升格为巡查大队，正式任命孙尔卜为大队长，吉仁本为副大队长，葛海宽、张秉义、阎老牛为中队长。又新建一个机枪大队，任命张振杰为上校大队长，恩克达赖为中校副大队长、任命米六、冯福财、李得富等人为少校中队长。而且，对司令部的官兵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至民国38年（1949）

上半年，乌拉特后旗武装力量号称2100多人，从本旗新忽热的旗政府所在地到包头这一段，到处可见散兵游勇，似乎可以说，在这里除了乌拉特后旗的士兵以外，就没有别的青壮年了。

巴云英司令几次扩充乌拉特后旗武装力量，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起先，由于抗日救国的需要，除了极少数蒙汉奸以外，其他人都还是赞成或支持的。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国民党政政府和绥远省军政首领就担心蒙旗武装力量壮大，会影响和妨碍他们统治蒙旗和绥远地区。所以对蒙旗武装力量采取了压缩和控制的措施。到最后，他们统治中国的图谋已化为泡影，其反动统治也到了摇摇欲坠的时候，就不控制或无暇限制蒙旗武装力量了。巴云英身边的仕官们也不反对强化即将覆灭的封建武装力量了。

那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是如何受到限制和反对的呢？一方面，国民党中央政府和绥远省军政首领把蒙旗武装力量限制在两个团以内，不让随意超编，名称有区别于国军，而且要统一。另一方面，民国37年（1948）初，在本旗衙门仕官的春季启印会议上，某些仕官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要求，他们说巴云英肆意扩充军队，增加了军费开支，加重了群众负担，而且还不重用本旗蒙人，要求尽快加以改正。负责主持这一会议的协理唐德吉尔嘎勒（巴云英和贡嘎色楞母子俩从来不参加旗衙门的仕官会议）把仕官们的意见和要求收集整理成“要求缩减旗军，减轻人民负担”的请愿书，参加启印会议的协理唐德吉尔嘎勒、宝音吉尔嘎勒、梅林章京罗布僧达瓦、若格瓦、扎兰章京达木林扎布、衙门管家嘎拉僧格力格、警卫大队副大队长贡德桑布、诺颜仓述木勒宝日夫，师爷唐德斯钦等人在上面一一签名盖章后，唐德吉尔嘎勒亲自将此书带到大青山西端未参加本次会议的达尔罕安本阿尤尔扎那、扎兰章京恩克巴雅尔、呼硕达木勒丹贝日勒、保安部队第二大队队长乌力吉呼图克、副大队长布日格

多尔济、民丰乡副乡长吉仁太等人家里，让他们逐一签名盖章，最后才带到包头，交给巴云英。巴云英接到请愿书以后，立即让我反复念了几遍，她在一旁仔细听，认真琢磨。然后，让我招集住在包头附近或已来到包头的唐德吉尔嘎勒、阿尤尔扎那、恩克巴雅尔、丹贝日勒、乌力吉呼图克、布日格多尔济、吉仁大，衙门管家乌力吉巴图等人，在包头阿尤尔扎那家里召开为期3天的秘密会议。巴云英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会议上反复给大伙儿解释为什么要扩充旗军的理由。她针对每个人的思想动态和具体情况，经过苦口婆心的劝导和耐心细致的说服，终于消除了与会人员的疑虑。统一了他们的思想，开始理解和支持自己的扩军备战工作。在此基础上，她分别任命助理唐德吉尔嘎勒为保安司令部上校参谋，罗布僧达瓦为管旗章京，恩克巴雅尔为梅林章京，丹贝日勒为扎兰章京。从而，巧妙地平息了这次抗议，为今后的扩军备战扫清了障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巴云英为什么要特别重视抓武装力量？为什么那样热衷于扩充军队呢？她又如何养得起那么多的兵马呢？为了回答这几个问题，还是请看巴云英在那三天的秘密会议上是怎样解释的吧。巴云英对大伙儿这样说：“我巴云英扩充乌拉特后旗武装力量的目的，是为了我旗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同时也是为了我旗不受外界和他人的欺凌。除此之外，我别无它意。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的先辈和在坐的某些官员（针对阿尤尔扎那、恩克巴雅尔、丹贝日勒等人），顺从上司的指令和外来军政头领的意愿，不顾本旗领地的完整和广大牧民的疾苦，而只顾自己，贪图私利，从满清时期至民国20年（1931）间，大量地放垦了我旗的牧场，还把一部分土地（指昆都仑沟以东）连同该地区的一些牧户一起奉送给巴德格尔（五当召）和昆都仑西大寺庙，使我旗属民人为地分割成了片儿，形成与固阳、安北、包头、萨拉齐和乌拉特中公旗、乌拉特西公旗、土默特旗和茂明安旗等旗县属民杂居的局

面以后，不是经常遭到别人的冷落和欺压吗？前年（指1946）年春，我们为了修建旗政府，从乌拉山砍伐了少量木材，不是被乌拉特中公旗的齐鲁团长全部扣留下，连一根椽子都没有给吗？我们最后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不是折了陶赖呼勒庙，才将旗政府修建到半截子停下来吗？还有当年，李业青带领100多士兵，抓走了我们旗征收水草税的恩克巴雅尔、牛占山等十几个人，后来不是图门卡儿嘎勒和华喇嘛二人领上部队包围了他们以后，才把自己人夺回来的吗？现在，土默特旗还说我旗境内的大树湾渡口是他们旗的，包头县也不是在拒绝交纳从石拐到包头的运输煤炭的过路税吗？诸如此类的压迫剥削和掠夺，纠纷和抗议，今后会随着国民党欺压和迫害弱小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政策的贯彻实施，还要进一步激化，而不可能有所减缓。因此，我们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是不行的，是站不住脚的。再说，国民党政府如此腐败无能，早晚要导致国内的大乱。也有可能还会出现象民国20来年那样的军阀混战，土匪四起，抢劫掠夺，烧杀无辜，民不聊生，社会治安极端混乱的局面。因此，我们没有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没有一定程度的抗争能力，怎样消除匪患，维护地方治安，保持旗域完整呢？怎能与兄弟旗县平起平坐，不受欺辱呢？我们的人民群众又怎能安居乐业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巴云英是非常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和它的重要性的。这就是巴云英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也是为了乌拉特东公旗的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所采取的最根本的办法。

至于说因扩大部队编制而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也是不切实际的。殊不知，乌拉特东公旗部队的绝大多数是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护家军。而且，一切给养又都是自备的。请听巴云英在三天的秘密会议上对此是如何作的解释：“国民党政府每年给我们蒙旗的军政经费，除了二、三百件单衣和棉衣以外，再什么也

不供给。我们所需要的开支，都要靠征收回来的岁租、公粮、大烟税和水草税、过路税以及矿产资源收入来解决的。这些收入中，除了岁租和公粮以外，每年征收的现金超不过3000元现大洋，征收的各种粮食超不过1500石（合450000斤）这些收入用于旗政府和诺颜仓的开销，就所剩无几了。我旗士兵的百分之九十五是害怕被国民党抓去充军，而自愿跑到我旗部队当兵的农业乡或临县农民的子弟。他们吃自己的、穿自己的，用自己的，平时在家务农，也不参加军事训练。在轮班服役时，也不是自带口粮和马料的吗？这些你们也都清楚。如果单靠旗里养活这么多军人，就连4个月也支撑不了。这几年，我们仅仅从每个牧户中征收过3张羊皮，解决了司令部仆人的冬衣。除此之外，再没有征收过任何钱和物，这些事情你们也是知道的。怎么能说是加重了群众的负担呢？既然前几年能这样过得去，我想今后也能过得去。你们不必担心我向人民群众征收这样那样的钱物，会增加群众负担。”巴云英还说“有人说我重用了汉人，这倒是真的，也是事实。你们大家都知道，当初我拉上部队去抗日时，地方上的蒙古人中，特别是我们旗里的官吏中，有谁跟我一起抗日去了？非但没有这样。反而有些人还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不是开枪追赶过护理你们的札萨克诺颜的我吗？但是，我不咎既往，更没有追究过任何人的责任。考虑到我旗人口少，人才更少的实际情况，对那些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不但没有惩办，而且不是在继续留用吗？再说，我现在任用的汉族朋友的大多数是与我一起坚持抗战8年，在战火纷飞的抗日前线同甘共苦的人。我不能因为现在胜利了，就抛弃或者赶走他们。那不是非常可耻和太没有良心了吗？另一方面，这些汉族朋友里面的某些人，还是蒋介石和博作义直接派进来的，我怎能弃之不用呢？”

（二）参加国民代表大会

民国35年（1946），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肆无忌惮地撕毁了协议，破坏和平谈判，疯狂进攻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碰壁，节节败退，真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蒋介石为了挽回其失败的局面，妄图制定宪法，以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来愚弄欺骗全国人民。民国36年（1947）秋，国民党中央发出通令，拟于民国37年（1948）3月，在南京召开制定宪法和选举总统、副总统的国民代表大会。并逐级下达了各地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名额和具体选举办法。国民党绥远省蒙旗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为这次选举专门组建了蒙旗选举事务所，指定国民党乌拉特后旗党务特派员巴云英为成员之一，在事务所所长乌云毕力格（汉名赵成璧）领导下，开展工作。乌兰察布盟分到了参加“行宪国大”的代表名额3名、立法委员名额1名，共4个名额。国民党绥蒙党部选举事务所经过商讨，推荐以下3名抗日有功人员为国大代表候选人。这三人是：巴云英（国民党绥蒙党部特派员，乌拉特东公旗护理札萨克、保安司令部代理中将司令）、补德巴扎尔（汉名贺守业，国民党乌拉特西公旗党部书记长、国民党特派员）齐·额仁钦达赖（茂明安旗少将司令、札萨克福晋），并推荐贺守忠（国民党绥蒙党部特派员）为立法委员候选人。但是，在召集乌兰察布盟各旗军政头目，对以上问题进行磋商时，却出现了分歧。那些追随日本帝国主义和德穆楚克栋鲁普的王公和军政头目，一方面竟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我们无力抵抗日本和德穆楚克栋鲁普，才跟随他们走了几年，这是真的。但是，也不能因此而说我们没有爱国主义思想吧。尤其是在民国34年（1945）冬，蒋介石不是还亲自说过：“绝不追究伪蒙疆政府中蒙古族官员的过去，要尽量安排，量才使用吗？”

你们大概都不可能忘记吧。现在不把我们列入国民代表候选人名单里，是很不符合中央要求的。”就这样，抗日的和沦陷区的军政头目之间出现了争夺国大代表席位的争论和对立局面。另一方面，他们还千方百计托人说情，行贿赂，送银两。竞相争当国民代表候选人。为了防止事态扩大，选举事务所马上调整了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候选人。推荐巴云英、补德巴扎尔、南齐德（喀尔喀右翼旗预备协理，旗保安司令部副官长）三人为国大代表候选人；巴图毕力格（乌拉特中公旗协理，旗保安司令部上校参谋长）为立法委员候选人。这样，才平息了争论，基本上统一了乌兰察布盟各蒙旗的意见。报请国民党中央批准以后，于是年10月中旬通知各旗，进行正式选举。但是，这次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选举，丝毫没有一点儿民主的气氛。据我所知，选举巴云英为国大代表，不用说在乌拉特东公旗，就是在全乌兰察布盟范围内选举也能当选。可是，她自恃抗日有功，以国民党绥远省蒙旗党务特派员自居，未经任何形式的选举，就“名正言顺”地当上了正式国大代表。然而，听说有些旗的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生怕自己没有足够的选票到南京，就不让参加会议，于是，他们除了向绥蒙党部主要官员贿赂金条、银币、大烟以外，还耗费半个多月的时间，召集旗府所有笔帖式，捏造参选人名，伪制选票。最后在选票上按指纹时，从旗府官员一直到给衙门放牧牛羊的妇女儿童，轮流按了10个手指印。尔后还怕不够用，就荒唐到极点。改按脚趾印。他们装了几麻袋这样伪造的选票，一直扛到南京。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耳闻目睹的选举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时所发生的离奇古怪的现象，真是无奇不有，荒唐至极，令人涕笑皆非。我想，这大概就是国民党所标榜的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吧！

巴云英在出席国民代表大会之前，为了收集和整理向大会递交的建议案，还专门在驻包办事处召开了一次旗府官员和保安司令部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具体的安排和部署。会议一开始，她

就强调说：“你们在整理建议案时，一定要把目前能得到解决的问题写进去；对友邻旗县有影响的或原来就没有条文规定的问题，不要写进去，特别是国民党政府不愿意听或多年不予解决的问题，更不能勉强写进去。”在会议期间，她根据大家的意见，又进一步指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真进行收集整理：

1、请求国民党中央，蒋满清时期至民国20年间蒙旗报垦的牧场，如果至今仍未开垦，或已开垦而未出卖，又严重影响蒙旗收入的土地，应归还原报垦蒙旗，让其自行管理使用。

2、要求国民党中央和绥远省政府，对旗县应一视同仁。对蒙旗政府直至乡苏木，可否参照县的经费标准，由中央或省府按时足量拨给房屋基建费、行政经费和公职人员薪水等，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3、为确保边境蒙旗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保障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消除匪患，防止外来入侵，应加强蒙旗保安部队建设。为此，要求国家为边境蒙旗保安部队按时提供足够的常规武器弹药和服装、粮饷等军需。

4、鉴于边远蒙旗文化教育普遍落后的状况，要求国家重视发展蒙古盟旗教育，为每一个盟建立一所中学。每个旗建立一所完小，并提供学校设施费用和教师薪水，要求政府拨款，用公费培养蒙古民族的子女，在蒙古盟旗普及小学教育。

5、根据绥远省各蒙旗的特殊地理条件，坚决要求恢复原先执行的制度，对于各蒙旗按规定征收岁租、水草税和过路税公务，邻近各县不得随意干涉和阻拦。

巴云英责令旗政府官员对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归纳整理，准备带到南京，向国民代表大会和有关部门呈递。

巴云英虽然对出席国民代表大会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在临行前的一个星期里，却由于交通阻塞，生怕不能按时到达南京，

而焦急万分，坐卧不安。因为当时从归绥到北平的铁路线已被解放军封锁，火车无法通行。巴云英虽然给蒙藏委员会、国民代表大会秘书处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连续拍了几次电报，要求派飞机接他们到南京参加大会。可是，不用说飞机了，连个回电也没有见到。因此，巴云英焦急地诅咒道：“国民党这帮腐败分子，就这样全部垮台了才好。”正当这个时候，乌拉特后旗政府教育股长郭维忠提醒巴云英：“您不妨给宋美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去个电报，肯定会有结果的。”巴云英如梦初醒，立即按照郭维忠的话，分别给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拍了电报。下午7时许，果然收到了李宗仁打来的电报：“兹决定3月22日派飞机到绥远省归绥接你们，望提前作好准备。”巴云英接到电报，如释重负，非常兴奋，心中的一块儿大石头总算落了地，觉得轻松多了。因此，3月20日，她在包头愉快地参加了旗政府官吏和司令部官员为她举行的饯行宴会。

民国37年（1948）3月21日早6时，巴云英司令带领阿哥诺颜贡嘎色楞、长子乌尔图那顺、达尔罕安本阿尤尔扎那、上尉副官侯凌云、邸国用等5人，从包头起程，乘火车到达归绥。翌日，乘坐李宗仁派来的飞机，到达北平住了3天以后，乘火车到天津。尔后，从天津小房口港乘坐轮船抵达上海。于本月30日乘火车到达南京，准时参加了4月1日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从这一次能乘坐李宗仁派来的飞机，准时无误地出席国民代表大会一事，巴云英认为郭维忠是一个有能力有智谋的人。因此，巴云英从南京返回来以后，就提升郭维忠为中校秘书（此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日本投降后，在归绥开过书店，后又到乌拉特东公旗政府供职。解放以后，在乌兰察布盟自治区人民政府任秘书）。

关于巴云英费了很大功夫，认真收集整理材料，向国民代表大会呈递的建议案，最后结果如何的问题，阿哥诺颜贡嘎色楞、

达尔罕安本阿尤尔扎那从南京回来以后对我们说，他们把建议书带到南京，分别呈送给了国民代表大会和国民党中央有关部门。但是，并没有引起国民党的重视，在会议期间也没有给任何答复，好象是没有那么一回事儿似的。所庆幸的是，国民党中央妇女联合会按照宋美龄的旨意，召开参加本次大会的少数民族妇女代表座谈会，巴云英也应邀出席了这个座谈会。宋美龄亲临会场，接见了每一位代表以后，特意招呼巴云英坐在自己身边。老友重逢，有说有笑，格外亲昵。在座谈会上，宋美龄宣布了巴云英为中央妇女联合会委员的委任状，并且很关心地询问她，有何困难和要求？巴云英感到有了希望，机不可失，时不在来，她抓紧时机，将随身携带的建议案面呈宋美龄女士，并且在一旁补充道：“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武器问题，万望您给我帮助解决。”座谈会结束以后，宋美龄女士对巴云英说：“看起来，大会结束以后，你需要在南京等待几天了，我和国防部长白崇禧商量一下，适当地给你解决。”

国民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新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蒋介石也接见了参加本次大会的50多名蒙古族代表。当他看见老朋友、抗日女英雄巴云英时，就特意跟她握了手，互致问候以后，一边往沙发上坐，一边对巴云英说：“你对美龄谈的那件事，我们会给你解决的。”尔后，蒋介石与白崇禧等人叙谈片刻，就走到庭院中的树旁，共同合影留了念。这是巴云英与蒋介石的第二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的见面。

散会以后，巴云英在南京奔波了20多天，为了尽快得到武器和弹药，将自己带去的大烟和金条、银元，连同参加这一次大会得到的礼物和贿赂一起送给国防部和蒙藏委员会要员，请求他们鼎力相助，早日解决武器弹药等问题。有一天，白崇禧打来电话说：“按照蒋夫人指示，决定拨给您300支步枪、20挺重机枪，50000发子弹，还有30支手枪和1500粒子弹。”

“请速派人、办理手续，领取武器。”白云英接到电话，真是喜出望外，立即派副官邸国用、侯凌云二人到国防部办理领取手续。他们从南京直接领取了30支日本产十四式手枪和1500粒手枪子弹。其他武器和弹药，因为路途遥远，不便拉运等原因，经双方研究决定，改由绥远、甘肃两省军火库提货，并办好了转库提货的一切手续。由于时间关系，等不及解决其他建议案，就先派阿尤尔扎那、邸国用二人，携带手枪，乘火车提前回旗。白云英又等了几天以后，与南齐德等人一起，乘坐国防部长白崇禧派给的军用飞机，于6月中旬，直接飞抵包头。白云英回到包头办事处以后，当即派人到绥远省包头市军火库提取武器。可是，该仓库内等待他们的，除了日本“三·八”式步枪改装成的“七·九”式旧枪以外，再没有任何武器。因此，白云英当机立断，只好从这里领了100支改装的旧步枪。其余部分，决定从兰州领取。但是，由于交通工具一时难以解决，无法前往兰州，又等待了几个月。是年10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包头时，白云英跟随邓宝珊将军，带领司令部30多人，逃到了陕坝。随后，她又下了决心，将司令部的人员留在陕坝，安排妥当以外，只带领少校副官张振杰、上尉副官侯凌云、少尉副官李隆宽、护兵杜恒、范福财等人，于11月初，抵达兰州。

在兰州，白云英晋见了张治中，向他说明了长途跋涉前来拜见的意图之后，从兰州军需处领取了中正式马枪（即适合骑兵部队使用的步枪）200支，子弹50000粒；将20挺重机枪换成20挺加拿大式轻机枪。又从兰州部队的某个师以100匹战马做交易换取了一辆美国产小道吉牌汽车，用于拉运武器。事情办妥之后，于民国38年（1949）元月份，返回包头办事处。为了不失信用，交付换汽车的那100匹战马，白云英回到包头以后，立即责成她的部下按不同数额，分别摊派给各个苏木、乡和各个大队，让他们抓紧时间，进行征收。但是，截止7

月底，才仅仅收回53匹，而且，有些马的体质也较差。此刻，时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甘肃和宁夏两省的部分地区已相继解放，原汽车主人也停止了追要战马。所以，巴云英也停止了征马工作。“九·一九”绥远省和平解放时，兰州市也已解放。因此，巴云英将征收回来的那53匹马交给机枪大队，当坐骑使用。1950年秋，她把道吉牌汽车上交给了乌兰察布盟自治区人民政府。

巴云英赴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领回来300多支枪的消息，不胫而走。乌兰察布盟其他几个蒙旗的王公和军政头领听到以后，认为巴云英是代表乌兰察布盟6旗，参加国民代表大会而领回来的。所以，每个旗都有一份儿。因此，他们不是亲自出动，就是委派专人，到乌拉特东公旗驻包办事处，设法索取武器。

民国37年（1948）7月，喀尔喀右翼旗（达尔罕旗）预备协理、国大代表南齐德亲自跑到包头，伸手跟巴云英要武器。巴云英直接对他说：“我们都是一起到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我们既然没有在南京联名提过申请武器弹药的议案，今天你凭什么来跟我分武器呢？这些武器是我以我个人的情面要回来的。现在你们想伸手分武器，是没有道理的，我也是不会给你们要的。”南齐德不仅没有得到武器，反而被数落了一顿，空着双手回去了。杀害奇俊峰母子二人，自封为乌拉特西公旗保安司令的陶格套胡巴图（汉名郝游龙）也接踵而来，面见了巴云英。但他没有直接提及武器一事，而是转弯抹角地试探巴云英的口气。当他听到南齐德碰了一鼻子灰，空手回去的消息之后，他就变换了手腕，甜言密语地央求道：“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日本进口的手枪，请求巴司令可否赠送给我几支您从南京领回来的手枪，作个纪念呢？”巴云英见他这样苦苦央求，便也无可奈何，只好送给他一支日本产的手枪和20发子弹。此后，与巴云英一同去南京参加

国民代表大会的补德巴扎尔听说陶格套胡巴图要了一支手枪的消息，也匆匆赶到包头，请求巴云英可否给赏个面子，赠送几支日本手枪。巴云英考虑到不好谢绝，就赠送了两支马枪和一支日本进口手枪。过不多久，乌拉特中公旗保安部队齐鲁团长带领两名勤务兵（一人是党效武，如今在乌拉特中旗林业局工作，另一人已忘记）到达包头。面见巴云英，呈递了乌拉特中公旗札萨克诺颜林沁僧格、协理巴图毕力格写给巴云英的信以后，就直接说道：“我旗札萨克诺颜和协理派我来包头，是为了领取您代表乌兰察布盟参加国民代表大会领回来的应该分给我旗的那一部分武器。在拉运这些枪支弹药时，花了多少钱，我们也会如数支付的。”巴云英回答道：“我从南京领回来一部分武器弹药是真的，这是我以个人的情面，以乌拉特后旗保安司令的名义，托人说情，赠送礼物，才要回来的，这些武器是属于我们旗的。因此，无论是哪个旗，也不给分。”齐鲁团长一听此话，便板起面孔说：“你以乌兰察布盟和乌拉特三公旗代表身份参加大会，领回来这些武器，现在想一人独吞，实在令人太遗憾了。”巴云英听说她是代表乌拉特三公旗去参加会议的，就火冒三丈，将手中的烟咀嚼于桌上，愤愤地说道：“你说我是代表乌拉特三公旗的，那好，我现在问你一句，我当国大代表到南京时，你们乌拉特中公旗给投了多少张票？又出了多少经费？你们旗的巴图毕力格协理到达南京以后，关于申请军火问题跟我商量过一句吗？我再问你一句，我如果真的能代表乌拉特三公旗的话，当初你齐鲁团长为什么要扣留我们从乌拉山砍伐的准备用于修建旗政府的全部木材，连一根椽子都没有给留下呢？既然如此，你们就扛上那些椽檩对付敌人去吧。回去告诉你们的林沁僧格和巴图毕力格，我领回来的武器连一粒子弹也不给你们分。”巴云英振振有辞地说完，就撇下齐鲁出去了。

(三)、在农区设置乡

在满清统治集团的威逼利诱下和国民党政府以及大地主和军阀的强制挟持下，乌拉特东公旗先后被迫报垦了大量肥沃的草场。在报垦这些土地时，将那些山沟、坡梁地和敖包、寺庙附近的土地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但是到了后来，由于在移民实边政策的影响下，内地移民纷至沓来，逐年增多。他们的到来，不仅相应地促进了土地利用率的提高，而且还逐年开垦耕地边缘未报垦的牧场。然而，旗府仕官和封建上层又是只顾自身利益，招垦或租佃那些未报垦的一块块牧场。因此，在这些地区，就聚居了许多农民。他们的一部分属旗里，一部分属县里管辖。日本投降以后，为了便于管理，就把他们全部收归旗里管辖，在农区单独成立了两个乡级政府机构。在位于现乌拉特中旗石哈河乡与鹁鹁图乡一带，设立了一个新蒙乡，任命武金箱为乡长，李财罗为副乡长，乡下设立了四个保；在大青山西端，位于今固阳县绍卜亥、查干达坝、阿尔斯郎沟、召沟（苏敏高勒）一带成立了一个民丰乡，任命陈满仓为乡长，格日勒为副乡长，下设四个保。并仿照内地的县，在这两个乡里实行了保、甲制和交公粮制，划清了管理权限和隶属关系。从而，对稳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增加旗财政收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当时，全旗汉族农民大概有8000多户，40000多人，总耕地面积已达80000多亩。

(四)、重视教育

巴云英从一个普通的牧民妇女一跃而为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诺颜的阔太太，进而掌管了全旗的军政大权。在广泛交往各级官员和社会名流、地方绅士，负责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事务的过程中，处处受到困窘，她深深感受和饱尝到了没有文化知识的苦处。也正是由于这种亲身的体验，她才深刻认识到了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并非常重视发展文化教育。在民族危机，困难深重的抗

日战争年代，她还为了解决随军部下子女的就学难问题，在五原县城内建立了乌拉特后旗小学，自己兼任校长，时刻关心孩子们的学习，照顾他们的生活。尔后，随着防守司令部的搬迁，将学校也迁往米仓县张留柱圪旦，使随军部下的近50名学生读完了小学课程。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巴云英率部返回旗里。于民国34年（1945）冬，在现乌拉特中旗石哈河乡，借用地主王增官的房屋和院落，招收200多名学生，建立了旗立小学，命名为中正小学。解决了乌拉特东公旗蒙汉人民子弟学习文化没有场所、接受教育没有条件的困难。

特别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绥境蒙旗广大群众子女入学难问题，巴云英于民国35年（1946），亲自赴绥境蒙政会和绥远省政府蒙旗福利委员会，呈送了要求在绥境各蒙旗建立公办小学的一份报告。由于得到了在绥远省蒙旗福利委员会工作的巴靖远的鼎力协助，民国36年（1947），绥远省政府决定在绥远省境内的各蒙旗建立一所公办小学，取名叫边疆实验小学。紧接着，省里为乌拉特后旗派来几名教师，将原乌拉特后旗小学更名为乌拉特后旗边疆实验小学。尔后，在民丰乡的各个保也建立了一所民办小学，共招收120多名蒙汉族儿童，入学就读。

（五）、抓财政收入

乌拉特东公旗的财政收入，虽然要靠从本旗蒙汉属民中征收回来的衙门费用和公粮等赋税，但主要还是依靠从邻近县市征收的岁租、牲畜水草税和过路税。所以，巴云英于民国34年（1945）从河套返回旗里，完成了接收任务之后，就开始抓这项工作。一直到民国38年（1949），她不仅恢复了各个关隘地带征收过路税的几个税卡子的工作，而且还组建了征收岁租，水草税的3个组，分别由呼硕达木勒丹贝勒，贡布扎布、诺颜仓达木勒宝日夫、萨如拉、梅林章京恩克巴雅尔等人负责，分

赴各县，征收自民国26年（1937）以后未收取的赋税。这样，虽然增加了旗府的财政收入，但与此同时也加重了邻县农民的负担，引起了邻近县市及其广大农民的不满甚至反对。巴云英在为其长子乌尔图那顺、阿哥诺颜贡嘎色楞娶妻时，也花去了这些收入中的不少银两，引起了旗下仕官的很多议论和不满。但是解放以后，巴云英能正确认识自己的问题，主动将藏在阿贵图庙格斯贵喇嘛（即掌堂师，是喇嘛教寺院的执法喇嘛，俗称铁棒喇嘛）伊希敖斯尔处的15包（每包重100两）大烟全部交给了乌拉特后旗人民政府。随后，旗人民政府为了销毁这些鸦片，曾经指派我们几个年轻人用炭火焚烧了半天，才把它烧成灰烬。

（六）、保护李海龙出走

土默特与乌拉特交界处的苏济沟西山，有个德胜沟。在这道沟里，有两个村子，叫朝核尔窑子和敖其尔窑子。在这两个村子里，分别居住着名叫李业青和李海龙的两大户恶霸地主。他们勾结居住在20多里以外的绍卜亥沟的乌拉特后旗恶霸安本阿尤尔扎那（汉名赵太保），压榨和剥削附近的蒙汉人民，成为远近有名的滚瓜流油的大富豪。及至民国26年（1937），李业青一家已发展成为拥有近百十来口人、五代没分过家的大户，在硕大的砖院墙门顶，挂着一块儿木制横匾，上写“五世同堂”四个大字。民国36年（1947），李业青已升任固阳县自卫队大队长职务，率领100多人马，驻扎朝核尔窑子。而李海龙的祖先从内地迁来苏济沟西岸的巴总窑子，定居以后，种植鸦片，兼营狩猎，发了大财。为了避开土匪骚扰，便去德胜沟的敖其尔窑子另辟住所，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80多口人、多代同堂的大户人家。李海龙从小喜欢打猎，是大青山一带捕杀青羊、鹿和狍子等野兽的颇有名气的神枪手。由于他勇敢、灵敏，又有一手好枪法，而且还缴获土匪枪支，组建了自己的队伍，后被任命为萨拉齐、包头、五原三县联合建立的自卫团武装组织（简称三帮团）

的团长。“七·七”事变以后，根据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指示，在固阳县组建“民众抗日自卫军骑兵游击第四师”时，改编李海龙部为该师三十三团，任命李海龙为团长。尔后，日本帝国主义进犯包头、固阳一带时，固阳县骑兵游击师向河套撤退。其时，认为该团武器装备、鞍马都不齐全，不便转移，遂命令李海龙团留在大青山一带，根据形势变化，见机行事。李海龙带领部队在大青山躲藏几个月。最后，粮尽弹缺，给养拮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了日本的改编，被任命为保安团伪伊克昭盟直属第三警察大队队长，驻守原地。李海龙串通乌拉特后旗伪政府管旗章京阿尤尔扎那和他的儿子乌力吉呼图克，对抗鄂友三之部，制止并消灭其抢劫民财，为非作歹的小股人马。尤其是李海龙两次亲自率部活捉并处决了鄂友三100多名士兵和一名旅长、一名连长，更激起了鄂友三的仇视。由于李海龙、阿尤尔扎那串通一起，压制欺凌李业青，他们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民国34年（1945）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投降以后，傅作义为了防止李海龙伪警察部队投靠共产党和解放军，遂将其收编为“绥远省大青山地区抗敌第三团”，任命李海龙为团长。

但是，李海龙立即意识到，他与鄂友三已结下不解之冤，任命他当团长，只不过是暂时把他拢络住，尔后再做算计的一个伎俩，如果找不到一个可靠而强大的靠山，迟早要被他们鲸吞。是年11月，李海龙乘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包头之机，委托亲信刘平，请他通过熟人与中国共产党绥西专员李维中取得联系，倾吐了李海龙的意念。李维中当时向攻打包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贺龙将军和张宗逊、李井泉等首长汇报以后，批准了李海龙的请求，欢迎他参加革命。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颁发了委任状，任命李海龙为大青山地区招讨司令。但是，李海龙并没有马上倒戈、公开反对国民党。而是以国民党抗敌第二团团长的名，带领100多名士兵，驻守原地，窥探形势。

民国36年(1947)初,绥远省主席董其武从李海龙团挑选近100名年轻体壮的士兵,编入驻察素齐骑兵第四师暂编一团,提调李海龙之子李秀元为副团长,将李海龙与近40名老弱病残兵丁弃于敖其尔窑子。但是,李海龙并不死心,是年5月,他与探亲回来的儿子李秀元以及阿尤尔扎那、图门吉尔嘎勒等人到达包头,拜见巴云英司令,请求率领所部40多人,投靠乌拉特东公旗保安司令部。巴云英当时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任命李秀元为乌拉特后旗保安第二大队第四中队少校中队长,并且发放了符号,令其驻守原地。

李业青知道此事后,把仇恨转向了乌拉特后旗,妄图伺机报复。是年8月,李业青为了发泄私愤,乘乌拉特东公旗梅林章京恩克巴雅尔、少校中队长牛占山二人带领10名士兵去朝核尔窑子一带征收水草税之机,绑架了班长以上的5人,撵走了其他士兵。次日夜,李业青要亲自带领100多名士兵押送恩克巴雅尔、牛占山等人到固阳县。巴云英知道此事后,立即命令阿尤尔扎那和图门吉尔嘎勒,用武力夺回被扣人员。图门吉尔嘎勒、华喇嘛、巴图乌力吉三人带领100多骑兵,抢先到达李业青必经之路——绍卜亥达坝后沟,占领有利地形,等待他们到来。黎明时分,李业青领着队伍,将恩克巴雅尔、牛占山带在身边,来到绍卜亥达坝后沟。说时迟,那时快,图门吉尔嘎勒、华喇嘛、巴图乌力吉三人率领部下,将他们截成三股包围起来,高声喊道:“我们是乌拉特后旗部队,快将我旗税收人员连武器一块儿交出来,否则,就将你们全部消灭在这道沟里。”李业青顿时失魂落魄,手足无措,万万没有想到会中了乌拉特后旗保安部队的埋伏,只好乖乖地交出了恩克巴雅尔和牛占山等人。但是,图门吉尔嘎勒他们夺回人马以后,并没有马上解除包围,而是乘势与李业青进行了关于征收水草税的谈判,迫使李业青写下了如下的保证书:

由李业青负责，在3日之内，派专人送缴当年水草税300只小畜、500块现大洋。从此以后，不再干扰和阻拦乌拉特东公旗的税收工作。

由于上述诸多原因，李业青怀恨在心，串通固阳的鲁县长和萨县头目，于民国36年（1947）冬，将李海龙告到绥远省政府，说他私通共产党、解放军、抗拒征收公粮、包庇壮丁。翌年2月中旬，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命令乌拉特后旗、固阳县和萨县，联合出兵，除掉李海龙。并派专人到包头，召开了有关方面要员参加的秘密会议。在会议上，通过了如下的作战方案：

1、萨县出动200名自卫队队员，负责消灭住在巴总窑子的李海龙。

2、固阳县出动200名警察，与乌拉特后旗派出的100名士兵相配合，除掉居住在敖其尔窑子的李秀元。

3、攻打敖其尔窑子时，固阳县警察部队从东、南两侧围攻；乌拉特后旗的部队从西、北两面夹攻。

4、2月22日黎明，同时进攻巴总窑子和敖其尔窑子。

会议结束后，巴云英立即派人招来阿尤尔扎那和图门吉尔嘎勒二人，秘密告诉会议情况，并与他俩分析研究了如何解救李海龙父子俩的办法。最后商定：

1、派人给李海龙送去5箱子弹和50颗手榴弹，告诉他们提高警惕，做好迎战准备。

2、图门吉尔嘎勒和华喇嘛二人带领100名骑兵，“参加”此次联合围剿。

在拟定具体作战方案时，他们分析到，李业青在这一战斗中为了报仇雪恨，同时也为了抢夺头功，急于求成，肯定要在预定时间之前，提前下手。一旦这样，就让他们先打着，待到李业青接近取胜时，图门吉尔嘎勒和华喇嘛便指挥部队，集中火力向其射击，营救李秀元。同时又分析到，他们一旦提前开火，则可以

顺水推舟，把有意放走李秀元的责任推给李业青，叫他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2月22日，巴总窑子的李海龙由于事先有准备，所以击退了沿苏济沟攻上来的萨县自卫队以后，携带妻儿老小，安全撤离巴总窑子，上了苏济沟后口子东山。

乌拉特东公旗图门吉尔嘎勒、华喇嘛二人率领部队，提前到达敖其尔窑子西山，准备参加“剿灭李秀元”之战。夜间12时刚过，李业青率领的200多名警察，就开始进攻敖其尔窑子。他虽然从两侧包围了李海龙那座有地道的大院，但由于李海龙构筑的工事坚固，北山头炮台的火力又猛，所以他苦于不能轻取，一直战斗到太阳升起。此时，李秀元方面的枪声渐渐稀疏下来，图门吉尔嘎勒和华喇嘛意识到他的子弹已不多了，才指挥部队猛烈射击包围大院和北山炮台的李业青之部，很快击退了他们。李秀元知道是乌拉特东公旗的部队为他解了围，遂带领30多名士兵，从后山北麓的地道口出来，见过图门吉尔嘎勒等人，欣喜万分，连声感谢救命之恩。随后，他把不能行走的人员都交给图门吉尔嘎勒，又从他那里补充了一些子弹和手榴弹，骑上图门吉尔嘎勒给准备好的20多匹马，直奔苏济后口子，寻找其父亲李海龙。父子俩见面后，在苏济沟东山稍事休整几天，并与阿尤尔扎那、图门吉尔嘎勒进一步商量以后，补充了弹药和给养，率部东进，去寻找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

董其武获悉李海龙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东去寻找解放军的消息以后，马上派其部下刘龙镇团长，携带董其武保证李海龙父子性命安全的手谕，把李海龙一行从途中接到归绥市，居住了一年。

民国38年（1949）5月，由于忍受不了鄂友三的欺侮与迫害，李海龙父子俩率领所部150多名骑兵，到达现乌兰察布盟旗下营子，找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师，走上了革命的

道路，正式编为“大青山地区招讨师”。绥远省和平解放以后，对其所部进行了整编，改番号为保安大队，李海龙任大队长。1950年元月，保安大队调归包头市军分区管辖，李海龙继任大队长。

1950年夏，李海龙与其子李秀元一起，携带厚礼，看望巴云英。对她当年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恩不尽，终身不忘。他们高兴地坐在一起，抚今追昔，进行了倾心畅谈。

八、弃暗投明

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步步紧逼，节节胜利，在解放了东北和华北大部以后，于民国38年（1949）1月，和平解放了北平，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在迅猛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蒋介石用美式武器装备到牙齿的八百万大军之半数以后，国民党政府被迫从南京迁往广州。当时，内蒙古东部各盟旗都已解放，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兴安盟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已成立两年多。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支持下的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一部分蒙古族封建上层和军政头目，集结于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旗，复又打出蒙古“自治”旗号，在定远营（今巴音浩特）召开了所谓的“蒙古大会”，宣布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为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效忠犬马之劳，妄图巩固其即将崩溃的统治地位。在当时内蒙古西部盟旗多数王公贵族参加这一“自治”运动的情况下，掌握乌拉特东公旗军政大权的巴云英，对此究竟抱有什么态度，采取了什么行动和措施？现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追述。

（一）联络共产党、反对德王的引诱和拉拢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巴云英虽然曾多次受到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以及傅作义的嘉奖和勉励，先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蒙党部特派员、戡乱委员、绥境蒙政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妇女联合会委

员、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要职，担任乌拉特后旗护理札萨克和代理中将保安司令，统治该旗30多年。但是，她对国民党反动派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欺凌蒙旗和边疆弱小民族，镇压蒙古族人民的反抗等等，早有反抗和憎恶。由于自己力量所限，只得委屈求存，不敢违抗。

那么，她究竟因为什么原因，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由崇拜、寄予厚望以及积极跟随、而变为不满及至厌恶憎恨的呢？

巴云英曾对我们说过：“国民党在民国31年（1942），指使陈长捷等人镇压了伊克昭盟抗垦蒙民，挑起了震惊全国的伊克昭盟“三·二六”事件，逼走沙王（即伊盟的沙克都尔扎布王爺），对当地广大无辜的牧民也大肆抢掠烧杀，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和蹂躏。事后，他们一方面害怕沙克都尔扎布投靠共产党；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和舆论谴责，遂将“三·二六”事件的罪责全部推给陈长捷一人，撤销其伊盟警备总司令职务，以平息事端、掩人耳目，但时隔不久，复又提拔重用了他，对沙克都尔扎布的财产损失，只赔偿了少量纸币，就不了了之，他们就是这样欺骗愚弄蒙古人的。

民国36年（1947）。乌拉特后旗向固阳、包头等县征收水草税和过路税时，都遭到了他们的反抗和刁难。可是，绥远省政府非但不按规定予以公正处理，而且庇护县政府，终止了蒙旗征收水草税和过路税。更不给蒙旗划拨一丁点儿军政经费，致使蒙旗财政处于极度紧张和困难的状态”。

尤其是巴云英在民国37年（1948）上半年去南京参加行宪国民代表大会回来以后，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其军政首领的腐化堕落，骄奢淫逸、贪脏枉法行为，非常厌恶。她返回包头首先说的就是：“这一次通过的宪法里，丝毫没有提及少数民族自治的问题。这一次的“行宪大会”，也没有一点儿民主的气氛。我们一提起民族自治的问题，就要遭到早已组织好的“绥

远、察哈尔、热河三省国民代表联谊会”的猛烈攻击。他们200多人的代表对付我们这50多名蒙古族代表，弄得我们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一直到散会，也没有对民族自治这个问题做个答复。参加副总统选举的四名候选人，在选举之前，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选活动。他们每人都包下了豪华的酒家、饭店，不仅让代表尽情地吃喝玩乐，拢络人心，而且每人还委派5—10个拉票人，以赠送金银财宝、行贿送礼、许官承诺等手段，进行肮脏交易。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代表，白天不参加会议，自由散漫、逛大街、游花园；到了夜晚，则肆无忌惮地进行赌博、酗酒、吞云吐雾、吸食鸦片，更有甚者，竟敢招来歌妓舞女，陪饮陪玩，寻欢作乐，这些事不仅无人过问，而是在大门口布下层层岗哨加以保护。国民党的领导层，在生活上花天酒地、骄奢淫逸；在政治上，党派分歧，门户林立，互相倾轧、腐败无能。在这以前，只听别人说，我还真不相信。可是这一次，我确实是真的耳闻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堕落现象了。国民党的灭亡是注定了，是任何力量也挽救不了啦，只是时间上的早晚问题”。

我们听了巴云英这些话，感到非常震惊。同时也在私下议论过，这个老太婆已经知道了国民党内外的许多具体情况，如果这些话被国民党特务听见了，说不定要惹祸。因此，我们还真替她担心过。

但是，巴云英是一个有胆有识、深谋远虑的人。她不仅没有理睬这些，反而在民国38年（1949）3月，扩充保安部队之后，委派机枪大队长张振杰和中队长李德福二人，用蝇头小楷将全旗武装部队官兵名单和请求起义投诚的密信写在薄纸上，夹在鞋底中间，扮做商人，到达丰镇县，面交绥蒙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姚喆、杨植霖、苏谦益、高克林等领导人，表示起义投诚。首长们接见了他们俩人，高度评价了巴云英的革命行动的同时，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首长们指出：“我们对绥远省想采

取与北平同样的和平解放方式，现在双方正在进行磋商，所以，在当前要让巴云英带领全旗武装部队，维护好地方治安，等待和平解放的到来。如果双方和谈不成，导致战争的话，那时你们率部起义也为时不晚。希望你们要做好两种思想准备。”随后，给他们二人拿足了路费盘缠，送他们上了路。

与此同时，德穆楚克栋鲁普等人在阿拉善旗王府组建了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派遣塔尔瓦喇嘛和达拉旺根敦二人到归绥、五当召、东胜、包头等地，拉拢居住在该地的乌兰察布、伊克昭、察哈尔和土默特等盟旗的军政要员，参加西蒙自治运动。并分别送达筹备委员会委员的委任状和摊派筹委会活动经费的公函。塔尔瓦喇嘛到达包头，向巴云英面交了唐德吉尔嘎勒他们二人的委任状和从乌拉特后旗筹集2000块现大洋和50头菜牛的公文，又花言巧语地进行拉拢和诱骗。但是，塔尔瓦喇嘛没有达到目的。他走后，巴云英让我写信，将此事告诉住在新忽热的唐德吉尔嘎勒时这样写道：“德穆楚克栋鲁普为了挽救其即将垮台的反动统治，来到阿拉善旗的定远营，蒙骗某些盟旗的王公贵族和封建上层，组建了蒙古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委任你我二人为委员，派人送来了委任状和从我旗征收2000块银元以及50头菜牛的公文，现随信一并转交于你，我已经给塔尔瓦喇嘛作了明确的答复，指出他们这样干，纯粹是痴心妄想，是永远也不能实现的梦幻，蒋介石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的统治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了，还怎么能支持德穆楚克栋鲁普搞什么西蒙自治？这实际上就是设下了蒙古人杀害蒙古人的奸计。因此，我们不参与他们这个筹备委员会。再说，我旗是一个又穷又弱的小旗，根本支付不起那么多银两和菜畜，你阅完这些，如觉不妥，就请自便，但有一条，就是从旗里的财政收入中，连一分钱一只羊也不能给”。塔尔瓦喇嘛白跑了一趟，未能如愿，碰壁而回。可是，德穆楚克栋鲁普并没有死心。是年5月份，又派白海

风、补德巴扎尔、贺守忠与塔尔瓦喇嘛等四人到包头，启动多门关系、企图拉拢、扶持白云英参加筹备委员会。他们见到白云英，整整磨了半天嘴皮，也没有得到任何效果，只好悻悻而回。等他们走后，我拿着唐德吉尔嘎勒的回信，到白云英司令的房间时，她笑着对我说：“今天上午，还是那个塔尔瓦喇嘛领来了白海风、补德巴扎尔、贺守忠等几个说客，软硬兼施，轮番出击，整整纠缠了一个上午，索性要我参加他们那个将要建立的蒙古自治政府，我根本没有点头答应，反而数落了他们一顿，你们几个人哪个都比我强，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是蒙古民族的青年人才，你们应该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依我看，国民党已日暮穷途，奄奄一息，灭亡在即，是在做垂死的挣扎。去年这个时候，他们还统治着中国半壁江山，拥有那么多军队，不是鼓吹过要在6个月内取得胜利，统治全中国吗？现在已一年有余，他们不仅没有取得胜利，反而逃往广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了。蒋介石下野、让李宗仁代理总统，是为了欺骗广大人民群众，妄图挽回败局的垂死挣扎。国民党批准德穆楚克栋鲁普成立蒙古自治政府，是想让他们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云泽（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自治区人民政府相抗衡。那是以蒙制蒙，以蒙杀蒙的极其阴险毒辣的伎俩。他们想依靠国民党实现内蒙古自治，就象水中捞月一样，永远也不能实现。我们过去也不是建立过几次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吗？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如今不是还在这个委员会里任职吗？在这些年里，究竟为蒙古人民解决了一些什么问题？广大农牧民为什么还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你们想过没有？依我看，趁早投靠共产党，才是于国于民于自己都有益的举动？我已经表过态了，无论如何也不参与德穆楚克栋鲁普的那个自治运动。任何人也别再来枉费唇舌、拉扯我。”

仅仅从这一点，也不难看出，白云英的态度是多么鲜明、立

场是多么坚定，她真是一个敢于抵御内腐外患的蒙古族杰出女性。

随后，我请假回家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突然来人叫我，说白云英让我速回驻包办事处。我立即返回包头，见到了白云英以后，她非常认真地对我说：“驻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王府的中共乌兰察布盟工委负责人萨木腾、辛玉、特布信等人给唐德吉尔嘎勒和宝音吉尔嘎勒二位协理来信，让他们到四子王旗王府，商谈关于解放我旗的问题，你快写一封信，我派专人给他们送去。当时，我遵照白云英的指示，马上给二位协理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大概意思如下：

“唐德吉尔嘎勒、宝音吉尔嘎勒二位协理：

如今，共产党方面已经来信，要求你们二人速去四子王旗王府，商谈关于如何解放我旗的一些问题。现在我委托你们二人，见到我的信以后，应毫不迟疑地同往四子王旗。如果俩人同时去不了，一人前往也可以。不过，要是宝音吉尔嘎勒协理一人去的话，就应该带上蒙汉兼通的衙门笔帖式那木格若喜，认真领取关于解放我旗的指示，请回来向我详细汇报”。

唐德吉尔嘎勒和宝音吉尔嘎勒二人接到该信以后，谁也没有法。只委托衙门师爷唐德斯钦和衙门笔帖式那木格若喜二人去了四子王旗。他们到达四子王旗王府，已是1949年的9月中旬了。当他们向乌盟工委负责同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蒙骑四师首长汇报乌拉特后旗情况时，绥远省也宣告和平解放。不久，他们就在四子王旗王府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庆祝大会。接着，他们与乌拉特中公旗扎兰章京那木吉勒斯仁、笔帖式陶格套胡、浑都（骁骑校）敏珠尔、差役米楞、达瓦以及其他旗的代表一起参加了乌盟工委和蒙骑四师负责同志组织召开的会议。原定为商谈和平解放的会议现已变成了如何改变封建政权为民主政权、如何整编伪武装部队为人民解放军的会议了。会议结束时，中共乌兰察布盟工

委对各旗如何开展工作，分别作了具体部署。并为各旗代表提供了足够的路费，欢送他们上了路。

由于巴云英常驻包头，消息比较灵通。同时，她也经常接触各方面的高级官员和社会进步人士，谈论国内外大事和时事政治。所以，她此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了较深的认识。她认为，共产党毛主席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一心一意为劳苦大众着想，是深得民心 and 军心的。自古以来，得人心者得天下，共产党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绥远解放已成定局。因此，她为了乌拉特后旗和自身的前途，决心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抵御他们的拉拢和引诱。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坚决走解放劳苦大众，建设家园的光明大道。是年8月，巴云英在驻包办事处召开了一次有旗保安部队团（大队）以上、司令部少校以上军官和协理唐德吉尔嘎勒、宝音吉尔嘎勒、达尔罕安本阿尤尔扎那、掌印五官以及部分笔帖式参加的会议。在会议上，巴云英首先传达了1949年4月1日傅作义在北平发出的声明政治立场的通电和5月28日签字的“绥远和平协议”精神。接着，她在介绍国内形势时说：“依我看，国民党政府现在丧尽军心民心，大势已去，灭亡在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以破竹之势解放全中国，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听说绥远和平谈判进展很顺利。因此，我们要顺应时代的总趋势，服从人民的意愿，为了促成绥远的和平解放，为了不使我旗遭受损失，我们要进行不懈的斗争。我想，我们旗的军政官员中，在这一方面是不会有持反对意见的，如果谁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就请早点儿拿出来，你们中间如果有谁不愿意跟我走，现在就可以辞去职务或者放下武器符号，愿意去哪儿都可以；我是绝对不会阻拦的。但是，有意见不在会上提，而在会后以我旗官员名义或带上武器符号擅自行动，就要以军法和政纪来论处，绝不姑息迁就。以后，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乱走乱动。为了搞好今后工作，我们一

定要抓好以下几件事：

一是要坚决制止谣言，不信谣，不传谣。特别是要坚决制止从保利亚特和苏尼特等地逃来的人散布谣言、煽动事端。要做好宣传工作，稳定人心，制止群众逃散。同时要说服那些逃离故土的少数人，早日返回家园，安心生产。

二是每一个军政官员都要以身作则，履行职责，带头稳定局势，还要发动群众，搞好农牧业生产。

三是要坚决清除混入部队内的异己分子和坏分子。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人人都要写“维护地方治安，服从统一领导”的保证书。并由三户常住人家做联保，交司令部登记备案。如果哪个团队发生结伙逃跑、哗变或抢劫事件，就要追究该团队连以上领导的责任，以军法论处。

四是要普遍清点登记一次枪支弹药。对那些靠不住的人，要收回其武器，统一保管，以防万一。

与会人员全部赞成巴云英的意见。并且在此基础上统一了思想，安排和部署了下一步的工作，为巴云英弃暗投明和起义以后改革旧政权、整编部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二）、光荣起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锐不可挡，势如破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天津、北平、察哈尔和晋北地区相继解放以后，在这些地区军政方面的反共顽固分子和特务头子，云集绥远，与当地的特务分子和反共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散布流言，造谣惑众，极力反对和破坏以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将军为首的军政人员的和平起义。尤其是军长刘万春、师长鄂友三、骑兵旅长乔汉魁等人，亦坚决反对“绥远和平协议”。此时，国民党华北地区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也跑到包头，组织特务活动，大肆欺骗煽动，造谣惑众，制造事端，成为当时坚决反对“绥远和平协议”的中心。

但是，在这种走向光明与黑暗的关键时刻，巴云英除了积极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以外，还于9月中旬，几次前往现土默特右旗美岱召和现包头市东河区，迎接和晋见了从北平前来绥远省，促进绥远和平解放的傅作义先生，听取了重要指示，共商乌拉特后旗起义后的前途问题。

1949年9月19日上午，绥远省军政高级官员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共39人，齐集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在起义通电上签名时，巴云英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代表乌拉特后旗军政人员和全旗近8000名蒙汉人民，郑重地签了名，光荣地加入了绥远省和平起义行列。

巴云英在率领全旗军民，弃暗投明，光荣地参加了和平起义以后，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具体工作：

1、“九·一九”起义后，包头市军政界以及地方上的10000多人在市南门外隆重集会，热烈庆祝绥远省和平起义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首届全体会议于9月21日在北平隆重召开。乌拉特后旗政府和保安司令部派中校秘书郭维忠为军界代表，中尉参谋吉林太（本文作者）为青年代表，参加了庆祝大会。

为了巩固和平起义成果，巴云英于9月25日在驻包办事处召开了旗保安部队大队长（含副大队长）以上军官和司令部参谋处、副官处、军法处、军需处处长以及部分政府官员参加的紧急会议。在会议上，首先认真传达和学习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对“九·一九”起义通电的复电，以帮助大家解除疑虑，丢掉思想包袱，接着，传达了傅作义、董其武等人对今后工作的部署。另外还举行了参加会议人员的和平起义仪式。由巴云英带头，在2尺见方的白绸上一一签完名以后，大家热烈鼓掌，祝贺起义胜利。

2、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复电中指出的“希望你们团结

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的指示精神，中共绥远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于1950年2月初，召集乌兰察布盟6旗军政要员和中共乌兰察布盟工委负责同志，在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了一个多星期的会议。商讨关于成立乌兰察布盟人民政府，各旗旧政府如何改建为新的人民政府，各旗武装部队如何整编为人民解放军等等问题。参加本次会议的乌兰察布盟旧军政头目有：乌拉特后旗司令巴云英、札萨克诺颜贡嘎色楞、助理唐德吉尔嘎勒、秘书郭维忠、参谋吉林太；乌拉特前旗司令陶格套胡巴图、参谋长葛才武、助理额尔贺多尔济、梅林章京焦太保、艾敏达瓦；乌拉特中公旗助理巴图毕力格、团长齐鲁、副团长陈诚新、秘书巴拉登；茂明安旗司令齐·额仁钦达赖、助理额尔敦陶格套胡；达尔罕旗札萨克王钦苏荣、助理南齐德；四子王旗的嘎瓦热布吉、赛音道尔吉等人；还有乌兰察布盟军分区司令员毕力格巴特尔、乌兰察布盟工委副主任萨木腾、秘书长特布信以及巴音都仁、贤吉美图、塔宾奈玛（汉名五十八）、鄂贵卿、宝林等干部。

中共绥远省委书记高克林，副书记苏谦益、绥远省副主席杨植霖、奎璧、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苏克勤、郝秀山等领导同志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民委主任苏克勤主持会议，宣布了会议开始以后，高克林书记致开幕词，并传达和解释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关于绥远和平解放的复电，号召与会人员要解除疑虑，放下包袱，毫不顾忌地如实反映本旗的情况，为建设新绥远和乌兰察布而奋斗。

各旗汇报情况时，乌拉特后旗的秘书郭维忠代表巴云英、按照预先准备好的材料，真实地汇报了本旗军政情况，受到了省盟两级首长的表扬。而乌拉特前旗陶格套胡巴图在汇报情况时，隐瞒了许多枪支。乌拉特中公旗助理巴图毕力格没有汇报本旗保安司令雄诺东如布支援德穆楚克栋鲁普很多枪支弹药的问题，只报告

了当时实有武器数。因此，他们二人受到省盟领导同志的盘问。当时，乌拉特前旗的陶格套胡巴图对巴云英就很不满意。散会以后，他跑到住在齐、额仁钦达赖家的巴云英跟前，气呼呼地责备道：“你为什么报那么多的枪，让我们为难，被盘查？”听了他的话，巴云英心平气和地说：“明明有枪，怎么能说没有枪呢？你隐瞒武器，是不是想等到蒋介石返回来以后，再使用呢？那是痴心妄想。蒋介石拥有8百万大军还败在共产党手下，逃到了台湾。现在他想卷土重来，收复大陆，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事。你有多少枪就报多少枪嘛，隐瞒枪弹，小心出问题，你可要注意啊”。

在这次会议上，省委、省政府批准了盟工委提出的关于成立乌兰察布盟人民自治政府的方案和逐步成立各旗人民政府以及将各旗保安部队整编为隶属乌兰察布盟军分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旗支队的计划。会议刚结束，乌兰察布盟军分区司令员毕力格巴特尔、盟工委副主任萨木腾、秘书长特布信等人，留下了各旗代表在土默特旗希热图召的准吉萨（东庙仓，系喇嘛庙内专管庶务的机构）借用房屋，又召开两天会议，商讨关于筹建乌兰察布盟人民自治政府的具体事项。他们首先商定了乌兰察布盟人民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选举毕力格巴特尔为主任委员，萨木腾、特布信为副主任委员，巴云英等人为委员。会议最后形成了如下决议：

（1）乌兰察布盟人民自治政府所在地，决定建立在四子王旗乌兰花镇；

（2）会议日期，定于四月中旬召开；

（3）参加会议的代表人数为100人左右（其中乌拉特后旗代表名额为15人）；

（4）绥远省和乌兰察布盟根据各旗的具体情况，在做好成立各旗人民政府筹备工作的同时，派工作团下去，组织和发动群

众，禁止种植大烟和吸食鸦片，积极发展农牧业生产。

经过这一次会议，巴云英和唐德吉尔嘎勒二人进一步提高了认识，放下了思想包袱。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竭尽全力搞好旗里的各项工作，为建立乌拉特后旗人民民主政权和整编地方武装力量而努力奋斗。

3、1950年3月4日，巴云英在乌拉特后旗驻包办事处召开了家住包头附近的唐德吉尔嘎勒、达尔罕安本阿尤尔扎那、梅林章京恩克巴雅尔、扎兰章京丹贝日勒、苏木章京巴图乌力吉、图门吉尔嘎勒、阿尤希扎布，诺尔布、乡长陈满仓和旗保安司令部官员参加的会议，传达了绥远省和乌兰察布盟两级会议精神，经过酝酿讨论，选举了出席乌兰察布盟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的代表。同时也安排部署了迎接即将派来的工作团，并准备好协助他们开展工作。为了保障工作团员的人身安全，在生活上和交通方面给予照顾，旗里决定选派两个班精明强干的士兵，始终保护和帮助他们，先在山前，然后到山后地区开展工作。

4、参加乌兰察布盟人民政府成立大会。

绥远省和平解放半年以后，为了尽快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政策，党中央和绥远省委批准了在绥远省境内的伊克昭、乌兰察布两盟实施民族区域自治。

1950年4月1日，成立了乌兰察布盟人民政府，5月4日，在四子王旗乌兰花镇隆重召开了乌兰察布辖区内的各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乌拉特后旗巴云英、贡嘎色楞、宝音吉尔嘎勒、唐德斯钦、沙木腾、丹贝日勒、图门吉尔嘎勒、那木格若喜、郭维忠、敖云其其格、德得嘎拉僧、恩克达赖、李三、吉林太等14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巴云英当选为盟人民政府委员。

会后，巴云英回到旗里，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解决即将成立的旗人民政府缺少干部的问题，选派阿拉腾敖其尔、宝音德

力格尔、宝音吉尔嘎勒、达瓦、云存祥等5名青年到乌兰察布盟干训班学习。

5、成立乌拉特后旗人民政府

乌兰察布盟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以后，盟里派出以赵忠华为团长，毕力格图、道敖、塔哈拉乌贵，毛敖亥（又名斯庆毕力格）岳新、刘玉堂、王俊枝、贺珍为成员的9人工作团，赴乌拉特后旗开展工作。由于刚刚解放，社会还很不安宁，一些国民党特务、残存散兵和股匪，出没无常，他们骚扰破坏，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为了防备匪特的抢劫、偷袭和破坏，巴云英与工作团团团长商量以后，根据实际情况，将工作团编为两个组，派两个班的武装力量予以保护，深入到绍卜亥、查干达坝、阿尔斯郎沟、召沟、坝梁等地，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统战政策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放绥远的指示以及其他有关政策、法令。广泛宣传鸦片的危害性，普遍开展禁止吸食鸦片、铲除大烟青苗，种植粮食作物，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等宣传教育工作。

巴云英还协助工作团，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与唐德吉尔嘎勒等人商量以后，选出了参加“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推翻乌拉特东公旗延续800多年的封建札萨克统治，成立旗人民政府的代表。并定于1950年7月21日，在现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所在地，召开乌拉特后旗首次各族各界代表大会，成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乌拉特后旗人民政府。

巴云英为了参加旗人民政府的成立大会，带领贡嘎色楞等50多人，从包头出发，于7月20日到达新忽热。翌日，按照预定计划，准时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赵忠华、巴云英、萨音等人主持了会议。经过80多名与会代表5天的共同努力，正式成立了乌拉特后旗人民政府。选举贡嘎色楞为旗长，萨音（共产党员）、唐德吉尔嘎勒为副旗长。宣布了经乌兰察布盟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旗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各努图克（区）的负责人名单：

旗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金义安、唐德斯钦

财政科长：恩克巴雅尔

副科长：张树华

民政文教科科长：宝音吉尔嘎勒

副科长：李生荣

建设科科长：嘎拉僧

副科长：那木格若喜

卫生科科长：图门吉尔嘎勒

公安队队长：贡德桑布

副队长：色日古楞巴雅尔

政治指导员：毕力格图（共产党员、盟任命干部）

第一区（石哈河）区长：李三、

副区长：王俊枝（共产党员、盟任命干部）

第二区区长：丹贝日勒

副区长：刘玉堂（共产党员、盟任命干部）

第三区区长：丹斯仁扎布

副区长：塔哈拉乌贵（共产党员、盟任命干部）

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巴云英在返回包头之前，把旗衙门的财产移交给新成立的旗人民政府。当时，除了土木结构的16间空房子和一辆铁轱辘三套牛车、一匹秃耳无鞍鞮的黑马、30石糜子以及一些锅碗瓢勺、几块儿旧毡以外，别无它物。

6、整编保安队为旗支队

巴云英从新忽热起身，只带领保安队的10多人，返回驻包办事处。她首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乌兰察布盟军分区领导下，将原乌拉特后旗警卫大队整编为乌拉特后旗人民政府公安队，移交给新成立的旗人民政府指挥。其次，她将原巡查大队、机枪大队、特务大队、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等5个大队精减整编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乌拉特后旗支队（团级）。支队官员名单如下：

支队长：巴云英

副支队长：张振杰

政治委员：贡布扎布

参谋：恩克达赖

支队下设3个连，分别任命若勒玛扎布（鄂靖国）、李俊峰、张来锁为连长。接着，巴云英挑选好枪、好马装备了该支队以后，将剩余武器全部上缴乌兰察布盟军分区司令部。此后，她在包头市麻池集中全体官兵，进行了半年多的整训。

在此期间，巴云英参加了绥远省政府组织的少数民族参观团，参观了北京等城市和地区以后。到绥远省民族干部学校学习了半年。1951年11月，巴云英听从组织安排，从部队转业下来，结束了戎马生涯，任乌兰察布盟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委员、盟教育处副处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乌兰察布盟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等职。还先后被选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女第三届代表大会代表。1965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彦淖尔盟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

巴云英自参加绥远省和平起义之日起，就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刻苦学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自觉改造思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积极投身于党领导的各项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九、不幸逝世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1958年7月，乌兰察布盟乌拉特中后联合旗（1952年10月15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乌拉特中旗与乌拉特后旗合并，称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乌拉特前旗，隶属巴彦淖尔盟管辖。翌年，将乌拉特籍的部分干部调往巴彦淖尔盟工作时，巴云英与其长子乌尔图那顺、

幼子贡嘎色楞也一起被调入巴彦淖尔盟公署有关部门工作。虽然巴云英母子三人月薪高达400多元，年收入已远远超过其解放前的个人全年花销，但是他们始终讲求勤俭持家、艰苦朴素的作风，日子过得很美好，很充实。可是，其幼子贡嘎色楞却染上了肺结核病，久治不愈，不幸病故，巴云英日夜思念，茶饭不想，也终成疾患，1964年得了高血压病，长期治疗也无效果，于1966年8月21日，在磴口县巴彦高勒镇不幸逝世，享年67岁。是时，正当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无人过问和安葬其遗体。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的长子乌尔图那顺将遗体火化后，把骨灰存放在家中，一直保存到1979年2月22日。

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党的统战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一切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中共巴彦淖尔盟委员会根据巴盟政协和巴云英子女的要求和愿望，于1979年2月20日下午2时，在盟委礼堂举行了巴云英女士的追悼会。中共巴彦淖尔盟委员会副书记伊钧华、巴彦淖尔盟公署副盟长韩志邦、程希萍、色楞道尔吉、刘孔融、叶青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彦淖尔盟委员会副主席弓志芳、云生格等党政领导和亲属、生前友好以及各界代表共400多人参加追悼会并送了很多花圈。巴彦淖尔盟公署副盟长韩志邦代表盟委、行署和盟政协致悼词。悼词全文如下：

巴云英女士追悼会悼词

各位先生、同志们：

今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悼念巴盟第五届政协副主席巴云英女士。

巴云英女士因患高血压病，经过长期、多方面治疗无效，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巴彦高勒不幸逝世，终年67岁。

巴云英女士，是内蒙古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人。一九四九年

“九·一九”起义，参加革命。参加革命以来，先后任：乌盟军分区乌拉特东公旗支队支队长、乌盟人民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乌盟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内蒙古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女第三届代表大会代表、乌盟人委教育处副处长。一九六五年，被选为巴彦淖尔盟第五届政协副主席。

巴云英女士为绥远和平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参加革命以来，一贯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党的统战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巴云英女士，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各项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

巴云英女士，努力学习，自觉改造世界观，思想进步，生活艰苦朴素。巴云英女士，为党、为人民、为革命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因而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信任。

巴云英女士去世后，长期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没有开成追悼会。今天，我们为巴云英女士召开追悼会，就是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有力批判。巴云英女士与世长辞了，但是，她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悼念巴云英女士，就是要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和全会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行动起来，解放思想，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

追悼会结束以后，中共巴彦淖尔盟委员会和政协巴彦淖尔盟委员会派出汽车，于2月22日，将巴云英骨灰送到今乌拉特中旗部北乡呼图克图乌拉，与其夫已故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坟合葬。随后，对原先在其身边的子女都安排了工作。在生活上，尽量给予了照顾。

结 束 语

本人自参加了1983年8月在临河召开的巴彦淖尔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扩大会议以来，就萌生了整理和撰写发生在乌拉特三公旗内的近、现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生平事迹的意念。从而，下决心开始搜集、整理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诺颜额尔克色庆占巴勒之福晋巴云英女士的生平事迹。为此，我仅以个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以及与巴云英一起工作过的事情为根本依据，参考了有关历史资料，对不甚了解的事情和问题，走访了详知当时情况的老同志和巴云英女士的亲属巴靖远、额尔登其其格、乌尔图那顺、秀仁其其格（又名花女子）、娜布其以及跟随巴云英司令多年的马希巴雅尔、乌力吉巴图、恩克达赖、贡布扎布、高玉升、陈得智、侯凌云、图门吉尔嘎勒，还有当时担任衙门笔帖式的赛音布仁、阿拉腾敖其尔、那木格若喜（杨振喜）、陶赖呼勒庙喇嘛苏和、傅作义在河套时的翻译官曹继贤等人。他们毫无保留地提供和介绍了当时多方面的真实情况，对笔者撰写本文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本文所叙史实，时隔多年，涉及而又广，同时因为本人水平所限，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予以谅解和指正。

原乌拉特后旗（东公旗）历史

变迁概况综述

吉林太撰写

胜道整理

乌拉特三旗，即乌拉特后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前旗（亦称乌拉特东公旗、乌拉特中公旗、乌拉特西公旗）的演变情况，在已出版的史料和书籍中均有一定的阐述和介绍。但是，对原乌拉特后旗的沿革和变迁，特别是对辛亥革命以来的变迁情况，讲述得都不够全面、系统。因此为了使子孙后代对原乌拉特后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畜牧业生产及其疆域的变化概况有所了解，并为研究内蒙古的历史提供更为详细的参考资料，现根据原乌拉特后旗马希巴雅尔、贡布扎布、赛音布仁、阿拉腾敖其尔等老同志提供的材料和我本人所了解的情况，综合撰写了原乌拉特后旗变迁概况一文。由于水平所限，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万望知情者予以补充订正。

一、乌拉特东公旗的由来

原乌拉特后旗（即乌拉特东公旗）系原乌拉特三公旗之一，蒙古元太祖成吉思汗时期由其胞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五世孙布尔海诺颜统领称为乌拉特部。尔后分为三部，由其后裔分领部众同住于

呼伦贝尔，称阿鲁蒙古拉。

朱元璋推翻元朝后，蒙古诸部四分五裂，各奔前程，处于割据状态。其时，聚居长白山一带的女真族（满族）在部长努尔哈赤的率领下，渐渐兴盛起来，进而统一了部族，于1616年建立了金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称帝统治后金20多年，于1636年建都锦州。

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袭位后，改国号为清。他对漠南东部一些蒙古首领采取积极联合的政策。即凡是率部归顺的，一律封官赐爵，保留其原有的封建特权；同时又利用蒙古各部封建主与察哈尔部林丹汗之间的矛盾，诱使他们归向自己一边，以壮大清王朝的势力。在一些蒙古部族不愿听从林丹汗政令而相继投靠努尔哈赤时，乌拉特部亦表示愿意归顺清朝。但是，当时清朝统治者对此持怀疑态度，直至天聪7年，还不予理睬。乌拉特部首领们为了讨好清廷，取得信任，以保护自己，准备了大量的驼马和珍奇贵重的兽皮等礼物，前往锦都朝贡，进一步表明了衷心归顺清王朝的诚意。这一举动迎合了清朝统治者拉拢蒙古，扩充实力，壮大自己，推翻明朝的意图，受到了清廷的热情款待，并赏赐了金银丝绸和盔甲兵器等物，从此，乌拉特部正式归顺了清朝。之后乌拉特部在为清朝单独出征或跟随清帝征战四方的战斗中，始终骁勇善战，无不凯旋而归，为推翻明朝统治、扩大清朝疆域，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等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从另一方面讲，乌拉特部也为结束封建割据状态，促进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因此，清朝统治者在顺治5年（1648）叙以征功，大加封爵赏赐。分别封乌拉特部三位首领为镇国公和辅国公。各札萨克世袭罔替，分别掌管乌拉特前旗、中旗、后旗。其中封额尔贺台吉图巴为札萨克镇国公，掌管乌拉特后旗（即乌拉特东公旗）。

清廷为了挟制喀尔喀蒙古与明朝的贸易往来，特别是马匹的

交易，于清顺治6年（1649）命乌拉特三公旗出兵镇守中西部边关。是年秋，乌拉特三公旗首领率其所部，由故土呼伦贝尔的呼布图奈曼查干、图门乌力吉起程，行至乌拉山（木纳山）和阴山（狼山山脉）前后，将栖身于该地的艾毕日米德扎黑齐（一个部族）匪部追赶到现乌拉特后旗和乌拉特中旗的巴音淖如、巴嘎宁黑日以北，将散居此地耕种田地的人民（指汉人）驱逐到长城以南，并占据此地，闭耕放牧。当凯旋回师时，清廷又命其常驻于此，镇守边关隘道。于是，他们就打消了回故乡的念头，同驻现包头市郊区哈德门口子。乌拉特后旗镇守昆都仑沟、五当沟（现五当召西沟，准确的叫音为乌迪音高勒）；乌拉特中旗镇守哈德门口子；乌拉特前旗镇守西山咀，之后他们久居此地，各管其众，生息繁衍。因三旗札萨克分别为镇国公和辅国公爵位，故人们根据其镇守关隘的地理位置，亦称镇守东部隘口的乌拉特后旗为乌拉特东公旗，镇守中部隘口的乌拉特中旗为乌拉特中公旗，镇守西部隘口的乌拉特前旗为乌拉特西公旗，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乌拉特三公旗共同在此居住生活了近

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巴音哈太苏木等地，东至土默特旗水泉沟、固阳县猪换池、西斗铺、石门子、老杨壕和或明安旗、包头市郊区留宝窑子沟、大树湾渡口以西的地区。但也有少数属民因忍受不了本旗或本苏木台吉贵族的各种摊派和服不完的苦役而远离家乡，逃往其它旗内居住。

二、行政组织、制度及其近代官员的沿革情况

盟和旗是清王朝统治蒙古地区的行政机构。在清初，清廷的主要军事单位叫做“固山”（即军民合一的军事、政治及社会组织，也是有固定的疆域和属民的政权机构），蒙古各部基本归顺清朝以后，努尔哈赤依照满族各旗的性质、组织、制度等形式，将蒙古某一个部落分设为一个或几个旗，分别命名，令其各回原牧地，以其地为地方军事、行政单位和蒙古王公封建主的世袭领地。中华民国成立后，窃据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承袭了清朝的衣钵，原封不动地继续沿用了清廷的封建组织体制及其制度，以笼络、羁縻等手段，延续了王公贵族统治内蒙古各旗的特权。

（一）、行政组织系统

原乌拉特后旗的行政组织机构与内蒙古其他没有札萨克的旗一样。在清朝统治时期，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的办事机构称作和硕衙门（旗衙门）。民国以后至全国解放前夕，根据国民党政府所发的印玺改称乌拉特后旗政府。

旗里设札萨克一人，系世袭制。札萨克总理全旗军、政、司法等旗务。

旗里设东西协理台吉各一人，早先由札萨克的直系亲属担任，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札萨克近亲中若没有这样的人才，也

可从一般台吉中选派，协助札萨克处理旗里的常务工作。

设管旗章京一人，按照札萨克诺颜和协理台吉的旨意掌管全旗军政、财税、司法等日常工作。

设东西梅林章京各一人，协助管旗章京处理全旗日常事务。

设扎兰章京二人，每人分管三个苏木，督促指导苏木章京办理地方事宜，并按照旗衙门的指示，向苏木下达各种摊派。

全旗共设有六个苏木和一个扎鲁特铁宾。这是全旗的基层组织，除扎鲁特铁宾直接归王府管辖外，其余六个苏木分别归两名扎兰章京掌管。

每个苏木设一名苏木章京（佐领或称箭长），按照上述仕官的指令和意图，直接向属民摊派差役，按时收交旗政府和王府（诺颜仓）所需要的各种费用，同时就地处理民事纠纷。因为苏木章京的具体任务重，事务繁杂，所以每个苏木还要配备一名骁骑校（浑都）和一名领催（保希格），作为苏木章京的助理，协助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旗政府机关内设有师爷达日嘎二人（相当秘书长），领导笔贴式（文书）若干人。为了妥善管理旗政府和王府的财产，做好札萨克诺颜、福晋等贵族上层和政府官员的生活服务工作以及接待来宾等工作，旗政府和王爷府还分别设有管家达木勒（管事）、图力呼日齐（司钥匙）等人。还设有鞞务、传令、侍卫（黑亚）差役（塔哈拉）等若干人，专门为贵族上层和政府官员服务。

上述组织机构从清朝初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27年（1938）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大部地区以后，伪蒙疆政府在乌兰察布盟所属各旗组建伪政府时，乌拉特东公旗政府机构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只是将原六个苏木、一个铁宾合并为两个苏木，称第一苏木、第二苏木，并将石哈河地区原属于旗里管辖的农业区编为一个蒙乡，下设三个保，配备了正副乡长和保长。

在此期间，该旗札萨克福晋巴云英带领王子贡嘎色楞以及一部分官兵，跟随国民党中央直属骑兵第七师师长、绥西警备司令门炳岳撤到后套，毅然参加了抗日救亡战争，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经国民党政府批准，立王子贡嘎色楞为乌拉特后旗札萨克，巴云英为护理札萨克。于民国29年（1940）在陕坝成立了乌拉特后旗流亡政府，继续坚持抗日。在全国人民的英勇抗击下，民国34年（1945），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巴云英凯旋归来，推翻了伪政府，恢复了原六个苏木的建制，保留了蒙乡的建制，称作新蒙乡，留用了原旗和乡的文职人员，重新任命了六个苏木的章京和一个扎鲁特铁宾的哈温（相当苏木章京）等官员。紧接着又于民国36年（1947）初，在绍卜亥，查干达坝，阿尔斯浪沟南北，召沟、坝梁、刘四壕、哈布齐拉沟等地耕种田地的汉民聚居区组建了一个民丰乡，下设三个保，分别任命了正副乡长和保长。至此，乌拉特后旗政府以下已经设立了七个苏木（人们习称扎鲁特铁宾为扎鲁特苏木）、两个乡，六个保。民国36年（1947）初，恢复了沙坝子，鸡毛窑子，大庙子，哈尼河，大树湾渡口等五处税卡子，配备了卡长和税征员等工作人员。

为了便于和友邻旗县联系工作，乌拉特后旗政府和保安司令部在包头市东河区园子巷19号院内建立了驻包办事处，成为统管全旗军、政、财、文大权的指挥中心。常驻该办事处，跟随札萨克和福晋的旗军政要员及工作人员通常不下30人。

乌拉特东公旗衙门（旗政府）因种种原因多次搬迁。最初，与乌拉特前旗、中旗衙门一起驻扎现包头市郊区哈德门口子。清王朝统治全中国的形势已成定局后，乌拉特东公旗衙门迁至现包头市郊区昆都仑沟口柴脑包，后又迁至现乌拉特前旗明安乡营盘湾（那时，汉族称旗衙门为营盘。因旗衙门迁驻此湾，故称此湾为营盘湾，蒙名叫图希格图套亥），修建了衙门机关和诺颜仓房。

舍。乌拉特东公旗衙门在此驻扎时间最长。在清光绪年间，又先后搬迁到崮石太山以北现乌拉特中旗部北乡伊肯敖包滩的玛尼布特哈齐和石哈河乡的桑根达赖（汉名叫印壕）。民国年间，军阀混战，独立队土匪四起，再加高台梁地区大片牧地被迫开垦，众多牧民大批北迁，乌拉特东公旗政府亦向北先后搬迁到现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哈拉干楚鲁、哈布气勒、敖包恩格尔。最后搬到城库联（现新忽热苏木政府所在地）大动土木，修建了政府机关和诺颜仓房舍。在此迎接了1949年的全国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二）行政官员及其沿革

内蒙古各蒙旗的王公，是蒙古汗权的遗影和清王朝及其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内蒙古地区的产物。清王朝入关前后，向蒙古部族大力推行了恩威并举，羁縻笼络的政策，对蒙古贵族上层加封晋爵，世袭罔替，除总管制的旗以外，其他旗的行政主要官员均由王公、台吉等贵族上层担任。故乌拉特东公旗的札萨克诺颜和协理台吉都是由札萨克公及其近亲中的台吉承袭。从清朝顺治五年（1648）至民国38年（1949）的300年间，乌拉特东公旗的札萨克镇国公和贝子是从布尔海的曾孙图巴开始，到他的13世孙札萨克贝子贡嘎色楞为止，共承袭了13代17次。

乌拉特东公旗从清朝顺治年间至民国末年承袭札萨克公，贝子的详细世系是：

图巴——布尔海之孙哈尼太宾图诺颜之子，于清顺治5年（1648）任札萨克镇国公，顺治13年（1656）去世。

海色——图巴长子，顺治13年（1656）袭札萨克镇国公，康熙8年（1669）去世。

察木察——海色长子，康熙8年（1669）袭札萨克镇国

公，康熙25年（1686）去世。

都棱——察木察长子，康熙25年（1686）袭札萨克镇国公，康熙52年（1713）去世。

诺尔布璘沁——都棱长子，康熙52年（1713）袭札萨克镇国公，康熙56年（1717）去世。

锡拉布——都棱次子，康熙56年（1717）袭札萨克镇国公，乾隆7年（1742）去世。

索诺木扎木斯——锡拉布长子，乾隆7年（1742）袭札萨克镇国公，乾隆20年（1755）去世。

索诺木拉布坦——索诺木扎木斯长子，乾隆20年（1755）承袭札萨克镇国公，乾隆40年（1775）去世。

车布登栋罗布——索诺木拉布坦长子，乾隆40年（1775）承袭札萨克镇国公，嘉庆7年（1802）去世。

拉德那巴拉——车布登栋罗布长子，嘉庆7年（1802）承袭札萨克镇国公，于道光14年（1834）被革职。

胡毕图——拉德那巴拉叔父，道光18年（1838）奉命袭札萨克一等台吉，咸丰2年（1852）去世。

旺楚克色楞——胡毕图长子，咸丰2年（1852）袭札萨克，咸丰11年（1861）被封为镇国公，同治6年（1867）去世。

色楞那木济勒——旺楚克色楞长子，同治6年（1867）袭札萨克镇国公，光绪23年（1897）去世。

木勒多尔济——旺楚克色楞次子，光绪23年（1897）袭札萨克镇国公，光绪29年（1903）去世。

拉什那木济勒多尔济——色楞那木济勒长子，光绪30年（1904）袭札萨克镇国公，民国元年（1912）中华民国政府封为札萨克贝子，民国10年（1921）去世。

额尔克色庆占巴勒——拉什那木济勒多尔济长子，本旗阿格

鲁庙活佛。其父去世后，退僧还俗，民国10年（1921）袭札萨克贝子，后兼任绥远省境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委、实业处处长等职。民国25年（1936）因车祸身亡。

额尔克色庆占巴勒去世后，因其子贡嘎色楞年纪尚幼，不能亲政时，奇穆特林沁多尔济（拉什那木济勒多尔济次子）奉民国政府之命任护理札萨克。乌拉特东公旗沦陷后，他于民国27年（1938）任乌拉特后旗伪政府札萨克，兼任伪蒙古军防卫六师乌拉特后旗团长，民国33年（1944）春病故。

贡嘎色楞（贡世明）——额尔克色庆占巴勒之子。民国26年（1937）秋，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乌拉特后旗时，其母巴云英（额尔克色庆占巴勒之福晋）率领三个团的兵力和子贡嘎色楞进入后套，投奔国民党骑七师师长门炳岳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战争。民国27年（1938）夏，在五原县城内组建了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奉国民党军政部之命，巴云英任少将防守司令。民国29年（1940）根据巴云英的要求，经国民党政务院、蒙藏委员会和军政部批准，贡嘎色楞承袭乌拉特后旗札萨克贝子，兼任乌拉特后旗防守司令部少将司令，并成立了乌拉特后旗流亡政府。民国35年（1946）晋升为中将保安司令。1949年绥远和平解放后，任乌拉特后旗人民政府旗长。1951年被免职，任一般干部。1964年病逝。

在贡嘎色楞袭位时，由于他年纪尚幼，难以亲政。故贡嘎色楞之母，绥境蒙政会委员、绥蒙党部特派员巴云英奉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之命，任护理札萨克兼代司令，执掌全旗军政大权。

鸦片战争以来，历任乌拉特东公旗协理、管旗章京、梅林章京、扎兰章京、苏木章京的人员有：

东西协理：第一任：柴布拉——系宝音吉尔嘎勒之父；孟克巴图——唐德吉尔嘎勒之父。第二任：脑亥夫——米齐德道尔吉之父；奇穆特林沁多尔济——札萨克拉什那木济勒多尔济之次

子；米齐德道尔吉——脑亥夫之长子。第三任：唐德卡尔嘎勒——孟克巴图之长子，解放后任副旗长、代旗长，1952年春自尽；宝音吉尔嘎勒——柴布拉之长子，解放后出任财政科长、副旗长，1975年病逝。

管旗章京：辛亥革命前后至1949年任管旗章京的有：本希热、萨木坦、贡其格、森培勒、巴特、阿尤尔扎那（又名赵太保）、米齐德道尔吉、阿拉腾太绥（又名贡财）、罗布僧达瓦。

东西梅林章京：除上述管旗章京的多数是由梅林章京晋升外，还有：本布格、乌兰呼、夏日班迪、恩克巴雅尔、若格瓦等。

东西扎兰章京：扎兰章京同时有两名，近代历任扎兰章京的，除上述官员中相当一部分是由扎兰章京晋升外，还有：陶格米德、萨仁呼、丹斯仁扎布、陶德毕力格、包日呼、嘎拉僧、丁布日勒等人。

上述一名管旗章京、两名东西梅林章京、两名东西扎兰章京合称为政府“掌印五官”。

七个苏木两个乡的官员有：

巴图苏木章京：图孟德力格尔、吉仁太、阿尤希扎布。

高勒苏木章京：那顺敖其尔、沙木腾、龙德格尼玛、嘎拉僧。

黑亚苏木章京：龙德格扎木素、包日呼。

苏海图苏木章京：陶布沁斯楞、贡僧扎布、图孟吉尔嘎勒（又名赵青山）。

乌布尔孛儿只格特苏木章京：乌力吉巴雅尔、恩克乌力吉，三小子、巴图乌力吉（邬振兴）。

阿鲁孛儿只格特苏木章京：诺尔布。

扎鲁特铁宾（直接属诺颜仓管辖，亦称扎鲁特苏木）哈温、夏日板德、吉格米特多尔济。

新蒙乡第一任乡长：武三挠、副乡长：李财罗；第二任乡长：李三，副乡长：武金祥。

民丰乡第一任乡长：李俊峰，副乡长：吉仁太、陈满仓；第二任乡长：陈满仓，副乡长：格日梁。

政府文职人员中历任师爷达日嘎的有：本波、唐德吉尔嘎勒、图布信、陶德斯钦、赛音敖斯尔（卜教）。

近期以来历任旗衙门和诺颜仓管家的有：乌力吉巴雅尔、恩克乌力吉、若格瓦、嘎拉僧格力格、曲日呼木尼玛、白彦尔、乌力吉巴图。

任旗衙门和诺颜仓达木勒（管财政税务）的有：贡布扎布、班吉日格齐、宝日呼、萨如拉、贡德桑布、丁布日勒。

（三）、行政制度

解放前各蒙旗的行政制度，是维护王公贵族和民族宗教上层权利、地位的封建制度。在清王朝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蒙旗虽有法规条文，但是公开与群众见面的却很少。各蒙旗的制度和规定，也不尽相同。乌拉特东公旗的行政制度和经济制度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

（1）、本旗属民中，凡台吉家族出生的男孩，到七岁时，报苏木章京，交纳入谱金，记入家谱，13岁时，到旗衙门向札萨克诺颜或协理台吉献礼叩拜，承接台吉顶戴后，方可领有本户所属的阿勒巴图（箭丁、牧奴），或招收阿勒巴图，否则不予承认其台吉后代，亦不准招用阿勒巴图。在台吉家族之间不准嫁娶，不准与汉族通婚，违者发落。

（2）、凡本旗属民均有向旗衙门和诺颜仓服役的义务。除喇嘛以外的男性属民到达15岁后，就要服兵役和劳役；女性属民则有服放牧、挤奶、缝补等差役的义务。

（3）、本旗属民有承担旗衙门和札萨克诺颜、协理台吉公

务、费用的义务。由苏木章京向所属各户摊派并征收上缴。

(4)、凡归附本旗的它旗属民或汉、满、回、藏等民族的属民，均有与本旗属民同样服差役的义务；途经本旗运输大道的外地运输户和驮运户，都要按次数缴纳过路税。凡在本旗暂住、放牧的汉回族户家，每年都要缴纳牲畜水草费。

(5)、各苏木乡征收的每项费用，必须按原分配数目全额上缴，不得克扣；每个管家和达木勒都要有收支明细帐，在每年秋季旗政务会议上张榜公布，并向札萨克诺颜和协理台吉报告决算情况。

(6)、每年要召开三次旗政务会议（蒙语称作古鲁班楚格拉），即在正月、中秋、腊月各召开一次，由札萨克诺颜和协理台吉主持。每次会议的议程和参加的人员分别是：

中秋会议：在每年8月份召开，会期5天。此次会议规模大，议题多。参加人员有：札萨克、协理、管旗章京、梅林章京、扎兰章京、师爷达日嘎、笔贴式、管家，达木勒以及各苏木章京和乡长副乡长等全体行政人员。会议议程基本上是固定的。一是议论和检查上一次会议以来旗务方面的问题；二是决算一年来的收支费用，分配和下达各项赋税及征收任务；三是任免官员，处理诉讼案件，进行嘉奖和处罚；四是审理和判处刑事罪犯和民事罪犯。

封印会议：每年腊月28日召开，会期一天，参加人员有：札萨克、协理、轮班政务仕官、师爷达日嘎、管家以及衙门附近的苏木章京，能来多少算多少。主要是将满清时期赐予乌拉特东公旗的银质虎头大印取出来擦洗干净后，供奉在佛堂内，摆上整羊背等供品，点上长命酥油灯，与会官员叩头下拜完毕后，门上加锁、贴封条，将大印封存起来。

开印会：每年正月初三召开，会期2—3天，参加会议人员与中秋会议相差无几，但议程不多。一是与会官员首先要到诺颜

仓，向札萨克诺颜、福晋和公子、小姐以及闲散王公献礼、叩头、拜年，并接受札萨克诺颜的款待。二是举行开印仪式。札萨克诺颜或协理台吉开锁启封后，由札萨克诺颜带头向虎头大印和佛像行跪拜礼，燃香点佛灯，宣布从即日起列行公务，办理旗政大事。祝福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大吉，一切如愿。然后，全体官员在衙门院内以新鲜教木（褪掉毛的整羊）为贡品，点酥油灯叩头，敬献美酒，祭祀军旗，祝愿所向无敌、马到成功。接着，札萨克诺颜乘马，带领全体官员，手捧哈达和马奶酒，快马加鞭，绕衙门大院转三圈后，回府娱乐。三是研究处理中秋会议以来的遗留问题。

（7）、司法制度：一般民间纠纷均由苏木章京、退職仕官和艾力、乌素（即村庄）的名誉仕官来调解处理。凡是大的偷盗、抢劫、杀人放火等案件，均由旗衙门审理判决。惩处的形式和内容有：退赔、罚款罚物（牛马驼羊）；游苏木（让罪犯戴上手铐脚镣、披枷带锁、转游本苏木甚至本旗属户，时限几个月甚至几年不等）、驱逐、流放；枪杀、刀割、四马分尸、装牛皮浑筒（整剥下来的牛皮）等死刑。刑具有：黑皮鞭、手板子、手夹板、打耳光板子（多用鞋底）、竹签子、镣、铐、老虎凳、骑鞍、杠子（用于搓杠子）、铁项链（铁环绳带锁）、囚车等。对犯人的审讯，均由管旗章京、梅林章京、红笔师爷等仕官出庭审理。札萨克诺颜和协理、台吉一般不出面参与。

上述陈规陋习和封建禁令，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才逐步松动。特别是婚姻方面，台吉之间的婚嫁和蒙汉回族之间的通婚已不再受到禁止。台吉入谱交费和奴役阿勒巴图的规定亦逐步取消。

三、垦放牧场与旗县并存的形成

乌拉特地区很早就有过开荒种田的历史。但毕竟是星星点点，时种时闭而已。当时的乌拉特地区是水草丰美、山青水秀、山狍野鹿、飞禽走兽应有尽有，生态平衡，牧业发达的地区。

清朝后期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对外屈膝投降，对内以付洋人赔款为借口，大力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强行垦放蒙旗土地，搜刮巨额押荒银。从光绪28年（1902）开始，不顾广大蒙民反抗，大量垦放蒙旗牧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但是袁世凯、蒋介石继承了清王朝的衣钵，变本加厉，继续放垦牧场。那些封建王公和民族上层，也渐渐地由反对开垦转为欢迎开垦，为垦荒开绿灯，并在清丈荒地的过程中，乘机捞取厚利，朝廷官吏贪污中饱，垦务机构营私舞弊，再加上地主豪绅包揽大片土地，转手渔利，其结果，土地不但没有获得正常的开垦和使用，反而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破坏了农牧业生产。从光绪32年（1906）至民国24年（1935）的29年内，原乌拉特后旗境内发生过6次大量开垦牧场的事件。

第一次是垦放了原乌拉特后旗在现黄河南岸归伊盟达拉特旗的红同湾、王应基滩和大树湾一带的诺颜仓牧地。

第二次垦放了现归包头市的东河区以西、扎浪湾、万水泉、乌尔图壕、韩庆坝、武银福窑子、公忽洞、后营子、留宝窑子、大庙子、鸡毛窑子、鸡儿平梁、傅家沟、银匠窑子、毛粪庄窑子等地。

第三次垦放了现归乌拉特前旗管辖的明安、朝阳两个乡，菅家窑子、贾泉湾、梁半圪堵以东至固阳县猪换地、吉仁陶勒盖、什拉淖尔达坝沟口以西的大片牧地。

第四次垦放了小余太川、老爷山、毛忽洞沟以东至固阳县敖包口子、斗铺、乌尔庆壕煤矿以西的牧场。

第五次垦放了现归固阳县的白彦沟、阿鲁包头、阿尔斯浪沟，牛场窑至水家沟后口子、巴总窑子、狮子庄、德胜沟、敖其尔窑子、朝核尔窑子、石人塔等地的牧场。

第六次垦放了磴石太山以北的高台梁地区，西至花温都尔，潘家圪旦、王永胜壕、段家河以东至北场、老杨壕、柏木井、刘满壕以西的牧场。

据曾在原乌拉特后旗政府担任过管家的乌力吉巴图（二秃子）讲，乌拉特东公旗先后6次共清丈放垦3000顷可耕地（“官方数字”），实际上在这些地区放垦的可耕地要比这个数字大好几倍。上报数字少的原因其一是垦务局官员不负责任，官僚主义严重；其二是指地领丈人员和垦务局具体办事人员收受贿赂，中饱私囊，借放垦之机，大发横财。由于80%的牧场被开垦，当时靠天养畜、游牧为生的广大牧民无法在故土生存。包头市东河区西滩居住的牧民和在明安川居住的牧民分别被挤进了乌拉山、白彦花山和大青山中；小余太川和高台梁地区的牧民向北迁至现乌拉特中旗新忽热、巴音哈太苏木等地区。由此致使牲畜头数急剧下降，牧民生活日益穷困。全国解放前夕，全旗7个苏木两个乡的牲畜总头数还不到10万头（只）。加之缺医少药，疾病的流行和满清灭蒙政策的毒害，全旗蒙古族人口勉强超千，连同两个农业乡的汉族人口，总计仅有8000余人。

还须提及的是，满清和民国政府，长期实行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政策，使原乌拉特后旗被包头市和固阳、安北三市县三面围困、蚕食。所有平原牧场全被耕种，蒙汉插花居住，旗管蒙古族，市县管已垦农区的汉族，使原先完整的一个旗被分割成两大片四小块。两大片是：大青山西部地区，绍卜亥沟以西至乌拉山哈德门沟以东、白彦花山以南山区居住的该旗蒙民为一大片。现

归乌拉特中旗的新忽热苏木和巴音哈太苏木地区为另一大片。四小块是：绍卜亥沟、德岭沟、厂汗达坝沟为一小块。阿尔斯浪沟、白彦沟为一小块。昆都仑沟以西，哈德门沟以东的山前山后为一小块。现乌拉特中旗巴音杭盖苏木的德日素、查日格、查干淖尔为一小块。除现在划归乌拉特中旗的牧民以外，其余划归包头市、固阳县和乌拉特前旗的牧民均居住在深山峻岭之中。

清王朝和民国政府在大量放垦蒙旗牧地时，向挂领耕地者征收押荒银，国家与蒙旗各分所收押荒银的一半。根据耕地土质分等定价，一次收清。据清朝“钦差垦务大臣”全宗记载：“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元年，仅在乌拉特后旗大青山南、黄河两岸共垦放牧地四百六十九顷八十八亩六分，应征押荒银一万七千四百四十八两三钱，每年应征岁租五百三十一两多，平均每顷（100亩为一顷）地价银子三十七两，岁租银子一两一钱三分。根据乌拉特垦务分局押荒章程，地分六等。每顷上地一百四十两，上次地一百两，中地七十两，中次地四十两，下地二十两，下下地十两的规定，征收了大量的民财，除垦务支出，留给地方政府的就不到一半了。乌拉特东公旗报垦地内达到上上等地标准的很少，除黄河南小套河两岸的黄灌区土地外，其余都属于荒漠草原，靠天种植的旱地。因此，每顷上等水地年租银币一元，下下等旱地每顷岁租零点七元。该旗凡有这类岁租收入者，都是台吉贵族中曾在国家招垦前就占有大量私放私垫土地的少数上层户家和札萨克、闲散王公。奴才和寄旗户（外旗或汉族自愿申请加入该旗之户）无吃租权力。

在垦放牧地时，已报垦而无人承领的成片草场和地下矿产以及岩石裸露盐碱沙滩、山河道路、沙丘、乔灌林木、海河湖泊、芦苇蒲草等土地和自然资源、交通主道均无任何代价地被市县地主富豪、商人和农民占用。因此，蒙旗提出向受益者收取以水草费和过路税为主的各种税费的要求。后经满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批

准，向居住该地区的养牧户和运输户按年按牲畜（耕畜除外）头数收取水草费。牛、马、骡每头年收0.50银元，驼每峰年收0.70元，驴0.30元，羊每50只交中等羯羊一只，不足50只的按数作价交款。过路的运输车辆和驮运的驼马驴骡以及河运上的过往船只、筏子等根据运载量收取过路税和靠岸税。另外，还对开矿、采药、养鹅鸭和利用河水泉水浇地或用芦苇、蒲草搞编织的，要酌情收费。总之，想方设法向人民群众收取种种费用，特别是垦区内属于县市管辖的农民，不仅要向蒙旗缴纳水草费、岁租、过路税，而且还要向乡县市缴纳各种摊派和统计粮、牲畜税等等。从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因此，从1935年至1949年间，原乌拉特后旗与包头市固阳县安北县发生过数次武装冲突。如：民国29年（1940）至31年（1942）间，乌拉特地区大部沦陷后，为了解决日伪军的粮草问题，日本顾问与伪乌兰察布盟盟长、乌拉特中公旗札萨克林沁僧格，未经任何许可，便强行开垦原乌拉特后旗牧地大小白音查干、阿贵梢、哈纳、呼芦斯太、二驴子湾等地。抗日胜利后，乌拉特中公旗又派大批军队前往现乌拉特中旗鹁鹁图乡，强行关闭这些耕地。刚从后套凯旋归来的白云英亦派出军队进行抗争，而未能闭耕。1949年，乌拉特西公旗保安司令郝游龙欲垦放现乌拉特中旗巴音哈太苏木红花特拉、毛尔其格、乌兰额日根等地牧场，后遭到乌拉特中公旗的武力抗拒，未能垦种。许多事实说明，为抢夺押荒银和租粮，乌拉特三公旗之间争权夺利的摩擦，也是经常发生的。

四、财政经济状况

乌拉特东公旗在辛亥革命前是以牧为主的纯游牧地区。从札萨克满颜到每个台吉贵族，均占有大量的牲畜和丰美的草场。在

肥沃的草原上和茂密的山林中亦有可供猎取的鸟兽。全旗人民的生活所需和军政费用以及向清廷朝贡的大量驼马牛羊，均由属民负担，从畜牧业和猎获物中支付。到清末和民国年间，由于无止境地放垦牧场，不仅广大牧民的牲畜头数日益减少。而且连野生动植物也逐渐减少。随着日月的推移，在山沟内留给牧民的草场、敖包和召庙附近的草片以及地下的矿产资源，也被贪得无厌的地方官吏和地主豪绅劫为己有。肆意垦种、开发。从而，在该旗单一的畜牧业经济中，参杂进了农业和工业的成分。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粮食加工业，如碾米、磨面、榨油、酿酒、制糖等作坊也相继产生。与此同时，农牧民中涌现出的金银铜铁木加工、修理等小手工业匠人也日益增多。解放前夕，全旗大小牲畜总头数为8.7万头（只），耕地15.4万亩，民办油房6座，煤矿1处，瓷窑1处（营盘湾瓷窑），石棉厂1处，私营商号1处（德裕盛），由包头前来经商做买卖的旅蒙商有10多户。

民国26年（1937），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绥远以后，为了搜刮蒙旗畜产品和土特产品，让伪蒙疆政府投资，在各旗设立合作社（豪勒希亚），乌拉特后旗设立了一个总社和两个分社（即山前分社和后山分社）。总社设在包头，前山分社设在现固阳县绍卜亥，后山分社设在现乌拉特中旗新忽热，日本投降后，总社财产被国民党没收，分社财产均被当时主管的官吏侵吞。民国35年（1946），在石哈河地区成立了一个合作社，挂有乌拉特后旗合作社的牌子，是李财罗、张来锁等人人股经营的私营买卖。

原乌拉特后旗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以下两项：

（一）、税收

旗政府的税收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来自包头，固阳和安北等市县属区农民的水草费和岁租

收入；二是主要交通要道和黄河水路过往车辆驼马、船只的过路税和靠岸税；三是矿山的租税；四是本旗未报垦而实际已开垦地区的农业统计粮、大烟税和牲畜水草费；五是坐营或串户购销的私营商号及榨油、酿酒等作坊的营业执照税。

（二）、向本旗蒙古族属民摊派旗衙门

和诺颜仓的各种费用

在抗战前，每年都要向本旗属民以户摊派银两、米面、肉畜、皮张、成品毡、奶油、奶酪、砖茶、食盐、笔墨纸张等生活用品和办公用品。

抗战期间，沦陷区内的各蒙旗伪政府，为了搜刮更多的钱财，改变了过去的摊派方法，实行按牲畜头数征缴牲畜的办法。具体作法是：大畜一折七（即一头大畜折合七只小畜），折成小畜后，每百只交两只（即2%）羯羊。没有羯羊的，折价交款。这种摊派看起来虽然合理，实际上却加重了属民的负担好几倍。日本投降后，巴云英推翻了伪蒙疆的这种规定，恢复了原来的旧制度。又根据全旗遭受战争洗劫，旗民极端穷困的实际情况，她宣布三年不收费不搞摊派，号召旗民积极行动起来，发展生产，恢复元气。一直到全国解放为止，除民国36年（1947）为给军队做防寒衣，而不得不向每个牧户摊派三张绵山羊皮以外，再未收取任何费用。在这个时期，旗政府、王府和保安部队、基层税征员的开支，均靠岁租、水草费、过路税和矿山租税、大烟税、统计粮等。在旗保安司令部任职的汉族官员，以前没有明确的薪水待遇规定，只是从1949年初才开始每月发给校官一石五斗小米，尉官一石小米，勤务兵、传令兵、车夫、火夫每月五斗小米。因此，无论是外出或坐机关的公职人员，为了抚养全家老小和解决日常零花钱，遇有机会，无不贪污受贿。对此，他们互相之间谁也明白，只是彼此彼此，互相包庇过去而

已。

上述几种财政收入，特别是岁租、水草费、过路税和矿山租税，虽然是旗政府和诺颜仓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在具体收取时，并非一帆风顺，要经过几番周折，才得以征收。这些税收项目中，矿山租税是满清政府在垦放蒙旗牧地时，为堵蒙古人之嘴，才批定的。但清朝被推翻后，袁世凯的国民政府于民国元年（1912）秋季发布了“蒙古八条”，尔后，蒋介石集团也再三声称，清廷对蒙旗的规定继续有效，处理蒙旗事务必须本着“新规定不增，旧礼俗不改”的原则来办理等等。但在具体执行时，却走了样子，致使蒙旗税收工作经常受阻。为此，原乌拉特后旗政府曾几次派遣官员，携带诉状，前往国民党中央政府和绥远省政府、绥远省蒙旗指导长官公署坐诉不离，才得到国民党中央蒙藏委员会的批示，责令绥远省政府，不仅按原规定交租交税，而且开采矿藏时，亦应取得有关辖旗的同意，并缴纳采掘税和矿山租税。这项规定，一直执行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原乌拉特后旗政府还多次向清廷和民国政府提出“蒙旗政府直至乡苏木的行政人员和旗办小学教师，应与县区公职人员和教师一样，享受国家薪水待遇”的要求，但直到全国解放，也渺无声息，分文未拨。特别是抗日战争暴发前后，统治绥远省的某些官僚，变本加厉地执行蒋介石的大汉族主义政策，明一套，暗一套，支持市县拒交水草费和过路税。使蒙旗长期处于经济萧条、财政紧张难以渡日的状态。除王公上层有钱花，生活阔绰外，其他各级官吏、具体服役的公职人员和兵丁没有任何薪水，穿自己吃自己。因此，一年最多应差三个月。个别常差，实在无法过下去时，向王爷以借钱的名义要上几个钱，换衣买鞋、常借不还。如果借不上，就偷跑回家，被抓回来挨鞭打、受处罚。这就是旧社会蒙旗王公贵族执政掌权、统治旗民、孝忠清王朝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结果。

五、武装力量的重建与发展

游牧于呼伦贝尔草原的乌拉特部，在1648年奉清廷之命出兵西征，清剿了盘踞在乌拉山和阴山南北的艾毕日米德匪部，整顿地方秩序，镇守乌拉山一带的通商要道和行军作战的各主要山口隘道。清朝基本统一全国以后，为了在政治、军事上对蒙古实行有效的控制，在蒙古地区普遍建立了盟旗制度，划定疆域，给蒙旗各级封建主赐予一定的世袭领地，并规定各旗不得越界游牧和互相往来。时局基本稳定以后，便开始采取了对蒙旗减少或不供武器装备、另行组织建立专门军事机构和作战军队的办法，使原来军政合一的蒙古各旗逐步转变为单纯的地方行政机构。而各旗王公贵族，在清王朝赐予的各种特权笼络下，敌情观念减退，部族观念日益淡薄，只知对清廷感恩戴德，唯命是从，不知保护本地区本部族长远的根本利益。从而，大部兵丁退役归牧，弓箭入库，马放南山，高枕无忧，坐享其成。偶遇匪患，也无力防范抗争，只好报请朝廷，调兵清剿。据清史稿记载，同治十年三月，回匪复自赛音诺颜之艾毕尔米德部骚扰乌拉特中公旗红花特拉、什巴格台等地时，清廷派金运昌、王凤鸣部将匪患全歼在现乌拉特中旗抗盖戈壁苏木本布套亥庙和查干高勒庙附近。从此以后，乌拉特三公旗人民得以较长时间的安宁，生产有所发展，生活也有所改善。但在清末和民国初期，又出现了外国列强的入侵和国内喀尔喀蒙古闹独立，北洋军阀混战的局面。战乱也席卷了绥远省西部地区。以芦占魁、杨候小为首的独立队、哥老会的土匪、不浪队（即手持棍棒之队）到处请财神、抢夺民财，奸污妇女，杀人放火，无恶不做。而乌拉特三公旗竟然没有一支能够防范抗击的武装力量，只能任其胡作非为。

在这种情况下，各蒙旗仕官们产生了恢复和重新组建地方武

装的念头，并开始筹措资金，寻找、购买枪支弹药，选择、招收官兵等。原乌拉特后旗地方武装的重建与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是组建阶段；第二是发展壮大阶段；第三是扩军抗战阶段；第四是持续发展阶段。（因《抗战时期的女司令巴云英》一文中对原乌拉特东公旗地方武装的发展有较详细的叙述，本文上述四个阶段的内容从略）经过多次浴血奋战，经历了漫长、曲折、坎坷的征途，终于使原乌拉特后旗的地方武装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壮大。到民国38年（1949年）的最后一次整编，原乌拉特后旗保安司令部的保安部队已经发展到有6个大队，18个中队，54个分队的相当规模的一支部队，官兵总数已达2100余人，约占全旗人口四分之一。

六、文化教育事业

解放前，绥远各蒙旗的文化教育事业很不发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蒙古民族多数王公贵族只知世袭罔替，坐享其成，荒废时光，而对文化卫生麻木不仁，根本不重视发展和提高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更重要一方面是，清王朝统治中国以来的260多年间，大力推行灭蒙政策和大力发展喇嘛教的结果。他们在经济上鼓励和支持各蒙旗大量修建庙宇，塑佛修塔，印刷经卷，广招喇嘛，进庙诵经。而不重视发展民族教育。清政府被推翻以后，民国政府也沿用了清朝的对蒙政策，在文化教育方面亦抱着愚弄和应付的态度。到全国解放为止，内蒙古各蒙旗没有一所象样的学堂，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极不发达，人民群众处于愚昧无知的落后状态。一般平民百姓若想让子弟学点文化知识，仍沿用陈俗旧习，让子弟们带足衣食，到有文化的贤良之家，白天放牧打杂差，跑前拾后当侍从，只利用一早一晚的空闲时间学点儿文化，每月还得送一只羊或一年送一匹马，作为教师薪水。辛亥革命以

后稍有改进，由艾力、乌素聘请教师，集中子女办私塾。但开设的课程还是比较单纯，除了学点语文珠算外，再没有学习其他知识的条件。经过几年的苦读，学点八股文，会记几笔流水账，就算出师了。

民国28年（1939），伪蒙疆政府为了灌输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奴化思想，试图在各蒙旗普及小学教育，乌拉特后旗伪政府乘此机会在旗府所在地（现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哈布其勒）成立了一所小学校，称乌拉特后旗旗立小学。吸收和集中了新忽热地区的牧民子弟20余人，由协理唐德吉尔嘎勒兼任校长，伊希丹巴任教导主任，政府笔贴式轮流任教。设置的课程主要有蒙文、日文、算术、体育等。一切费用由旗政府开支。民国33年（1944）因战乱而停办，未能坚持下去。

额王福晋巴云英在辅佐札萨克诺颜参政执政的十几年中，深深感到没有文化知识的苦处，从亲身体验中深刻认识到了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她在率部参加抗日战争的日子里，为了解决部下子女的入学问题，于民国27（1932）冬在五原县城办起了一所乌拉特后旗旗立小学，自己兼任校长，乌仲秀与顾兆忠之妻任教员。民国29年（1940）将学校迁往现杭锦后旗南渠乡张留柱圪旦，使将近50名学生读完了小学课程。抗战胜利后不久，在现乌拉特中旗石哈河乡阎四圪旦村借用王增官的房屋院落，招收200多名学生，成立了乌拉特后旗中正小学。民国36年（1947），经请示绥远省政府蒙旗福利委员会同意，成立了乌拉特后旗边疆实验小学。将原中正小学与该校合并为一所公办小学，绥远省政府派来了数名正规化学校毕业的教师，任该校教师。与此同时，又在该旗民丰乡张家圪旦村成立了民丰乡民办小学，吸收120多名农牧民子弟来该校读书。这两所学校分别是现乌拉特中旗石哈河完小和乌拉特前旗明安乡义兴德小学校的前身。

解放前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是比较单调的。牧区主要是在祭敖包时或在全旗秋季政务会议期间，邀集远近牧民，举办那达慕大会，进行独具民族特色的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赛事。还有人去名寺大庙赶庙会，观赏喇嘛僧众跳法舞（俗称跳鬼）取乐。这就是解放前牧民的文化生活。农区主要是在每年正月十五、二月二举办黄河九曲灯游会，观看扭秧歌；秋季若收成好了，就要请剧团唱大戏（多为晋剧），庆丰收；夏天干旱无雨时，也要请戏班唱戏，请求龙王爷降雨滋润禾苗。农村还有走村串乡的二人台，（过去叫打玩艺儿的）演唱打樱桃、走西口、听房、吃醋、二姑娘得病要女婿等，除此以外再没有其它的文化娱乐活动。

医疗卫生事业更是相当落后，老百姓生老病死、疾病蔓延，也无人过问。蒙旗属民治病就医，主要是靠大寺庙里少数喇嘛自制的蒙医药。若染上了疾病，就必须到远离艾力、乌素的大寺庙里，求喇嘛医治，或请民间稀有的蒙医和有经验的老年人治疗。多数王公贵族有自己的“道克特尔”医生，专门为自家人治病。有些财主富户得了疾病，要施舍大量的金钱和牲畜，求神拜佛，将喇嘛请到家里或去庙里诵经念咒，请神送鬼，消除邪气。一般平民百姓要想请神求佛，就得亲自到寺庙里，在佛堂大殿叩头20天至一个月，或背上沉重的经卷每日早晚沿寺庙外围转圈，需一个或几个疗程（转108、216、324、436圈），由于每天早晚进行有规律的体力活动，确实也能起到强壮筋骨，除病健身之功效。如果痊愈了，就说是神仙为他治好病了。也有一些人请阴阳，请神官和巫婆，跳神弄鬼，安镇谢土，修庙建敖包，搞封建迷信活动，以图自慰。绥远省和平解放以前，全旗还没有一所医疗卫生机构，也无法解决农牧区缺医少药或无医无药等问题。致使疾病蔓延，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七、寺庙的兴建与毁灭

蒙古族最初信奉萨满教，该教有以宰杀牲畜，祭祀亡灵，夫死妻殉的恶习和巫术治病的陋习。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喇嘛教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从西藏渐渐传入蒙古地区，十六世纪中叶得以广泛传播。因为喇嘛教的大寺庙里均设有医学部，多通藏医，优于萨满教的巫术治病，所以极易取得群众的信奉。这就是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思想和文化背景。清王朝统治全国以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就抓住了蒙古族信奉喇嘛教的这一弱点，大力推行明尊暗防“以黄教柔顺蒙古”的方针，以达到使蒙古人民“思想麻痹、愚昧无知、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目的，大力支持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清朝政府认为“兴黄教之所以安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又规定“凡蒙古人，一家生有二子，一人必须当喇嘛，生有三子，二人必须当喇嘛”，明确道出了兴黄教的政治目的。世俗人进庙当喇嘛，则不结婚不成家，不服差役、不纳贡、不当衙役、不当兵，活佛喇嘛享受与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旗级以上的召庙，还可行使司法、行刑等各种特权。对此，各旗王公不但不加以反对，而且还要大力保护喇嘛寺庙，为庙属户划拨大片土地，带头修建庙堂，带头送子当喇嘛。所以，在蒙古地区出现了大量修建庙宇、属民们积极送子进庙当喇嘛的高潮。当然，乌拉特东公旗那时的表现也不逊色。札萨克诺颜送子进庙当喇嘛者，也不乏其人。截止辛亥革命时期，全旗共修建召庙8处，其中旗属庙宇1处，苏木属庙6处，户家庙宇1处。共有活佛5人，其中葛根1人，沙卜隆4人。据说当时喇嘛总数就有300多人，约占全旗蒙古人总数的四分之一。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本旗召庙的分布情况与各庙的概况：

(一)阿贵图召：清廷赐名“噶伊韩木锡克补音图（汉名奇福寺）是乌拉特东公旗旗庙，座落在现乌拉特前旗明安乡召湾村。始建于十七世纪中叶，规模较大，庙内建有五大殿。即却克沁殿、拉桑殿、农内殿、韩斯尔殿、达日克殿，还有四大天王庙及跳鬼过廊、跳鬼场，乐队台、观看台、讲经辩论台，膳食堂。此外，在白彦花山还修建有活佛避暑的庙堂，有葛根1人，常住此庙诵经讲学。前来进修深造的外地喇嘛或本旗小召小庙的活佛，喇嘛也有十儿人，一般喇嘛100多人。庙会也较其他召庙频繁，每年阴历正月15日有红油雕塑展、木偶表演，酥油灯会；七月有玛尼呼拉尔（念玛尼经）兼跳鬼（喇嘛跳舞）等娱乐活动；10月有晋升阿仁占巴敦部会（汉人叫熬曼架，即法会上用的膳食）等大型庙会。召开这几个庙会时外地来的喇嘛不少于300人。该庙组织机构有：葛根仓、伊若勒吉萨、却伊仁吉萨、玛尼吉萨、朝克钦吉萨、波根吉萨、兆图巴吉萨、农内吉萨等庙仓和葛根仓。该庙属奴（庙属户）有20户，计100余人，大小牲畜20000多头（只），有膳召地45000亩，全被放垦，水草费和租税均归葛根仓占有。

民国2年（1913），喀尔喀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蒙古独立时，将国民军高司令从大库伦（现乌兰巴托市）赶出后，又派兵尾追到明安川。国民军重新组织兵力，击退了蒙古军以后，为防止他们以庙为营继续抗击，遂将东起现固阳县公义明北山布拉格庙（小召沟庙）以西至现乌拉特中旗乌梁素太乡李贵湾的乌兰呼热之间的所有召庙全部放火烧毁。民国37年（1948）才勉强修起一殿一仓一吉萨（即农内殿、葛根仓和朝克钦吉萨）。在文化大革命中，庙内塑像被捣毁，大殿被放火烧，其他仓房被拆除。该庙最后一位活佛喇嘛罗布桑丹金苏德那木在解放后病故。

这里还需要提到一件事。据前辈们说，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修

建的现五当召（广觉寺）的头世活佛，在乌拉特东公旗和茂明安旗土默特旗境内走村串户，讲经化布施，传播黄教期间，看中了乌拉特东公旗准备修建旗庙的现五当召所在地（系乌拉特东公旗的辖地）。所以他当时与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公索诺木喇布坦以及有关苏木章京商定，在此地帮助修建乌拉特东公旗旗庙，并为修建该庙划出了现五当召北山大敖包分水岭以南至石拐，东起查干达坝沟分水岭，西至阿尔斯浪沟一带的大片牧地，作为修建召庙基地和放牧用地（膳召地），同时，乌布尔孛儿只格特苏木，阿鲁孛儿只格特苏木、苏海图苏木共同拨出27户，100余名阿勒巴图作为庙属户，为该庙服役。

但在修建召庙的过程中，该庙主持者竟与清廷和绥远都统府官员串通一气，改变了召庙的隶属关系，将该庙隶属于绥远都统衙门。并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奉绥远都统之命，将茂明安旗，土默特旗的大榆树滩和水家沟后口子以西的磴口等地也划归该庙作为膳召地。由于对方擅自撕毁协议，不仅改变了召庙的隶属关系，而且占用了大片牧地，给乌拉特东公旗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如此一来乌拉特东公旗不肯善罢甘休，他们组织由划给该庙的属户联名上书，越级告到清廷理藩院；但是没有任何结果。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诺颜索诺木喇布坦一气之下，便在明安滩选址，重新修建了阿贵图庙。随后，清朝政府为了权衡利弊，平息这场风波，决定让乌拉特东公旗阿贵图庙葛根（活佛）喇嘛在该庙享受与堆恩克尔葛根同等的坐堂待遇。因此，一直到解放为止，乌拉特东公旗的王公贵族与该庙首脑之间，一直是面和心不和。

（二）道尔吉胡都格庙：清廷赐名“补音温都苏勒格齐”（汉名福因寺），系巴图苏木属庙，座落在现包头市郊区西边墙村，寺庙中有活佛1人，建庙初期有50多名喇嘛。后因大量开垦牧地，召庙附近蒙民纷纷迁往他乡前来上贡的人也日益减少。民国2年（1913）被国民党军队烧毁后，幸存的活佛贡格尔

沙卜隆和几位老喇嘛，只好寄居昆都仑召。

(三) 陶赖呼勒庙：清廷赐名“伊克德脑木古特哈克齐”（汉名广法寺），系高勒苏木属庙。原座落在现乌拉特中旗石哈河乡召圪卜村，后因战乱，被土匪破坏而迁至现新忽热苏木牧仁嘎查之查干萨齐，解放前夕有1名活佛，20多名喇嘛，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拆除。

(四) 巴勒嘎苏庙（亦称召盖庙），清廷赐名“乌勒吉浩特拉楚克拉干”（汉名吉全寺），是黑亚苏木属庙。座落在现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那日图嘎查，有活佛一人，解放前夕有10多名喇嘛。解放后庙宇被拆除。

(五) 阿格鲁庙：原址在小余太川阿格鲁沟前口子。民国2年（1913）被国民党军队焚毁后，迁址重新修建于阿格鲁沟后口子，有沙卜隆喇嘛一人（即额尔克色庆占巴勒，民国10年（1921）退僧还俗后，承袭了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贝子）有喇嘛20余人。民国27年，该庙又被国民党军队烧毁，众喇嘛各奔前程。

(六) 布拉格庙：座落在现固阳县公义明村北山，系黑亚苏木属庙，有活佛1人，喇嘛20余人。民国15年（1926）被独立队烧毁，喇嘛四散。

(七) 补尔嘎苏太庙（东召沟庙）：系黑亚苏木属庙，座落在现包头市固阳县霍几尔沟乡，起初有10余名喇嘛，1名神官。解放后寺庙被拆除。

(八) 西召沟庙：是乌拉特东公旗协理台吉脑亥夫家庙，有喇嘛5人，神官1人，解放后被拆除。

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乌拉特东公旗虽然人口少，经济不发达，但修建的召庙却是不少，进庙当喇嘛的人亦不少。由于全旗众多喇嘛既不参加生产劳动，又不娶妻生子，还要花费家中的钱财，致使全旗人口迅速减少，生产急剧下降，人民群众的生活日

益穷困，思想愚昧无知，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蒙古民族不仅同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奴役和剥削，还要遭受宗教迷信的束缚和愚弄，以致长期处于黑暗之中。

八、和平起义与组建人民政府

绥远省“九、一九”和平解放后，迫在眉睫的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组建人民政府，改编旗保安部队。因此，1949年9月25日巴云英在驻包办事处召开了旗政府主要官员和保安大队、司令部主要成员会议。举行了签名起义仪式。参加“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的乌拉特后旗政府各级机关名单详见表一。乌拉特后旗保安司令部及中队长以上人员参加“九·一九”起义名单详见表二。传达了傅作义来归绥、包头的谈话精神和对今后工作的指示。会议要求各级官员消除疑虑，解放思想，带头做好部下和群众的思想工作，稳定社会秩序。要求各级官员坚守岗位，等待指示。准备组建人民政府，改编保安部队。1950年4月乌兰察布盟成立，会后盟里派工作组赴乌拉特后旗、协助组建乌拉特后旗人民政府7月21日在现新忽热苏木所在地隆重召开了成立乌拉特后旗人民政府代表大会。选出了主席团和执行主席。赵忠华、巴云英、萨音、贡嘎色楞、唐德吉尔嘎勒，乌云其其格，嘎拉僧、李三、喇嘛夫、丹金，色日古楞等11名执行主席主持会议，会上传达了乌兰察布盟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的主要精神。会议期间，主席团提出了正副旗长候选人名单，在全体代表充分协商讨论的基础上，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原札萨克贡嘎色楞为旗长，萨音（共产党员）和原协理唐德吉尔嘎勒二人为副旗长。同时任命了旗人民政府各科室和各区的主要负责人。

从此乌拉特后旗废除了300余年的封建君主统治制度。广

大蒙汉族劳动人民彻底翻身得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与此同时，乌拉特后旗军政领导在乌兰察布盟军分区派来的政工人员协助下，积极进行了旗保安部队的整编工作。截至6月底前，旗保安司令部及其各大队的2000余人马全部整编完毕。从此，乌拉特后旗地方武装结束了吃自己穿个人零花靠自家的历史，成为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一切由国家供给的人民军队。

九、结局

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团结教育起义投诚的军政人员，对留用人员分批分期派到绥远省和乌兰察布盟进行短期或长期学习培训，更新观念，提高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农村牧区的政策，解决实际困难，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同时，稳妥地开展了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稳定了社会秩序，扭转了混乱局面。在农区进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使人人有地种，个个有饭吃；在牧区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开展民主革命运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

1950年8月，乌拉特后旗政府迁到明安滩营家窑子（今乌拉特前旗明安乡所在地）。同年11月，又迁到阿贵图庙（今乌拉特前旗营盘湾东）。

1952年10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批示，乌拉特中、后两旗合并，改称乌拉特中后联合旗。

政府驻地海流图，辖9个努图克（区）。旗长：明安满达（原中旗旗长），副旗长：图布新（中共党员、原中旗副旗长）、宝音吉尔嘎勒（原后旗民政科长）。同年，将绍卜亥努图克和阿贵图区分别划归石拐矿区和固阳县。1954年将第七区

(台梁区)划归乌拉特前旗。1958年7月,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和乌拉特前旗隶属巴彦淖尔盟公署管辖。

1970年10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示,从乌拉特中后联合旗西部划出宝音图、巴音前达门、巴音戈壁、乌力吉、乌盖、那仁宝力格、潮格温都尔、巴音宝力格等8个公社和巴音前达门合营牧场、莫林牧场两个牧场,新设立潮格旗。1981年9月,根据国务院批示,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改称乌拉特中旗,潮格旗更名为乌拉特后旗。从此,原乌拉特后旗正式宣告结束。

乌拉特后旗政府各级机关
参加“九、一九”起义人员名单 表一

机构名称	姓名	职务	备注
旗政府	贡嘎色楞	札萨克贝子	
" " "	巴云英	护理札萨克	
" " "	唐德吉尔嘎勒	西 助理	
" " "	宝音吉尔嘎勒	东 助理	
" " "	罗布僧达瓦	管旗章京	
" " "	恩克巴雅尔	梅林章京	
" " "	若格瓦	" " " "	
" " "	丹斯仁扎布	扎兰章京	
" " "	丹贝日勒	" " " "	兼和硕达木勒
" " "	陶德斯钦	师爷达日嘎	
" " "	巴 敖	副师爷达日嘎	
" " "	那木格若喜	笔帖式	
" " "	阿拉腾敖其尔	" " "	
" " "	赛音布仁	" " "	
" " "	坡日赖	" " "	
" " "	图布欣毕力格	" " "	
" " "	额尔敦巴特尔	" " "	

机构名称	姓名	职务	备注
旗政府	巴拉登	笔帖式	
" " "	王钦扎布	" " "	
" " "	曲日胡木尼玛	管家	
" " "	包劳赖	图力胡日其	司钥匙
" " "	萨如拉	达木勒	
诺颜仓	宝日夫	达木勒	
司令部、政府 驻包办事处	吕兆祥	处长	兼职
司令部、政府 驻包办事处	乌力吉巴图	庶务	
" " "	巴雅尔	" " "	
" " "	那顺巴图	办事员	税征员
" " "	智良贵	" " "	
" " "	安占海	" " "	
" " "	余二	" " "	
高勒苏木	嘎拉僧	苏木章京	
黑亚苏木	龙德格扎木苏	" " "	
巴图苏木	阿尤希扎布	" " "	
乌布尔孛儿只 格特苏木	巴图乌力吉	" " "	邬振兴

机构名称	姓 名	职 务	备 注
阿鲁李儿只格 特苏木	诺尔布	苏木章京	
苏海图苏木	图门吉嘎勒	" " "	赵青山
扎鲁特苏木 (铁宾)	吉格尔特多尔济	" " "	哈勒晋夫
新蒙乡	李 之	乡 长	
民丰乡	陈满仓	" " "	
" " "	格日来	副乡长	
大树湾渡口 税卡子	许文志	卡 长	
" " "	李隆宽	税征员	
" " "	孙德胜	" " "	孙布尔
沙坝子税卡子	刘振业	卡 长	
" " "	补仁扎亚	税征员	
哈尼河税卡子	张××	卡 长	名字已忘
大庙税卡子	侯××	" " "	" " "

乌拉特后旗保安司令部及中队长以上

人员参加“九、一九”起义名单

表二

机构名称	姓名	军衔	职务	备注
司令部	贡嘎色楞	中将	司令	
" " "	巴云英	" "	代司令	
" " "	梁九洲	少将	副司令	
" " "	常有明	上校	参谋长	
" " "	郭维中	中校	秘书	郭风晓
参谋处	张树华	中校	主任	
" " "	瞿选	" "	参谋	
" " "	陈殿明	" "	" " "	
" " "	韩诚	少校	" " "	辉庭
" " "	李生荣	" "	" " "	
" " "	苗秉钧	上尉	书记员	
参谋处	许文志	上尉	参谋	兼税卡卡长
" " "	吉林太	中尉	" " "	
副官处	吕兆祥	中校	副官长	兼办事处长
" " "	张文星	少校	主任	
" " "	高玉升	中校	副官	高大头
" " "	陈瑞	" "	" " "	

机构名称	姓名	军衔	职务	备注
副官处	白敖其尔	中校	副官	
" " "	郭子英	" "	" "	
" " "	曹德铭	上尉	" "	
" " "	侯凌云	" "	" "	侯来旺
" " "	傅士珍	" "	" "	伊喜敖斯尔
" " "	彭承基	" "	" "	
" " "	杨文魁	" "	" "	
" " "	贡布扎布	上尉	副官	格木扎
" " "	尹泰胶	" "	书记员	
" " "	李 焕	" "	" " "	
" " "	赵治安	中尉	副官	
" " "	孙德胜	" "	" "	
" " "	李长胜	少尉	" "	
" " "	刘明山	" "	" "	
" " "	贺 瑞	" "	" "	
" " "	李 茂	" "	" "	
" " "	杨森景	" "	" "	
" " "	哈日其嘎	" "	" "	
" " "	宝音德力格尔	" "	" "	张福生

机构名称	姓名	军衔	职务	备注
副官处	邱茂生	少尉	副官	
" " "	韩保诚	" "	" "	
" " "	刘樊尝	" "	" "	
" " "	刘志山	" "	" "	
" " "	周存仁	" "	" "	
" " "	王林祥	" "	司书	
" " "	邸国祥	" "	" "	
" " "	贾永义	" "	司书	
军法处	乌尔图那顺	中校	主任	乌仲秀
军需处	王大成	" "	" "	王大秤
" " "	郑建忠	少校	军需	
" " "	蔡占龙	少尉	" "	
第一大队	李俊峰	上校	大队长	胳膊李
" " " "	岳升	中校	副大队长	
一中队	郭海如	少校	中队长	
二中队	陈得智	上尉	代中队长	
三中队	刘凤林	少校	中队长	
第二大队	吴靖国	上校	代大队长	
" " " "	布日格多尔济	中校	副大队长	

机构名称	姓名	军衔	职务	备注
一中队	图门吉尔嘎勒	少校	中队长	赵青山
二中队	牛占山	" "	" " "	
三中队	华喇嘛	" "	" " "	陈占魁
特务大队	张来锁	上校	大队长	张鸣岐
" " " "	傅士珍	中校	副大队长	
一中队	底国用	少校	中队长	底 猫
二中队	潘富才	" "	" " "	
三中队	高升旺	" "	" " "	高孟喜
巡查大队	孙布尔	上校	大队长	孙德胜
" " " "	吉仁太	中校	副大队长	
一中队	葛海宽	少校	中队长	
二中队	张秉义	" "	" " "	
三中队	阎老牛	" "	" " "	
警卫大队	若格瓦	上校	大队长	
" " " "	贡德桑布	中校	副大队长	贡 素
一中队	色日古楞巴雅尔	少校	中队长	
二中队	图布欣吉尔嘎勒	" "	" " "	
三中队	沙木腾	" "	" " "	
机枪大队	张振杰	上校	大队长	张振海

机构名称	姓名	军衔	职务	备注
机枪大队	恩克达赖	中校	副大队长	胡庆发
一中队	米六	少校	中队长	
二中队	冯福财	少校	中队长	
三中队	李德福	“ ”	“ ” “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第十四辑·巴云英与东公旗史料专辑

作者 =

页数 = 1 5 9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